# 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

雍 涛 著

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

总主编　陶德麟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牛太臣　任珍良　刘光杰

刘德厚　司马志纯　李　龙

何国瑞　杨小岩　郑永廷

雍　涛　陶德麟

# 目　录

序 …………………………………………………… 陶德麟
前　言 ……………………………………………………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 ………………………… 5
　第一节　中国革命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 5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10
　第三节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 17

第二章　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和毛泽东哲学的萌芽 ………… 45
　第一节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 ………………………… 45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的萌芽 ……………………………… 51

第三章　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探索和毛泽东哲学的形成 …… 68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与党在理论战线上的任务 ………………………………………… 68
　第二节　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探索与矛盾特殊性思想 …… 72
　第三节　《反对本本主义》与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雏形 … 80
　第四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主要矛盾转化原理的提出 … 85
　第五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军事哲学 …… 90
　第六节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系统

化的标志……………………………………………… 101

第四章 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毛泽东哲学的多方面展开……………………………………………… 125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形势与哲学战线上的斗争……………………………………………… 125
第二节 《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 128
第三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 145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唯物史观……………………… 152
第五节 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166
第六节 把哲学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177

第五章 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与毛泽东哲学的进一步展开……………………………………………… 184
第一节 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184
第二节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哲学意义…… 189
第三节 十大军事原则对军事辩证法的新发展…………… 194
第四节 《论人民民主专政》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198
第五节 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 203

第六章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毛泽东哲学的继续发展……………………………… 211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211
第二节 在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的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 217
第三节 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批判意识形

态领域中的唯心主义…………………………………… 221
第四节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发挥…………………………………… 228
第五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与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 236
第六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伟大贡献与历史局限……… 246

第七章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与毛泽东哲学的曲折发展…………………………………… 262
第一节　经济建设上的主观主义错误与毛泽东的初步反思…………………………………… 262
第二节　在总结经验教训中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272
第三节　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左"倾错误的发展与毛泽东历史观上的失误………………………… 295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重大失误…………………………………… 315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与过程…………………… 315
第二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实质…………………………………… 319
第三节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哲学根源………………… 325

结束语…………………………………… 335

# 序

武汉大学有关学科的部分学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毛泽东国家学说》、《毛泽东文艺思想精要》、《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经济变革与发展思想研究》和《毛泽东法律思想研究》等六本专著，构成《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对毛泽东同志一百周年诞辰的献礼。

武汉大学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传统。早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就把研究、阐发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职责，写出了包括《〈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在内的一系列优秀论著，在思想界、学术界和广大群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自1952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以后，一直在全校倡导和组织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工作，努力培养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骨干，并在1961年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亲自主持研究工作。在他的影响下，武汉大学的各有关系、所都十分重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应用，逐步形成了传统，建立了队伍。虽然一度受到“文革”的干扰和破坏，但基本队伍并没有被打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优良传统很快得到了恢复，在原有的队伍中又增添了新的力量。因此，这套《丛书》并非应景的急就工作，而是长期集体研究的成果。当然，由于学科和水平的局限，我们还没有能力对毛泽东思想的诸方面进行更广泛的研究，《丛书》所涉及的还只是毛泽东思想的几个方面，远不足以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全貌。即使仅就这些方面而言，研究的深

度也远远不够。《丛书》的出版只能说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起点而已。

我们在撰写这套《丛书》时，是以如下几点共识为指导思想的。

（一）作为科学概念的毛泽东思想，不应局限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和著作。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应加上党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中，毛泽东同志本人起了最卓越的作用，作了决定性的贡献。因此，这一科学理论体系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是完全合理的，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虽然不限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贡献（恩格斯也作了巨大贡献），但这一科学理论体系被命名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合理的一样。至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晚年所犯的错误，恰恰背离了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因而是不应当归入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

（二）但是，正因为毛泽东同志本人在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中起了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研究他本人的思想及其发展过程，对于深刻理解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又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研究毛泽东同志本人在中国这一特定环境中怎样形成自己的思想，又怎样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中国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和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历史过程，就不可能理解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具体道路。在研究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思想时，当然首先要着力阐发他的卓越贡献，但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说明他晚年的错误。具体地分析这样一位对全民族和全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指出产生这些错误的历史环境和主客观原因，也是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总之，这套《丛书》的侧重点在于探讨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思想。当然，它的落脚点仍在于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

（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决不是封闭凝固的东西，而只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活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去世之后也还是这样。邓小平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同时代人，与其他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去世之后，邓小平同志又对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了特别卓越的贡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思想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和损害。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一段时间里，以"两个凡是"为特征的思潮继续维护着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理解，使党和人民的命运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个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 "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② 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理论界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重新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批驳了林彪、江青等人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实现了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把毛泽东同志个人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严格地区别开来，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地位。同时，邓小平同志根据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创造性地研究新问题，开创新局面，总结新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此，我们在论述毛泽东思想时，不能不论述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作为科

---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36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0页。

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理解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在当前和今后的生命力，才能澄清把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种种曲解和误解。

《丛书》的作者们是以无限崇敬和缅怀的感情向毛泽东同志的百岁诞辰献礼的。我们想，对这位历史巨人的最真诚的纪念，莫过于继承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和阐发毛泽东思想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使全国人民更自觉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指导下奋勇前进，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毛泽东事业的具体行动之一。这套《丛书》的作者们试图在这一方面尽微薄之力，并期待着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陶德麟

1993年6月

于武汉大学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要研究毛泽东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首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客观条件。

青年毛泽东正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参加革命实践之后，才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世界观由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哲学的性质、特点以及后来的发展和演变。

## 第一节 中国革命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我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亦相应产生。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和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大转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矛盾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同时又阻碍和扼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都妄图独霸中国，但由于各帝国主义之间，

以及它们同中国封建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矛盾，特别是同中国人民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它们又不得不互相合作，维持中国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使中国保持表面上的独立。这样，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就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只有两个基本的对抗的阶级，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办企业，以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始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新兴阶级的出现，使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在近代中国，存在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也就使此后的中国革命具有了新的性质。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革命，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单纯农民革命。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的任务，对外是推翻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民族革命，对内是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这就决定了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十月革命以前，这种革命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十月革命之后，这种革命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革命的阵线上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这样，新的革命实践向人们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应该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如何运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的社会矛盾，完成革命的任务呢？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曾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党人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①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解决实践提出的这一新课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

###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其阶级基础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也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造成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的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产生发展，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而壮大起来，形成了一支二百多万人的队伍。"五四"运动期间，广大工人参加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而且还有自己特有的优点，如受三重压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革命坚决彻底，特别能战斗；力量比较集中；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等等。当然中国工人阶级也有某些不可避免的弱点，如人数较少，年龄较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

轻，文化水准较低，容易受小农思想影响等等，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政治觉悟、组织水平和战斗能力的逐步提高，迫切需要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充分显示了它的威力，这就使得一部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从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认识到无产阶级在改造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促进了革命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结合，使先进的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既找到了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又找到了改造中国的依靠力量。青年毛泽东正是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经验中领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思想武器，以工农为基础的民众大联合才是改造中国的最可靠的力量。

### （三）在艰辛的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革命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的思想武器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和各种试验之后才得到的。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洪秀全由于受西方资产阶级所传来的基督教的思想影响，搞了一个“拜上帝会”的迷信组织来发动农民革命。他把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精神同中国的儒家思想、农民的平均思想相揉合，提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出了代表农民利益的救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地上天国”。为了实现“地上天国”的理想，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将士浴血奋战十四年，驰骋十八省，牺牲数百万人，把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但是“地上天国”方案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农民的平等主义思想，这种理想社会，只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改造世界的幻想。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这种农民的平等主义思想不得不败下阵来。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代表。他们与只注重“船坚炮利”，只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皮毛的洋务派不同，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但又不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搞所谓君主立宪制。他们发动了一场“戊戌变法”运动，由于不推翻帝制，不否定封建礼教，反封建不彻底，搞了一百天的维新，最后被慈禧太后镇压下去了。但维新派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严复，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唤起人们奋发图强的精神，对中国人了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开发民智，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库中学来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和孟德斯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结合中国社会面临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三项历史任务，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民族、民权、民生）。孙中山高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并没有摧毁封建专制主义。其原因一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二是没有找到引导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

由此可见，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都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一切别的东西都试验过了，都失败了。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的倒下去了，有的觉悟过来了，有的正在换脑筋，感到要另找学习的对象，重新考虑国家的出路。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从此学得了一样新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从 1915 年开始形成的新文化运动已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序幕，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就中国人对它的理解和掌握而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早期传播却始自十月革命，接着是“五四”运动和“三次大论战”，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 （一）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新时代，同时也开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新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正因为

如此，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突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就不能不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产生巨大的和深远的影响，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李大钊就撰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歌颂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这件功业是马克思、列宁的功业。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必将形成世界的群众运动和潮流。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阻挡的潮流，都会象秋风扫落叶一样，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李大钊以十月革命的胜利，雄辩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这比之一般地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无疑更具有说服力，因而提高了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觉悟，使中国人民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倡导下，新文化运动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集中在唯物史观的宣传上。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论著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出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603页。

学社会主义"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斗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① 陈独秀在《谈政治》、《马克思学说》等文章中，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指出了国家的本质和职能，强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介绍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以及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关系。李达在《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的商榷》等文章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强调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社会革命论，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此外，瞿秋白、蔡和森等在传播唯物史观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瞿秋白最先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宣传唯物史观。蔡和森则用最鲜明的语言介绍唯物史观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他说："俄国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②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已经问世。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著作也翻译过来。

### （二）"三次大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扩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实现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起统治阶级的恐慌，一批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无

---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 177 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154 页。

政府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这样，在1919年至1921年间，发生了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大论战。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中国近代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争。这场论争是由胡适挑起的。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在反对"空谈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提倡"研究问题"的幌子下反对社会革命。在遭到李大钊等的反驳后，胡适又发表了几篇关于"问题与主义"的文章，为他的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辩解。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人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批判了胡适把"问题与主义"绝对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错误，着重指出中国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而经济问题的解决则必须通过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不夺取政权，经济的革命，永远不能实现，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是行不通的。

"问题与主义"论争的实质，是中国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它在政治上是实行彻底的社会革命还是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的问题，哲学上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与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斗争。这场论争沉重打击了国内外资产阶级宣扬的哲学唯心论和社会改良主义，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场论争，对于青年毛泽东政治态度和世界观的转变，也有一定的影响。1919年9月，毛泽东发起"问题研究会"，主张结合主义研究问题，认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①，并提出研究要重视实地调查。这就正确地处理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并使这种研究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通过这场论争和毛泽东自己的实践，1920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页。

年11月他已觉悟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①，即要通过社会革命取得政权，才能保证改革的实现。

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我国思想文化界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论争。这场论争是由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借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演之机发动的。他们配合罗素的讲演，发表文章，吹捧和兜售罗素的改良主义观点，认为中国贫乏落后，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宣传社会主义，更不是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他们歪曲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认为中国无“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或者有，但也“人少而力微”，“阶级意识未生”，因而不能成立无产阶级政党，不必开展工人运动，更不应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这些反社会主义的论调刚一出笼，就受到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的猛烈回击。首先，他们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状况，驳斥了所谓中国没有阶级区分的观点，指出近代中国工业虽然落后，但不能由此否认中国存在着无产阶级。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广大农村经济和手工业纷纷破产，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城市，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阶级。中国无产阶级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有更大的痛苦，因而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才是改造中国的真正出路。其次，他们驳斥了张东荪等人诬蔑中国工人阶级缺乏革命自觉性的种种滥言，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由于受压迫最深，因而有更迫切的革命要求，随着它的成长壮大和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必然会产生，只要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中国就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再次是揭露了张东荪等人所谓的“发展实业”的实质是“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指出，不讲主义只讲发展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48页。

实业，其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在现存制度下谋求实业的兴盛，实质上就是加强统治的力量，强化对工人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中国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这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关系到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以及中国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等重大问题。经过这场论争，揭穿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而贩卖资本主义货色的伪善面目，澄清了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许多思想混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这对于毛泽东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们更为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阶级分野，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改造中国。

在社会主义问题论争的同时，中国思想界又进行了一场关于无政府主义问题的论争。无政府主义本质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存在着滋长和传播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基础，也由于无政府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以“左”的面目出现，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开展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最初有刘师复、李石曾等，以后是黄凌霜、区声白、朱谦之等，他们主要是宣传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他们标榜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在经济上，他们反对有领导的计划生产，主张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思想上，他们鼓吹个人主义，宣扬“个人万能”，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从1920年起，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便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首先，他们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谬论，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指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要获得解放，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便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阶级对剥削阶级的专政，这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是完全必要的，笼统地、武断地反对“强权”、反对专政，是错误的。其次是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生产和分配的理论，反对了绝对平均主义。他们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破坏集中的大生产，把生产资料分散给个体小生产者，而是改变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实行集中的有领导有计划的生产。至于分配问题，那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只有到了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十分丰富时，才能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要求在革命胜利后，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时，立即实行“按需分配”，这只能是一种空想，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表现。再次是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绝对自由”的谬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他们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根据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宣扬“绝对自由”是人的本性，是荒谬的，是与现实相矛盾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个人自由总是同社会自由连在一起的，只有社会的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剥削阶级的自由，没有劳动阶级的自由。自由与秩序即组织纪律也是不可分的。无政府主义者宣扬凡事要“人人同意”，“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这种“绝对自由”的主张，在任何社会都是行不通的，这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观点，是必须反对的。这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可以看作是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论争的继续，其实质是中国革命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通过这场论争，大大地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阵地，使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分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从而坚决地走上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青年毛泽东 1920 年底 1921 年初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彻底地清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明确表示：“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

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①"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②。这样青年毛泽东便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

## 第三节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湖湘文化的熏陶和西方文化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世界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后来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实践的锻炼，很快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由唯心主义世界观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 （一）中西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熏陶和影响

关于青年毛泽东所受过的教育和文化影响问题，毛泽东本人后来有过回忆和说明。他曾对人说过："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候读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特别强调指出："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从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③ 1964年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五

①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5页。

③　转引自刘斐：《难忘的教诲》，见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

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①。

事实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从1902年开始，毛泽东在韶山等地读私塾，在熟读“四书”、“五经”的同时，爱看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农民造反的故事。1907年秋至1910年夏辍学在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时看了《盛世危言》等具有爱国色彩的书籍，后来又读了一本《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书，对国家的前途十分担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10年考入湘乡县东山小学堂后，阅读了一些中外历史、地理书籍和报刊，学习了一些自然科学和西方的社会科学。他特别爱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爱不释手。1911年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接受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投笔从戎，参加了为响应辛亥革命而起义的湖南新军。当兵期间，他读过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写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小册子。1912年下半年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受老师杨昌济、袁仲谦的影响，《讲堂录》便是他当时听杨、袁讲课的记录。1914年四师并入一师。在一师求学初期，他在老师的影响和帮助下，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曾国藩的“家书”以及康德和王船山的哲学著作，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书。1915年和蔡和森等一师同学组织课外哲学研究小组，经常去杨昌济、黎锦熙等老师处请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后，他很快成为它的热心读者，钦佩陈独秀、胡适的文章，开始接受陈独秀等人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的长篇论文，7、8月间，采取“游学”形式，与萧子

① 参见《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升等作社会调查，历时月余，步行千里，考察了五县农村和城镇，10月主办一师工人夜校并兼任教员。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在听老师杨昌济所授“修身”课期间，在作为教材的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上，他写了约15 000字的批注。该书为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所著，是一部以二元论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以论述伦理学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对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师毕业后，1918年夏他曾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到岳麓山，野餐露宿，从事半耕半读，搞“新村”试验，1919年春，从京回湘后，再次提出建设新村的计划，可见他曾受空想社会主义和康有为《大同书》思想的影响。1918年8月毛泽东赴京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同年10月，经杨昌济介绍，他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这里，他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获得了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的机会。1919年初，他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并在北大旁听了一些重要课程。“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更多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中西文化及其各种思想流派，对青年毛泽东都发生过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熏陶是很深远的。当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早年在韶山求学时期，主要是熟读经书，形成了传统文化在头脑中的基本框架；辛亥革命后，通过学习西方文化，以及接受维新派的思想影响，传统文化在他头脑中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五四”运动前后，他的文化观再次发生重构，西方文化成了他的文化构架的主干，但传统文化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融入到新吸收的西方文化之中。对于中西文化的各种思想流派，他采取了分析综合、汇合百家的态度，就哲学而言，对青年毛泽东影响较大的西方思想，主要是进化论和新康德主义，中国传统思想有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其中尤以儒家（孔孟）、道家（老庄）的哲学思想较为突出。至于湖湘文化，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化和地方特色，主要体现为

主张经世致用，注重习行践履的学风，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是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等。

### （二）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

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是复杂的，但总的来说是唯心论的，同时存在心物二元论的观点。他在本体论上主张“我即宇宙”的唯我论，认识论上有经验论的色彩，发展观上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又存在相对主义因素；历史观上是圣贤创世说，伦理观上是“精神之个人主义”。

1. 本体论

青年毛泽东在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强调探求宇宙的“大本大源”。什么是宇宙的大本大源呢？他认为，这个大本大源是精神性的本体，即“宇宙之真理”。1916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① 这就是说，心灵是世界的本体。1917 年 8 月 23 日在致黎锦熙的信中他又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②这个真理在哪里呢？他说：“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③就是说，宇宙之真理是人的精神，它存在于各人之心中，但有的人把握得少些，有的人把握得多些，那些有学问的、有大气量的圣人才能完全把握，即得到“大本大源”。他这里所讲的“大本大源”、“宇宙之真理”，类似于程朱理学所讲的“太极”，象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

但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的本体论，更多地是受陆王心学的影响。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

①②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0、85、85 页。

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① 这里，青年毛泽东的宇宙观已由只有宇宙而无我的思想转变为我是主宰一切，支配一切的思想，认为宇宙万物皆因我而存在，如果没有我，也就没有宇宙万物。他甚至明确地说：“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②。这显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彻底的极端的形态——唯我论。这种唯我论的宇宙观是杂揉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的“心外无物”、王阳明的“吾心即宇宙”，以及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而来的。这同他的老师杨昌济更有直接的关系。杨昌济主张“贵我”，曾说过：“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者唯我。”③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了老师的话。

唯我论的宇宙观，从世界范围来看，是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宇宙观，理论上是非常荒谬的，列宁已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作了深刻的批判。但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条件下，唯我论则有着另外一种意义和作用。由于唯我论在若大的宇宙中只承认一个赤裸裸的自我，否认任何其他事物的存在，所以它同一切封建迷信、传统教条根本对立，而与强调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相通，因而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和革命作用。毛泽东从这种唯我论的宇宙观出发，特别强调个人的价值，主张个性自由、个性解放。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写道：“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④ 可见，毛泽东的唯我论，其矛头是指向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和

①②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30—231、148、151—152页。
③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页。

一切专制压迫的；但由于不能正确认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因而夸大了个人的作用，陷入了唯心论。

青年毛泽东的宇宙观是唯心论的，但同时存在二元论倾向，这种二元论倾向，除了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有所表现之外，更多地表现在《体育之研究》中。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论及生死问题时写道："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①，又说："宇宙亦终古在同状之中，无创作之力。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②。在他看来，宇宙是由物质与精神两种东西构成的，这两种东西互不相生，各自不生不灭。毛泽东的二元论既与康德哲学有关，又受中国传统的气的聚散学说和灵魂不死说的影响，他曾以此来解释物质不灭、精神不灭以及人的生死问题。他说："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③同时，生死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他写道："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有必然性。"④所以，青年毛泽东在自然观上有较强的唯物论倾向；但他又认为，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种精神世界，人死不过是进入另一种世界，另一种奇境而已，这又表现出唯心论倾向来。

二元论哲学当然不是科学的世界观，但对当时的毛泽东来说，却别有一番新意。他后来回忆说："这本书（指《伦理学原理》——引者）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

①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99、217页。

③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94页。

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① 可以说，心物二元论是毛泽东由唯心论转向唯物论的重要阶梯。

事实上，在二元论的"启发和帮助"下，他对某些事物的分析，已经开始向唯物论迈进。例如，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开始唯物地解释德、智、体的关系。他写道："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②又说："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无德智也。"③在这里，他已把身体看作物质性的实体，认为物质实体决定德、智这些精神的东西。在谈到体育之效用时，他进一步论述了知识、感情、意志这些精神的东西对于体魄的依赖关系，他说："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④。但这里仍然有二元论的色彩，表现在他把物质（体）看作是容纳意识（德智）的容器（车或舍），物质和意识是各自独立的。

2. 认识论·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当时是主张知先行后，把知放在第一位的。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⑤ 这里，他不仅把知、信、行三者并列，统称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而且实际上把知放在了首要位置。在《体育之研究》中，他强调一事之见于行为，"必先有对于此事明白周详知其所以然之智"⑥。这时，毛泽东对知行关系的复杂性还缺乏深入的了解，还不懂得从总体上看，行先于知，有了实践经验的积累，才可能产生知识；而作为每个人的具体知行过程来说，往往是先学而后行，先有"周

① 转引自《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76页注释[1]。
②③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7、66—67、71页。
⑤⑥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8、72页。

详知其所以然之智”，然后去实践。因此，从总体上说应该肯定行先知后的观点。

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这时的毛泽东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认为知识、理论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他说：“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得其正鹄矣。种种著述皆不过勾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无论何种之书，皆是述而不作。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①]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是主张反映论的，但说一切著作皆是“述而不作”，无丝毫创造，这是一种机械的反映论，而不是一种能动的反映。在谈到知与行相互联系的重要环节即人类经验时，毛泽东认为，经验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得来的，他承认有“良知”、“良能”，但认为这不是先天的，而是得自祖先“多代相传之经验”[②]，“由一人而论，从幼少之时，即童而习之，似为构成于先天者。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③]他直接批评了圣人“生而知之”的谬说，明确指出：“圣人者‘生而知之’、‘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之不可信也。”[④]但谈到人的本性时，他又没有完全摆脱泡尔生的生命冲动说的唯心主义影响，认为英雄豪杰具有“得于天之本性”，这种本性中具有“至伟至大之力”，此种动力从何而来呢？毛泽东认为，从“自然之冲动”而来[⑤]。这样，他思想上又出现了向先验论回归的倾向。

关于理性认识的指导作用，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是十分肯定的。他写道：“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夫所谓信仰者，必

---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16—217页。

②③④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57、221、183、218页。

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1]这些话反映出毛泽东重视理论，重视知识，反对迷信、盲从的精神。但他只看到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而没有看到知来之于行；而且他还认为，知识对于指导人的行动，只能起一半的作用，另一半则来自知识以外的"感情冲动及良心"，这种认识又是不彻底的。

3. 发展观

青年毛泽东的发展观的显著特点是辩证法思想非常丰富，但又有明显的相对主义色彩。

首先是"变为常"的思想，这是青年毛泽东发展观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早在《讲堂录》中，他就记有"天下事物，万变不穷"的警言。在《体育之研究》中，他批判了朱熹、陆九渊"主静"，老子"无动为大"，释加牟尼"务求寂静"的形而上学思想，提出了"天地盖惟有动而已"的见解。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对运动、变化作了更多的说明。他认为，变化、生死、成毁是自然的普遍的法则，自然如此，国家、民族以至人类亦然。他指出："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2] 他提出了通过革命"再造"国家和民族的问题，强调"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毁成之大变化也。"[3]青年毛泽东的上述批语，反映了他救国救民，希望彻底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心情和愿望。

毛泽东变化观念的形成，除了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之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处于激烈动荡、新旧交替的巨变之中。帝国主义的入侵，各种新思想的介绍，冲击着古老中国千古不变的教条。由于近代社会特别明显地体现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27 页。
②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00、201 页。

着辩证法的运动，所以近人著作中的变化观念也比较丰富。不论是康梁的维新思想，谭嗣同冲决封建罗网的战斗精神，严复宣扬的进化论，还是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都强调一个“变”字；陈独秀、李大钊也强调世间万物“新陈代谢，进化无穷”。毛泽东的变化观念，是中国社会现实在哲学上的折光，是中国近代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不但一般地承认一切事物都在变化，而且特别喜爱大的变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通过论述历史事件，抒发了他喜变厌静的心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①] 他还批评了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只是空想而已。这里，青年毛泽东看到了历史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不是无矛盾的平和的缓进，表现了他喜爱大变化的特殊气质，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但否定事物相对静止、社会相对稳定的意义和对历史“一治即有一乱”的看法，显然还不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其次是比较彻底的“抵抗”观念。青年毛泽东当时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了解对立统一规律，但他已模糊地猜到了事物的矛盾，知道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他的“抵抗”观念，反映了这一思想。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认为，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夫吾等所居之世界，所以异于仙境者，正以有各种抵抗，因而有与此抵抗相应之动作。”毛泽东完全赞同泡尔生的意见，并写下了“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

---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5—186页。

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① 一段话。在“对抗”观念上，毛泽东比泡尔生更为彻底。泡尔生认为，“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按照这种观点，随着人类抵抗力的日益增加，外界抵抗力必将在某一天趋近于零，人类的对立面就消失了，从而最终导致形而上学。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② 毛泽东相信对立面永远不会消失，显然是一种比较彻底的辩证法思想。

再就是认为“差别”普遍存在。毛泽东的“差别”观念同“抵抗”观念一样，也是模糊地表达了关于矛盾普遍存在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③，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等等差别相构成“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有差别而后有言语，有思虑，无差别即不能有之”④。他同时指出，既然有差别，就不可能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不可能有绝对的大同之境⑤。总之，差别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没有差别，就没有世界。这可以看作是《矛盾论》关于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最原始的表述和最早的思想准备。

青年毛泽东的辩证法还不十分成熟，其中包含着明显的相对主义因素，表现在他虽然承认差别的普遍存在，但又认为：“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一个形状也”⑥。还说：“事实本无区别，惟概念有区别，以便利言语记忆计也。”⑦这就是说，他不承认世

---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0—181页。
②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1、184页。
④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5、184页。
⑥⑦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5、244页。

界上的种种差别是由事物的不同本质决定的，仅仅看成是现象方面之不同，或由于主观认识的不同而产生的，或便于人们言语记忆而规定的，这样就否认了差别的客观性，导致了相对主义。

由于他把差别局限在主观范围内，所以必然在差别之间的关系上导致相对主义，即否认对立面转化的条件性，表现出明显的主观随意性。例如，他说："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未来，过去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① 他列举的这十几对"差别"，各有其内在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但是，每一"差别"的双方又各有十分确定的含义，彼此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不具备转化条件而未发生转化之前，是不容混淆的。青年毛泽东只看到"差别"的相对性的一面，而未看到绝对性的一面，忽视转化的条件，在这些对立概念之间简单地画上等号，这样一来，所有的界限便统统消失了，世界上一切本质上不同的事物都变成飘忽不定、不可捉摸的东西。

青年毛泽东发展观中的相对主义因素，与庄子哲学的影响密切相关。"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是庄子哲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庄子否认事物之间质的差别，认为贵贱、大小、有无、是非等等的不同，只是由于观察角度不同而形成的。青年毛泽东熟悉庄子哲学，因而深受其影响，他所说的"万即一"，显然也是从庄子的"万物与我为一"脱胎而来的。庄子哲学是他发展观中相对主义因素的理论来源。

4. 历史观

青年毛泽东的历史观，从根本上说，是唯心主义的，他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过分夸大精神的作用，企图在精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69—270页。

神领域寻找历史发展的最终根源，同时片面夸大个别人物的作用，希望圣贤出世，洗刷国民思想，改造中国社会。

首先是主张“观念创造文明”。他从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出发，片面强调“心之力”，夸大精神的作用，认为“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① 把社会文明看作精神的产物，强调精神作用，是唯心史观的表现。在社会意识诸形态中，毛泽东特别推崇哲学和伦理学。他认为“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②在他看来，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他相信“心之力”，主张“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③ 因此他热切希望“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④

其次是主张圣贤救世说。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必然相应地片面夸大个别英雄人物的作用。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按孟子所说的“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的标准，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君子养其大体，是劳心者和统治者。小人“养其小体”是劳力者和被统治者。小人从事各项具体职业，终日经营忙碌，“不得大体”，缺乏“高尚之智德”，所以在精神方面又归属于“愚人”一类。他把是否探得“大本大源”看作上智下愚的分界线，认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与未来，洞悉三界现象”，掌握“宇宙之真理”；贤人尊奉圣人之垂教，也能建功立业于当世，但无心穷究“宇宙之真理”。总之，在历史的发展中，是“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办法是“普及哲学”，使“愚人而悉归于智”，

①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68、86页。
③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86页。

"共跻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① 由此可见，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掌握"宇宙之真理"的圣贤；被称为"愚人"的人民群众，不是创造历史的积极力量，只有圣贤发慈悲之心，开其智而蓄其德，才能救国救民，改造社会，推进历史。这种"圣贤救世"说，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

5. 伦理观

同"唯我论"的宇宙观相联系，青年毛泽东的伦理观，突出地表现为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是庸俗的个人主义，而是"精神之个人主义"②。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二曰现实主义③。这里的现实主义同个人主义一样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尊现实，重现在，但这是尊我个人的现实，重我个人的现在。所以现实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是个人主义的补充，也可以说，现实主义亦即是个人主义。毛泽东主张的个人主义，即认为"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④ 这就是说，人的一切活动，一切道德行为，都是为了"成全个人"即为了"实现自我"。为他人谋幸福，表同情于他人，表面看来，是"爱人之心"的表现，实际上还是为了"实现自我"。墨子讲"兼爱"，佛家讲"普渡众生"，也都是为了"实现自我"。毛泽东把"实现自我"提到"人类之目的"的高度。他说："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9页。
②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51、203页。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3页。

之谓。"①

毛泽东还认为"利己"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核心和出发点，"利他"是"利己"的手段②。但这种"利己"，并不是追求个人物欲的满足，而重在"利情与意"，即重在满足精神方面的需要，故称"精神之个人主义"③。"精神之个人主义"以满足精神方面的需要为主旨，所以它可以把"利己"与"利他"统一起来。"利己"是核心，"利他"是条件。唯其能够"利他"，"利己"才摆脱了粗俗的对物欲的追求，而上升到高尚的精神境界。不仅如此，"精神之个人主义"还把小我和大我，"实现自我"与"变化民质"统一起来了。"各我集合，而成宇宙"，没有小我，就没有大我。要"变化民质"，必须从改造自我或"实现自我"做起。而实现自我的实质，正如前述"唯我论"一样，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和个性的解放，反对封建压迫和束缚。

由此可见，"精神之个人主义"是青年毛泽东伦理观的核心，其基本点是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高尚完满的人。这种"精神个人主义"是青年毛泽东伦理观上由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的契机，也是宇宙观上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一个中介。

### （三）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以上讲的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主要是指1918年6月一师毕业前的情况。一师毕业以后，由于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参加了革命实践活动，并通过对各种主义的反复检验和比较，认真总结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开展激烈的思想斗争，才逐渐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的。这种世界观的转变是同政治态度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1918年、1919年他两次到北京以后，政治上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哲学上由二元论转变为唯物论；1920年至1921年，经过

---

①②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6—247、241、151页。

“驱张”运动，特别是“自治”运动[①]失败后，政治上由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哲学上由唯物主义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哲学思想方面的问题。

1. 唯物主义思想原则的确立

首先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确立。一师毕业，特别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社会活动方面，因而对人生、社会等许多问题的哲学思考，不再停留在课堂上和书本里，而是转向了对现实的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分析。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批评康梁维新变法的思想时指出：“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我们试一取看那时候鼓吹变法的出版物，便可晓得。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刺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那时有一种‘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的风气，寻其根柢，多半凑热闹而已。凑热闹成了风，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②]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维新变法思想的批判，以否定的形式阐明了他的哲学见解：“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这可以说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朴素表述，从而转变了他在一师时期那种抽象地研究问题的态度，认识到要注重现代人生社会问题，要从实际出发 探求真理。

其次是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在湖南投身现实斗争，注意研究实际问题，并提出组织“问题研究会”，但这时他仍不能正确地解决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他所草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强调研究会只限于研究学理，至于实

① “驱张”、“自治”是湖南省相继发生的驱逐野蛮统治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和湖南试图通过人民制宪，实行人民自决自治的运动。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3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行，则是研究会以外的事，两者要分开。到了1919年11月，他在评论湖南发生的“赵女士自杀”事件时，转而提出“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①的思想，从而对理论和实际的关系的理解前进了一步，认为理论探讨和实际问题的研究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这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基本思想的朴素表述。

再就是强调实地调查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信中谈到他决定留俄但又暂不出国的理由时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② 这里，毛泽东强调：为世界尽力脱不开中国，而改造中国必须调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形；只有弄清中国的实际情形，才能更有效地出洋学习，在比较研究中，吸收那些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东西。毛泽东提出实地调查中国这块地盘内的情形的思想，正是他当时超出同时代思想家、革命家的重要之点。

2. 实践第一的基本思想的提出

毛泽东在“驱张”，特别是湖南自治运动过程中，深切体会到理论对于“运动”的依赖关系，认识到实际的改造运动较之理论的鼓吹更为重要。他说：“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③ 例如，湖南的自治，固然要从理论上加以鼓吹，以唤起未觉醒的人们的兴趣和勇气，“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

---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4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7页。

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① 1920 年 11 月 25 日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的信中又说：“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好的。”②这里所说的“实际的运动”、“实际的改造”，可以说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强调实际改造运动的重要意义，实质上是“实践第一”思想的一种朴素的表述。它标志着毛泽东由朴素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当然，这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和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这里指的“实际的改造”的内容，主要是指“社会实践”中的政治生活、革命斗争，还没有涉及社会实践最基本的形式——生产活动。

3. 提倡辩证思维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一师时期的辩证法思想，清除了相对主义和唯心论的杂质，基本上形成了辩证的思想方法。首先是变化观念演化为发展原则，把变化看作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他认为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潮流汹涌澎湃，“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③，因此，人们要顺应新潮流，接受和支持新事物。对于那班逆潮流而动的复古守旧分子，他则给以无情的嘲笑和抨击。当时有位参政在国会上大发议论说：“什么讲求新学，顺应潮流，本席以为应宗孔逆挽潮流。”毛泽东根据新事物不可战胜的发展原则讽刺说：这位先生“果然有此力量，那么，扬子江里的潮流，会从昆仑翻过去。我们到欧洲的，就坐船走昆仑山罢。”④把变化理解为前进运动，理解为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实际上也就是对相对主义的否定。其次是肯定了“差别”的客观性。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涉及到许多“差别”即矛盾，如

①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17、557 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92 页。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30 页。

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同盟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协约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同协约国及同盟国的矛盾，中国南北军阀之间的矛盾，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农民同田主的矛盾，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他都认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他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而解决这些矛盾。他还注意从因果的必然联系方面观察对立面的转化。他在谈到巴黎和会宰割德国的后果时指出："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联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① 历史果然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用因果联系观察对立双方的转化，实际上就是把事物的发展变化看作事物本身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的反面，从而把发展变化的原因归于事物内部。这表明，一师时期毛泽东形而上学外因论的残余基本上得到了克服。再次是出现了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的原始胚芽。当时健学会组织演讲会，由会员轮流发表意见，交流心得。演讲数次之后，便有人不看主流，乱加批评，全盘否定。毛泽东则明确表示："象这样的求全责备，我以为可以不必。在这么女性纤纤暮气沉沉的湖南，有此一举，颇足出幽囚而破烦闷。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②这种着眼于事物的主流或主要方面的思想，正是后来他关于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的最原始的胚芽。这也从一个方面清除了他辩证法思想中所混杂的相对主义因素。此外，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倡学术研究中要有批评精神，反对独断态度，破除对孔子的偶像崇拜，特别批评了学术研究中的"演绎式"的思维方式③。

"驱张"和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突出的表现是提倡辩证思维。1920 年 7 月 14 日，新民学

①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58—359、369 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68 页。

会会员罗学瓒写信给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的四种片面性观点，称其为四种“迷”：一是“感情迷”，即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二是“部分迷”，即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体；三是“一时迷”，即拿一时现象推断结局；四是“主观迷”，即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毛泽东在同年11月26日复罗学瓒的信中，对罗的观点极为赞扬，认为“四种迷，说得最透彻，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并从哲学上加以概括：“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即逻辑——引者）的错误。”① 毛泽东还以这一哲学思想来严格解剖自己。他说：“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的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作文时也有）。”② 毛泽东这一自我解剖和自我鉴定表明，他当时已能够坚持用客观的、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避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但同时他又承认自己还不能时时处处贯彻这一辩证思维的方法，仍有某些片面性错误，而且还存在着感情用事、因人废言的短处。这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对于一个刚刚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来说，也是难于避免的。

4. 确认唯物史观

---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66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66页。

确认唯物史观，特别是确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重要标志。

"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在历史观上已经有了唯物史观的萌芽。首先表现在他开始重视物质生活和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一师毕业以后，毛泽东积极参与社会现实斗争，刻苦攻读各种社会主义新书刊，从理论上受到唯物史观的启蒙。1919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① 这一思想与一师时期的"观念创造文明"的唯心史观形成鲜明的对照，表明他开始重视物质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深入了一步。对于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社会地位的问题，以前，毛泽东竭力从精神方面寻找原因，现在则认为，少数贵族资本家所以能压迫民众，原因在于他们有知识、金钱和武力②，而他们有知识并不是因为天资聪明，而是因为垄断了教育。这里虽然仍把"知识"放在第一位，但毕竟并列地提出了"金钱"和"武力"两个物质因素。数千年来，为什么女子受男子欺压？他也试图从经济方面寻找原因，在关于赵女士自杀事件的评论中，他认为经济不能自立，"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③。其次是高度评价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巨大作用。这一时期，在他《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文章，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④，并系统地论述了民众联合的必要性、成功的可能性及民众联合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回答了民众有无联合的觉悟、动机、能力等重大问题。这些论述有的不一定很精当，如在回答为什么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时，仅从"一国的民众总比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这种简单的数量关系上去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2页。

②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9、422页。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2页。

确认，这当然是相当朴素的，但同一师时期"圣贤救世"的历史观相比，不能不意味着立足点的转变。

这一时期，毛泽东虽然有唯物史观的萌芽，但总的说来，其历史观还是唯心的。因为这时他还不懂得社会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复杂的有机体，不是"人群"、"团体"的简单"联合"或机械组合；他还不懂得阶级划分的基本依据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不是知识、金钱和武力的并列，阶级关系主要的是剥削压迫关系，不是简单的智愚、贫富、强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民众联合以后如何行动的问题上，即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上，他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还不承认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时他还相信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具有空想色彩的工读主义、新村主义。例如他说，在如何打倒强权的方法上，有激烈的、温和的两种，我们选择温和的方法，"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① 在对人的方面，我们"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②又说：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两派主张：一派以德国人马克思为首，主张用激烈的方法，"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他认为，"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③与此同时，他还一再提倡工读主义，搞新村试验。由此可见，清除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接受阶级

①②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3、293—294、341页。

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成了毛泽东世界观彻底转变的关键。

1919年冬毛泽东为"驱张"运动第二次到北京，1920年7月回湖南。在此期间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无政府共产主义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加上北京、上海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他逐渐认清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空想性质，确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还不能认为这时毛泽东已完成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事实上，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是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后，又经历了湖南自治运动的教训而最终完成的。他第二次从北京回湖南后，一方面着手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筹组青年团，从政治上把工人组织起来；一方面积极参与和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应该说，当时的湖南自治运动以至毛泽东提出的"湖南共和国"方案，还没有超出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从毛泽东论述自治运动的原因、目的和手段等方面看，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改良主义的，还没有达到承认暴力革命的水平。自治运动中反动当局的种种卑劣阴谋和罪恶行径，给毛泽东以极大的教训，运动最后以反动军警的镇压而失败。这就使他认识到，用温和方法实行政治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感慨地指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①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彻底批判和清算了无政府主义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否定了社会改造的温和方法，肯定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完成了政治思想的转变，同时也就完成了哲学世界观的转变，主要标志是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两封信以及《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现作一简要的分析。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48页。

从"五四"运动到建党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历史观上分歧的焦点，用当时的话说，不在于承认不承认"经济决定论"，而在于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学说。对于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潮的不少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难理解、最不易接受的也是阶级斗争学说。"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的态度也大体如此，所以他主张用温和的方法同强权者作斗争。"自治运动"期间，他对反动统治阶级仍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希望他们能"遵守民治"、"顺从民意"。运动失败后，他才有所觉醒。

关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问题，即"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具体途径问题，当时在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中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两派意见：一派是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一派是以肖子昇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蔡和森和肖子昇都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争论的情况，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 1 日给他们写了复信，信中毛泽东对蔡和森关于"用俄国式的方法"，即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而对肖子昇等的主张，即"用平和的手段"、"教育的方法"，"谋全体的幸福"则"不表同意"①。接着毛泽东对主张用教育的方法实现社会改造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批判。他指出：

第一，办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当时，钱和教育机关尽在资本家手中，主持教育的人也是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仆。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是因为他们有议会制定保护资本家而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有军队、警察保护资本家的安乐，禁止无产阶级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为其生产品垄断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② 资本家利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8 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 页。

用他们手中的教育大权，鼓吹资本主义，使共产主义宣传很难产生大的效果。所以教育方法行不通，必须采用俄国式的恐怖方法。

第二，从心理及历史上看，“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是难以“回心向善”，放弃发财欲望的，“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从历史上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①

第三，用和平方法去达到共产的目的，是遥遥无期的，无产阶级要倍受痛苦；且无产者已逐渐觉悟，有了革命要求，并已成了一种事实，因此用激进的方法行动，是自然之事。

第四，无政府主义也是行不通的。“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能出现的；就是出现了也难以终其局，其结果必然“人满为患”。

最后他说：“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②

毛泽东在这里对肖子昇等人的用温和的、改良的方法改造社会的主张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过去的“呼声革命”、“无血革命”思想的清算，从而肯定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1921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发言，对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种种方法逐一作了分析，进一步肯定了激烈的阶级专政的方法。他指出：“社会政策（指社会改良主义——引者注），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6 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8 页。

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

1920年9月蔡和森曾给毛泽东一信，简明扼要地阐明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根本区别，从哲学高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他说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思想，是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是重理想而轻生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有产阶级的唯心论相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他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现，称作"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他指出，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诬蔑唯物史观，是为了反对革命，主张改良。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复信，对蔡信阐述的观点，表示毫无保留地"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即唯心论——引者注）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因为一个社会如同一个工厂，没有政治组织，没有生产分配管理，是不可能存在的。"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② 这样，毛泽东就进一步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从哲学世界观上确认了唯物史观，并认为它是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蔡和森来信指出，共产党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是神经中枢，并提出中国建党的必要性和步骤。毛泽东在复信中告诉他，"党的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引者）先生已在进行组织。"③ 事实上，毛泽东从1920年10月即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建党作准备。这样，毛泽东不但找到了改造社会的正确道路，而且找到了社会改造的领导核心——共产党。从此之后，他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关于社会改造的主张，就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5.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原因和特点

综上所述，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是由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转变过程。在不长的时间里，毛泽东的宇宙观由唯心主义的无我论转变为唯我论，又很快由唯心论转向二元论，并通过二元论为契机，开始向近代唯物主义发展；在提出实践第一的基本思想之后，即转向了辩证唯物主义。其历史观起初也是唯心的，后来首先在重视物质生活、经济因素以及人民群众的作用方面出现了唯物史观的萌芽，最后以确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为标志，完成了历史观的转变，并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党的哲学根据。他的哲学世界观的转变又是同政治思想的转变分不开的。因为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及党的领导，等等，往往有重合之处，这样，便使得政治思想的转变和哲学世界观的转变，难以完全区别。毛泽东之所以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世界观的转变，首先是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他就从当时的报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920年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初步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他后来自己回忆的那样：“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① 其次是积极投身伟大的革命实践。“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潮广泛传播，使人眼花缭乱，但迅速发展着的革命实践，为人们提供了鉴别各种理论真理性的最为可靠的试金石。正是这种革命实践的检验，帮助青年毛泽东认清了种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行不通和无政府共产主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22 页。

义的空想性质，从而迅速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转变。最后是经过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和自我否定，才完成世界观的转变的。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仅在实践上经历了“驱张”、湖南自治运动的教训，而且在理论上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与同志、朋友的切磋琢磨乃至激烈辩论（如1920年底1921年初复蔡和森的信、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批评了各种错误观点包括清算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才彻底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界限。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以及和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较，有这样一些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在批判旧哲学中达到的，而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来；中国当时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参加实际斗争，但侧重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则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更为注重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注重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这是他的特点和优点，但由此也带来了一个弱点，即理论准备不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唯物史观的了解不尽全面系统，对自己以往的哲学观点来不及从理论上深入批判，因而晚年思想上难免出现某些向早期思想回归的现象，这也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演变时不能不注意的。

# 第二章　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和毛泽东哲学的萌芽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在中国有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初步运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毛泽东积极投身于工农革命运动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以及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初步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基本思想，表明毛泽东哲学开始萌芽。

## 第一节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以及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是毛泽东哲学产生的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研究毛泽东哲学的萌芽、产生，必须认真考察这些条件。

### （一）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运用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较之五四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译介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组建了自己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人民出版社仅在1921年8月至

1922年5月，就集中出版了马列译著15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已同读者见面。此后，列宁的《卡尔·马克思》、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也刊行问世。苏联、日本等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多种哲学论著也相继翻译出版。同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述，如李大钊的《史学要论》、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也先后发表、出版。

其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革命刊物、学校、群众团体纷纷创办。《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新时代》等刊物发表了许多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国情，批判各种反动思潮的文章。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成立了各类学校或群众团体，有组织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设在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曾发展到二三百人。192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通过讲坛和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党的干部的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其次是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传播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但在五四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的特殊需要，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接受的是唯物史观，而当时宣传重点又是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思想。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唯物史观在我国的传播有了新的进展，内容上已趋向全面、系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国家、革命，社会意识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基本原理都已涉及。1923年以后，辩证唯物主义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由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逐步扩展到辩证唯物主义领域。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这种趋向的代表。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而且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已得到初步的运用。这种运用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根本方法去指导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大”到“四大”，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国情，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一大”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目标，但指导思想上有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的倾向，认为可以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二大”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即第一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第二步实现社会主义，但两步分开后又怎样联系起来，并没有解决。“三大”讨论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但过分强调了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幼稚，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注意不够。“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强调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联盟，并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但又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力量，无产阶级要同农民中哪些阶层结成可靠的联盟还不清楚。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特别是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作用作出正确的估计。毛泽东在实践中根据前人已取得的成果，解决了这些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所掌握的哲学理论去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如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戴季陶用唯心主义的“民生哲学”来对抗唯物史观，说什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

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一个国民革命，绝不是革命者所应取的途径”；他鼓吹抽象的人性论，说什么“仁爱”是人类生活的基础，“阶级对立是社会的病态”，中国社会两个阶级的对立不明显，因此不应取革命的方式；他还污蔑工农革命运动是无法无天的“捣乱运动”。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集中的批判，指出戴季陶根本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开河，他不了解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其实，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马克思运用这种方法找出了一切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生活上物质的经济条件的变化，人类的历史是一卷阶级斗争的历史；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完全可以由唯物史观加以说明，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并不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现代社会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只能用社会革命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国民革命虽然要求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但并不排除阶级斗争，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并不破坏国民革命，而是促成国民革命；当然这种阶级斗争是有一定“限制”的。他们指出，戴季陶所谓地主资本家能以“仁爱”之心为工农着想的说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他口头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所谓仁慈主义，实际上是进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点也不仁慈。

国家主义派抹杀国家的阶级实质，否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他们说：“国家是什么？是一定的人民，占有一定的土地，保持一定的主权”，“国家者全国人民的国家，不是几个人或一阶级的专利品”，国家“根源于人类的社会本能、相依相助之需要与爱群之天性”；他们鼓吹“阶级合作”、“全民革命”和抽象空洞的“爱国精神”。陈独秀、恽代英、肖楚女等对这些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指出：“国家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

的利益”；国家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现在要建设的是民主的国家，将来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共产党人不反对爱国精神，但反对拿“爱国”的空话欺骗无产阶级，妨害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他们指出，国家不是什么人类爱群、互助、利他等天性的产物，而是从经济生活、从压迫和剥削中产生出来的，并进一步揭露了国家主义的实质是“拿国家的观念来压倒阶级的观念，想用‘整个民族’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通过对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也为毛泽东哲学的萌芽、产生准备了思想条件。

### （二）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和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

马克思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 毛泽东哲学的萌芽、产生是以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为前提的。毛泽东积极投身工农革命运动，是他的哲学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的主观条件。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出席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形势。

首先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21 年 8 月成立了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邓中夏先后担任主任；1922 年 5 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从 1922 年 1 月至 1923 年 2 月，在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有 30 多万工人进行了 100 多次罢工。其中主要的有苏兆征、林伟民领导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毛泽东领导的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张国焘、罗章龙等领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5 页。

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这些罢工有的胜利了，有的失败了。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是，工人阶级不能孤军奋战，必须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军；工人必须有革命的武装，否则就会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而失败。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工人运动又进入高潮，上海工人运动得到学生、商人的支持，全国各地的群众也起来影响，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工人发动反帝大罢工，使繁荣的香港一时变成了“死港”，这次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一大”闭幕以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领导了工人运动。为了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他在长沙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以后的两年中他集中力量领导了长沙、安源等城市和工矿业中的工人运动。

对于农民运动，我党开始注意不够，认为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有精力去搞乡村工作呢？开始只有彭湃等人从事农民运动。1922年5月他深入广东农村，在海丰及其附近的地区组织农会，发动农民进行减租退押，反对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的斗争，海丰总农会有会员2万多人，管辖人口10万人。1924年7月他又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第一届一直办到第五届，训练农民运动干部450多人，他们经过训练后被派到农村作农运工作。到1926年5月，广东省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县达61个，会员60万人，并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农民运动的兴起，对于当时孙中山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支持国民革命军东征，消灭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主力，对于支持省港大罢工，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5年春，毛泽东开始在湖南做农运工作。他首先在韶山等地创办农民夜校，然后在20多个乡成立农民协会，开展了“阻禁”、“平粜”等一系列斗争，6月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1926年

3月毛泽东担任了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接着在广州举办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又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1月毛泽东亲赴湖南湘潭等五县，用了32天的时间深入考察农运情况，在此基础上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再就是建立统一战线，进行北伐战争。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人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还分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在国共合作下，创办了黄浦军校，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力量，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6年4月开始了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由广东北上推翻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全国封建统治。北伐军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占领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武汉，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义配合北阀军占领上海。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从此发展到夺取政权的新阶段。

工农革命运动的开展，要求有适合中国情况的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理论，便适应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

##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的萌芽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为毛泽东哲学的产生准备了必要条件。毛泽东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解决革命运动中的实际问题，写了《外力、军阀与革命》（1922年4月10日）、《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

(1925年11月21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1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等文章，作了《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1926年3月18日)、《中国农民问题》(1926年6月)、《农村教育》(1926年6月》等讲演，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科学的分析，充分肯定了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基本思想。这些文章和讲演中体现了"唯物（客观)"的认识路线，矛盾分析的辩证法思想，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群众观点的唯物史观，说明毛泽东哲学开始萌芽，其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这种萌芽的重要标志。

## （一）论述了"唯物（客观)"的认识路线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他要求工农群众懂得，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工农必须掌握这种宇宙观来为自已谋解放。1926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学员讲演时指出：

> "现在世界上的主义有两派：1. 唯心（主观)；2. 唯物（客观)。唯心派代表资产阶级的，他不需要谋生活，而希望休息成佛的，如德国康德，就是这派的代表了。唯物派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无产者掌握政权的。德国的马克思，就是这派的代表了。唯心派的人，都是抱悲观的，如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唯物派是乐观的，凡事失败，是明白原因的，不悲观的，如现在的革命派人都是的。"①

---

① 《农村教育》(1926年6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冯文江听课笔记，载《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第108页。

这段议论是根据学员听课笔记整理的，一些提法和用语虽不很确切，但意思是非常清楚的。这里，毛泽东认为，唯心必然主观，就是说唯心论者只从自己的思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唯物必然客观，就是坚持从头脑以外的事物出发，以外界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思想。他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是两大对立的哲学体系，在现代，它们是两大对立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一般地说，资产阶级养尊处优，骄奢淫逸，要维持其统治，就必然不顾客观事实，颠倒黑白，奉行唯心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从唯心论的立场出发，对中国的前途悲观失望，看不到中国社会的出路，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敢正视现实，只相信自己，蔑视工农。中国无产阶级则不同，它不甘心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地位，寻找新的出路，因而必须正视现实，努力探求造成自己贫困处境的原因，这就必然相信唯物论。中国无产阶级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因而对前途保持乐观态度，即使在斗争中遭受暂时的挫折，也不会悲观失望。

毛泽东所强调的唯物论，当然不是机械唯物论，而是辩证唯物论。唯物论者尊重的事实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认识要随事实的变化而变化，不能用凝固不变的观点看问题。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内的一些人物，不能把他们看死了，他们有的昨天还能革命，但今天革命革到他们代表的阶级头上，他们便会不革命或反革命了。统一战线也是这样，它处在不断分化改组之中，如果用凝固的观点看问题，便要上当，便会发生错误。1925年他在分析国民党右派的变化时指出："现今世界上的东西，无论是那动物（如人之类）或静物（报纸之类），不必看得太拘板。因为'革命''反革命'分了家，那些动静物件，可以今天在这家，也可以明天在那家。"前者以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一班人为例，他们在国民党时，是国民党员，被北洋军阀段祺瑞收买以后，虽然还挂着国民党的招牌，但只能算是段祺瑞的人了；后者以香港

《晨报》为例，它曾经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后来被广东军阀陈炯明等人收买过去，便只能算做他们的报纸了。所以观人察物，必须有变化的观点，否则便要上当①。陈独秀就是没有接受这种看问题的辩证方法，他把蒋介石看得过死，不承认蒋介石的变化，直到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采取反共行动之后，他还口口声声说看不出蒋有一点反革命的影子，以致后来当蒋彻底叛变时，毫无准备，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 （二）阐明了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如前所述，1920年毛泽东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后，就确认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用它来观察国家命运，特别是研究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大革命时期，他坚持和发挥了这一思想，1926年他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学员讲课时，把唯物史观通俗地称为马克思为工农锻造的“锄头”②，要求大家用这个锐利的“锄头”去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同年，他在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的讲演中专门论述了阶级斗争问题，他说：

>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

① 《三三三一制》(1925年12月5日)，载《政治周报》第1期。
② 《中国农民问题》(1926年6月)，见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冯文江听课笔记。

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满清政府，而不知道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①

这段论述尽管个别用语、文字不一定确切，但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人类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演进的历史；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第一次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大革命；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怀疑或否认中国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太平天国革命不是汉满民族矛盾，而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必须透过现象看实质，坚持用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

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初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

第一，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分析。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中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原理，从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出发，进而分析它们对革命的各种不同态度，以此区分敌我友，确定革命

① 《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1926年3月18日)，载1926年3月31日《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第2期。

的对象、动力、领导。

毛泽东根据党的“四大”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中产阶级两部分，认为大资产阶级即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一起构成革命的对象。他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①] 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毛泽东的贡献，他的贡献在于正确分析了它们对革命的态度，特别是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毛泽东不同意“四大”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还处在由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到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过渡之中，因而不能参加革命的看法，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其欲望是想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而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因而对革命取矛盾态度，是一个动摇不定的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由于受打击压迫，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反封建，另一方面，当着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资产阶级积极援助，对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发展感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的政治主张是企图实行以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毛泽东指出，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只能是一种幻想[②]。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1923 年 7 月毛泽东在《向导》上的一篇短文中已初步涉及，他说，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包括商人，在这种二重压迫下痛苦很深，形势的发展，逼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4 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4—5 页。

得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要求革命了；同时他又警告商人，不要再蹈从前那种拒绝工人加入联合阵线的覆辙；现在商人们既已踏上了革命的第一步，就要赶快踏上第二步，“切不可稍遇阻力就停止不进，或更走向和外力军阀妥协的错路上去”[①]。这里，毛泽东已开始提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问题，但是就具体事件而言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则使之普遍化、理论化了。

关于无产阶级的分析。中国现代产业无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成长起来的，有它的优点和弱点。陈独秀片面夸大中国无产阶级的弱点，而忽视它特有的优点，一再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幼稚。针对这种观点，毛泽东着重阐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点。他指出：中国产业无产阶级有“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②]。这就是说，中国产业工人不仅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而且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营的产业的发展而发展，它比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要广大，要成熟。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中国无产阶级不仅有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共有的特点（与大生产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等等），而且有自己独具的特点：力量集中；经济地位低下；深受三重压迫（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为了反抗这种残酷的压迫，“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③]。1951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将工业无产阶级“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修改为“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更鲜明地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种修改是合理的，因为毛泽东在《分析》一文发表前后

① 《北京政变与商人》（1923年7月11日），载《向导》第1集第31、32期合刊，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页。

的其他文章中有过明确表述，最明显的是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①]，文中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

第二，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分析。这是对阶级分析方法的一大贡献，对于正确解决革命的路线和策略问题有重要意义。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又进一步把它区分为两个部分即右翼和左翼。其右翼与帝国主义、军阀有较多的联系，当他们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会很快站到帝国主义、军阀一边，成为完全的反革命；其左翼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此派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害怕"赤化"，对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这种分析是实现重大理论突破的关键，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科学抽象。这种分析表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我们必须及时发现这种变化。有了这种分析，我们就可以懂得，作为右翼代表的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并不等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背叛革命了；但是如果对民族资产阶级不加以提防，其左翼也可能变为我们的敌人，如当时的汪精卫，陈独秀只同他讲联合，不讲斗争，最后使他倒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毛泽东的这种分析，是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中作出的分析，即动态分析，不是公式化、定型化的分析，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内部各阶层的分析，更是前人和同时代人所没有或少有的。我党从"一大"到"四大"，逐渐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当时党的工作重点还放在城市方面和工人运动方面，对农村情况缺少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各种不同的农民缺少具体的阶级分析。正因为没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不知道去争取农民作同盟军；

---

① 载1926年9月21日《农民运动》第8册。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则武断地认为中国农民各阶级之间无明显的分化，他一方面抽象地承认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伟大势力，另一方面又笼统地说中国农民“散漫”、“保守”、“苟安”、“难以加入革命”。毛泽东批评了上述两种倾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当时习惯称为佃农、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和雇农等农民内部各阶层作了具体的阶级分析。

毛泽东指出，农民内部分为中农、贫农、雇农等几个阶层：

中农，指自耕农的大部分，他们所经营的是小生产经济，是农村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虽同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实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对革命取怀疑态度，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对革命取中立态度；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较易参加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三部分人平时对革命的态度各不相同，但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都倾向于革命。

贫农，指贫苦的佃农、半自耕农等，他们所经营的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从经济状况来分，也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其革命性也因而略有区别，但总的来说，贫农是革命的中坚，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

此外，还有富农，主要指少数自耕农，他们放高利贷，有雇工剥削，出租部分土地，是农村中的中产阶级。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极易妥协。

以上这种对农民各阶级、阶层的分析表明，既不能笼统地说各种农民都是“国民革命的伟大势力”，也不能统笼地说各种农民都“难以加入革命运动”，而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这样，毛泽东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党在领导农民运动中应当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解决了党的“四大”没有解决的无产阶级应当同农民中哪些阶级、阶层结成巩固的联盟的问题，解决了只占全国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到哪里去找最广大的同盟军的问题。

第三，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要正确地估量阶级关系，正确地制定政策，除了必须正确地分析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外，还应注意分析阶级的人数，即不仅要对阶级作质的分析，而且要作量的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稿① 一开始就将各阶级的大略人数与经济地位、阶级性、对革命的态度一起作为分析阶级的内容，文中又对各阶级、阶层的人数作了大略的统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四百分之一；中产阶级四百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小资产阶级总共二万万人，占全国人口之一半；无产阶级总共四千五百万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文章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这种数量分析，对处于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很重要的，是一种很大的鼓励。但因中国无精确的可靠的统计资料，文中所列举的数字只能是大略的，其中难免有不准确之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者在将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删去了对各阶级的数量分析的文字。

第四，分析和综合相结合。文章先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政治态度、大略人数逐一进行分析，然后加以科学的综合，概括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的总面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基本思想。文章结尾部分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

① 载 1925 年 12 月 1 日《革命》（半月刊）第 4 期。

阵线。

### （三）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

社会革命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在1920—1921年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已明确了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大革命时期，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社会革命的实质，各种革命形式及其相互关系，阶级、政党和领导者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观。

第一，阐明了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一个政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首先明确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如果在阶级阵线上混淆不清，甚至颠倒敌我友，革命是一定要失败的。所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一开头就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① 这是一条普遍规律，中国如此，其他一切国家都是如此。而革命开展起来以后，中心问题是夺取政权、使用政权和巩固政权。1926年6月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课时指出：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得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要改革一切，重新建设一切，否则是不行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②。他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页。

② 参见《中国农民问题》（1926年6月），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冯文江听课笔记。

又指出："乡村的农民，一起来便碰到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①]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因此，农民组织起来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的权力打下去，把农民的权力长上来，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②]。

第二，说明革命的实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泽东针对当时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的污蔑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科学而形象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③] 其意思是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行动，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不是维护旧制度，保持旧统治的社会改良。他所强调的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方式只能是暴力即暴烈行动，不能是温和的、不流血的、教育的、议会的方式，后者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第三，说明了革命斗争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斗争的运动。内中表现最特别的尤在政治斗争这一点。"[④]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又结合当时湖南农民运动所做的十四件大事，提出了革命斗争的三种形式：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并强调政治斗争是首要的，只有首先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使一切权力归农会，人民手中有了政权，经济斗争才能开展。政治斗争是经济斗争的

---

①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1日)，见《农民运动》第8册。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1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17页。
④ 见1926年9月21日《农民运动》第8册。

前提，经济斗争又是政治斗争的目的，随着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胜利，文化斗争也会发展起来，这就是三种形式的相互关系。

第四，论述了阶级、政党、领袖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认为，革命不是少数集团、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行动，革命的胜败归根到底取决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中国革命的成败决定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毛泽东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① 阶级、群众是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政党的领导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革命的成败。政党与阶级、群众的关系是："革命党本身是代表民众利益的，凡是一个不能代表民众要求的党，是不能成立的。"②"革命党好比火车头，火车头行驶的轨道必须建筑在工农阶级之上，不然就要陷入泥潭沙石之中"③；而"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④ 领袖则是阶级、政党利益的代表、集体智慧的表现，对于革命有重要的作用。阶级敌人懂得这一点，所以地主豪绅为了打击农民运动，便污蔑、打击农民领袖。毛泽东指出，要维护农民领袖的威信，谁打击农民领袖，谁就是"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⑤。革命时期，农民领袖即使有某些缺点错误，只能在整顿农会纪律的口号下加以解决，而不能在敌人面前公开损害他们的威信。这是对阶级与领袖关系的科学分析。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16页。
② 《中国农民问题》，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金绍勳的听课笔记。
③ 见《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1926年)。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22页。

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① 在给第六届农讲所学员讲课时，毛泽东还从农民在全国人口的比重上，在生产的作用上，在革命的力量上，在与工人、知识分子、商人、士兵的关系上，详尽地说明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他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生产的主力军，是工人的同盟军，农民问题不解决，知识阶级没有出路，商人问题亦无法解决，士兵问题亦无法处理。结论是：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各阶级问题，若不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故国民革命的大部是解决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②。

第三，宣传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观点。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革命的激情，热情歌颂了农民的革命行动，认为"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③ 贫农阶级，不是什么"痞子"，而是革命先锋，"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④农民发动起来以后，农村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的"恐怖现象"，那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农民反过来对他们的惩罚，不是胡来的，而是有明白的计算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⑤ 毛泽东还提出，革命的领导者要树立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绝不能包办代替，为群众包打天下。他以农民群众对于封建宗祠、封建迷信的认识为例，指出："菩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页。
② 《中国农民问题》(1926年6月)，见农讲所学员金绍勳的听课笔记。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2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页。

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①

毛泽东还指出，对人民群众和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如何，是检验革命党和革命领导者的试金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革命的真正动力，而群众创造历史和推动革命，总是在他们的政党和领导者引导下进行的。然而政党、领袖的领导作用的发挥程度，则取于集中群众智慧、反映群众利益要求的程度，取决于对待群众的态度，取决于能否和群众站在一起，并引导他们前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而且还要根据中国国情，看到农民阶级的巨大力量和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并能够对他们进行恰当的组织和引导。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面前，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受到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②这将成为区分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因此，毛泽东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拥护农村的革命变动，"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③，"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④

在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问题上，毛泽东曾经说过"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是为了反对当时的改良派而提出来的，即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能用改良的方法。但我们不应把它当作一条普遍性的原则到处套用，否则就要犯"左"的错误。因为"过犹不及"，"过正"和"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页。

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12、16页。

及"一样，都不符合辩证法，都违反了在一切问题上必须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思想的。

综上所述，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及社会革命论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这些论述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后来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这一切表明，毛泽东哲学在这一时期已开始萌芽。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的特点，首先是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挥。毛泽东把唯物史观当作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工具（即他所说的"锄头"），发挥哲学的方法论功能，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可以说，毛泽东哲学首先是从唯物史观萌发产生的，它一产生就带有鲜明的革命性、实践性。其次是与上述情况相联系，毛泽东在他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研究中虽然渗透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但对于唯物辩证法理论，尚未有专门的论述；也还没有专门的哲学论著。正因为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还处于萌芽状态，因而显得还不很系统，某些问题的表述也不一定准确。然而，毛泽东哲学的基本观点，如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矛盾分析、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群众路线等等，已经萌发产生，随着中国革命的纵深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日益结合而逐渐成熟、完善和系统化起来。

# 第三章　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探索和毛泽东哲学的形成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在同“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中，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论文，标志着毛泽东哲学已经形成和系统化。

##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与党在理论战线上的任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大革命，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归于失败。蒋介石建立起来的政权，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不过是新军阀的统治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而已。全国工农大众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处在反革命统治之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也没有改变。但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因为敌人占领了所有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反动势力大大加强，白色恐怖遍及全国，而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农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从全国范围来看，革命已由高潮转入低潮。中国革命

面临一个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党的任务就是要深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探索新的革命道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制定新的路线和策略。

在这种形势下，从20年代末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192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已在上海出版；1929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已有全译本；1930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的《札记和片断》，都已出版。特别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已由吴黎平全译出版。1932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已经有了四种中译本。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地、较为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基本的必要条件。1932年4月，红军打下了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方面的书籍送到总政治部，其中就有《反杜林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毛泽东这时和后来在长征途中曾研读过《反杜林论》[①]，在中央苏区和到延安以后，他还多次同吴黎平研讨过《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②]。

其次是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

---

① 参见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3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页。

产生了一批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积极成果，如1931年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列宁格勒分院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简称《西洛可夫教程》），1933年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简称《米丁教程》），1935年米丁、拉里察维基等撰写的《大百科全书》第22卷辞条《新哲学大纲》等，分别由李达、雷仲坚，沈志远，艾思奇、郑易里翻译出版，在国民党统治区有较大影响，后流传到延安。1937年7月以前，毛泽东曾认真阅读过《西洛可夫教程》和《米丁教程》，对前者看了两个版本，写了12 000多字的批注，对后者写了2 600多字的批注，为写作《实践论》、《矛盾论》作了直接的准备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引起地主资产阶级的恐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所谓文化"围剿"，张东荪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叶青的托洛茨基派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猖狂反扑，以艾思奇、胡绳、邓云特（邓拓）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张、叶的反动哲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开展了关于辩证法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从1930年一直持续到1936年，内容涉及广泛的哲学领域和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内因与外因的关系、运动与静止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为毛泽东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概括提供了思想资料，特别是论战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②、《哲学与生活》，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① 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最早在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杂志第一、二卷（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连载，1936年1月出版单行本，同年6月出第4版时改名为《大众哲学》。解放前印行了32版，解放后曾修改再版，1979年又印行了35万册。

形成和系统化，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哲学与生活》于1937年4月在上海出版，它是一部深入批判张东荪、叶青的错误观点，并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论著。此书出版后，毛泽东迅即阅读，并作了几千字的摘录，1937年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称赞该书是艾思奇著作中“更深刻的书”，同他讨论有关问题①。

与此同时，李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研究和宣传。他的著名的《社会学大纲》，1935年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铅印，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后，李达立即寄给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很高兴，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在书上作了3500字的批注②。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大革命失败后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先是1928—1929年瞿秋白的“左”倾路线，接着是1930年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后来是从1931年开始的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鼓吹“无间断的革命”，不承认革命低潮，要求组织中心城市暴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否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左”倾错误一次比一次严重，给革命造成的危害一次比一次大。就其思想根源来说，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一般和个别相脱离。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理论就是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① 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04页。

② 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05—276页。

## 第二节　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探索与矛盾特殊性思想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这个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在同一原则下，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执行这一原则，则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和道路。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是通过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而夺取政权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斗争的中心工作，也都集中在城市。因而，在城市组织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初期，由于还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还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因此也就照抄照搬这种思想和经验，以大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起义，走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的道路。在 1927 年“八七”会议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许多省市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虽然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敌人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自己又没有革命根据地作依托，结果都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1927 年 9 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原计划也是以进攻大城市长沙为目标的，但起义部队在战斗中受到了各种挫折。毛泽东及时分析了主客观条件，吸取了其他部队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攻打长沙是不利的，于是决定率领起义部队向反动派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 年 10 月）、《井冈山的斗争》（1928 年 11 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 年 1 月）三篇文章，论述深入农村，

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初步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特别是矛盾特殊性的思想。

### （一）提出了区别不同情况，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矛盾的原理

毛泽东首先从矛盾的总体上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他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①。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②由于中国社会的这一总特点，使中国革命具有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又不同于殖民地国家的许多特点，主要表现是：第一，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混战，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由此产生了第二个特点，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第三，农民问题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第四，这种农民斗争，毫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根据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唯一正确的结论是，以城市为中心或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8、47页。

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① 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只有把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取得全国的胜利。这里，实际上已体现了矛盾特殊性原理中关于区别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矛盾的思想。

### （二）说明了矛盾的特殊性是和条件性相联系而发生的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规律时，非常强调分析中国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问题，详尽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和中国革命主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毛泽东对“工农武装割据”之所以能在中国发生，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的原因和条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② 毛泽东从主客观方面分析了这些条件：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一方面，中国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样就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使无产阶级可以依靠农村，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并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坚持和发展。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那些受过大革命影响，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起来过的地方。第三，小块红色区域能否长期存在，还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样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9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48—49 页。

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也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的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①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也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紧要条件。这些条件就构成了中国革命的独有的特点、特殊的道路和特殊的规律。这些分析说明了矛盾特殊性的条件性。

### （三）涉及到了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力量不平衡性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十分微弱，因此它基本上是一种地方的农业经济。这样就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景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及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②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必然造成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各种矛盾力量在各地分布、配置的情况也不平衡。从城市和农村看，反革命力量在城市特别强大，在广大农村则相对薄弱，革命力量就可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8页。

在农村存在和发展。农村有不依赖城市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可以离开城市而独立存在，革命力量就有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从南方和北方的情况看，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南方革命力量比较强大，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而闽、浙、赣三省敌人军力最弱，其中江西的革命的客观条件最好，因此，可以在这里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可见矛盾的特殊性是和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分不开的。

**（四）红色政权波浪式发展的战略和“十六字诀”等游击战术的提出，都是矛盾特殊性思想的体现和运用**

毛泽东在谈到红色政权的发展是流浪式地向前推进时指出：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当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敌人联合起来进攻根据地时，我们的战略必须有所改变，采取逐渐地推进的办法，“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①。这就是说，红色政权的发展是要在巩固的基础上发展，巩固过程中有发展，发展过程中有巩固，因而显出波浪式来，这种波浪式也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的表现。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所总结的红军的游击战术，即“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我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办法，发动很大的群众”等等，都是根据敌我双方矛盾的特殊性、矛盾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性制定的，都是矛盾特殊性思想的具体运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8页。

### （五）从联系和发展上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是研究矛盾特殊性的一条重要原则

毛泽东在回答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时，所采取的就是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他说："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① 由此，他对中国社会当时存在的诸多矛盾进行了比较，找出基本的矛盾。他先从帝国主义的矛盾运动的发展看问题，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帝国主义的三大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由于1929年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帝国主义为摆脱危机，准备重新瓜分世界而酝酿着的世界大战等因素而导致激化。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统治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激化了，必然影响和推动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他说：

>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0页。

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①

毛泽东紧紧地抓住矛盾的相互联系和运动发展，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地勾画出了当时中国社会极为复杂、极为特殊的矛盾之网，而这个矛盾之网几乎把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东方世界的各种矛盾，奇特地、集中地表现出来了。由此，他得出结论：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②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0—101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1—102页。

## （六）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分析矛盾特殊性的科学方法

观察、估量中国革命的形势，除了从相互联结、运动发展上分析中国社会诸矛盾外，毛泽东还提出要运用现象和本质的辩证法范畴分析问题。他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① 这就是说，本质和现象是互相联系的，本质总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所以现象可以是人们认识本质的"入门向导"；但本质和现象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入了门后还要对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发现其内部联系，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同时表现本质的现象往往不止一个，而是多个，而且常常有假象出现，因此要区分真象和假象，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毛泽东指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人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而要去看它的实质。如果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那就会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如果为敌人强大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就会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来。所以，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

## 第三节 《反对本本主义》与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雏形

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们党内出现了一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办事不考虑中国的国情，拒绝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新的探索，认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开口闭口“拿本本来”，认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被贬为“游击习气”。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一面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一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注意党内和红军的思想建设。继1929年12月红四军党代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之后，毛泽东于1930年5月在江西寻乌进行大规模农村调查的同时，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原题《调查工作》），批判了教条主义，从调查研究的角度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成为毛泽东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

《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曾在红四军中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印成小册子，后因敌人多次围剿而丢失。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到各地收集革命文物。福建省上杭县茶山公社官山大队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调查工作》（石印本）贡献出来，经毛泽东辨认，确认是自己30年前的旧作。对这篇文章，毛泽东在1961年3月11日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接着在3月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又都提到它，并作了说明和解释。从批语和两次讲话中可以使我们了解，这篇文章是为着什么写的，是怎样写的，是怎样写出来的，以及毛泽东是如何地喜欢它。

1961年3月11日的批语写道：

“这是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夏，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在1961年8月13日广州会议上说：

“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1929年冬天，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对这场斗争作了结论。这以后，也就是1930年春天，写了这篇文章。前几年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来了。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

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会议上又说：

“这篇文章是1930年春季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东西找出来我不记得，这篇文章我总是记得就是了。忽然找出来了，我是高兴的。”①

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将《调查工作》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时，把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如把“布尔什维克”改为“共产党人”，把“苏维埃”改为“政府”、

① 转引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页。

“六次大会”改为“党的六次大会”等。1964年这篇文章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中首次公开发表。收入选读本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请毛泽东再回忆一下该文写作的时间、地点及写作前后的重大事件。1964年3月25日毛泽东将定稿退田家英，把文章题目又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并写了一个批语，大意是说，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致，不过有所发挥罢了①。毛泽东还在这个最后的定稿上，亲笔加了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 这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所作的唯一的一处涉及实质内容的改动，一个重要的增补。但是通观全文，这个思想原本就有的，不过没有作出这样概括性的表述罢了。该文写作的时间，经过反复考证，最后定为1930年5月。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千字，但却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容和哲学思想。

第一，阐述了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基础，是洗刷唯心精神的根本方法。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基础，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③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制定政策，实行政策的过程。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认识论”这种概念，但他强调了“实际经验”，贯穿了唯物论

① 参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40页。
② 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4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115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的反映论的根本原则；不仅如此，他所说的调查研究，不是对事物消极的直观，而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能动的认识活动，甚至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因此，他实际上已经把实践看作是党的斗争策略，即人们主观认识的真正来源。

从调查研究出发，毛泽东进一步揭露了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他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①。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才能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出现。

第二，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了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毛泽东在批判本本主义的时候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② 这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包括检验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时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有教条主义思想的人，判断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正确与否，不是以实践为标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为标准，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教条化，对它抱有神秘观念，认为马克思、列宁是什么"先哲"；而另一些人，由于文化落后的盲从心理，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都是正确的"。由此就产生了所谓"先哲标准"、"本本标准"、"上级标准"等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毛泽东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明确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③ 同样的道理："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

①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2、11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1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① 这样就澄清了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一些糊涂观念。

第三，初步论述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句话虽然是后来加进去的，但这个思想原来就有，而且通篇都体现了这一点。比如在第三节中，毛泽东批评那种对于上级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的态度，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他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②在第六节中他批评有些同志以为党的"六大"的"本本"（即"六大"通过的各项决议案）"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也是说的理论只有同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1961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解释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谈到这一点。他说：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是好的，比如六次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六大决议还有部分问题，有若干缺点或错误，就是正确，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③。所以，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之点。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认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④。

第四，初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及其相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11 页。
③ 参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 38—3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16 页。

互关系问题。上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调查研究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到群众中去作调查”，政策和策略“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思想，就是群众路线的思想；“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既是实事求是的问题，又是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必然结论。

总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通过论述调查研究问题，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总结了党的斗争经验，既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雏形，又包含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是毛泽东思想及其认识论形成的标志。

## 第四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主要矛盾转化原理的提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相应地改变自己的政策和策略。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思想僵化，推行关门主义政策，否认新形势下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拒绝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及时地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及其形而上学思想，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著作中论述了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等辩证法原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了理论上的论证。

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因为自从1927年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以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①总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铁板一块，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可能发生转化，这就是从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变化中得出的哲学结论。

**（二）论述了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其发展道路是曲折的，批评了幻想革命力量"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笔直又笔直"的形而上学观点**

党内犯"左"倾错误的人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而又纯粹的，民族资产阶级既然投靠了蒋介石反动派，现在不可能变成革命的力量；革命的道路是笔直又笔直，而且不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不须花费很大的气力便可取得成功。毛泽东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病，是关门主义的策略。他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力量，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不可能纯而又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反革命阵营也会暂时分化出一部分革命的力量来。"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② 为此，不仅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要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5页。

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而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② 毛泽东还从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上论证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性，他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③ 因此，对于中国革命，必须准备走曲折的路，克服各种困难，在不平衡中花大力气创造出平衡的结果。

### （三）明确提出了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的原理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地位的变化，提出了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其转化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④ 这个基本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地位是变化的。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4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5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52—153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52 页。

主要矛盾；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则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而在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中，变得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则被推到次要的地位，而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则扩大了矛盾的裂口。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中日矛盾突出，使人民大众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这里要注意的是，“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①，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亦然。”② 上述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③，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以上论述告诉我们：基本矛盾是贯串于长过程的、规定其他一切矛盾的东西，它可以有几个，并且是变化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表现为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某一阶段上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东西，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及其转化的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政策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当然，这时毛泽东还是就中日矛盾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问题说的，还没有上升到一般辩证法的高度，但已经有了主要矛盾原理的“原型”，有了主要矛盾的基本思想。

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革命的前途问题，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党内有“左”倾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2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4页。

思想的人指责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是投降主义，是丢掉了社会主义的大目标。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阐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以及民主革命如何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他说："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① 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民主革命是要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② 这个问题从哲学上说仍然是关于矛盾的转化问题，矛盾的发展阶段和转化的条件性问题，这里已经涉及，《矛盾论》则作了哲学的提升。

## 第五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军事哲学

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5 年 1 月党中央于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改变了过去"左"倾机地主义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那次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关的组织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才有了可能去系统地解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1935 年 12 月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系统地说明了党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76 页。

的政治策略问题；1936 年 12 月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系统地阐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同时也是光辉的哲学著作，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研究战争问题的典范。从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是《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的继续，《实践论》、《矛盾论》的先导，它已涉及毛泽东哲学诸多方面的问题。

### （一）关于战争的规律问题

要指导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必须首先认识它的规律。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战争规律的实质和内容，以及认识战争规律对于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

第一，论述了规律的客观性和怎样才能把握规律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是全局性的东西，只有用理性思维去研究事物的性质及一事物与它事物的联系才能把握。他说："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① 又说："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②

第二，规律是有层次的。毛泽东在谈到如何研究战争的时候，一开头就指出："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7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77 页。

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① 这就是说，战争规律从范围来说，有一般规律、特殊规律、更加特殊的规律（个别的规律）的区别。一般规律寓于特殊（个别）规律之中，并通过特殊（个别）表现出来。人们要认识规律，总是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规律，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认识一般的规律。因此，研究特殊战争规律是认识一般战争规律的基础，而研究一般战争规律则更有助于认识特殊战争规律。所以，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重要性，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研究北伐战争的规律，尤为重要的是研究现实进行着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规律。教条主义者在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照搬一般战争的经验，照搬苏联内战的经验，照搬我们过去北伐战争的经验，因而导致中国革命战争的失败。从规律的地位和作用来说，战争规律有根本规律和非根本规律的区别。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规律发生出来的。”② 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这些观点后来发展成《矛盾论》中的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7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91 页。

殊性的思想。

第三，战争规律是发展的。规律是事物的本质联系，它和事物的现象相比，具有稳定性和隐蔽性，肯定这一特点是正确的；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即事物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战争的进程也是迅速的，因此，事物的规律，战争的规律也必然随之发展变化，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毛泽东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①]由此可见，战争规律是发展的，是随着事物的时间、空间、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发展观点，彻底克服了规律问题上的机械唯物论，丰富了辩证唯物论的规律论。

第四，提出了"战争指导规律"的新概念。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战争的客观规律，而且要研究"战争的指导规律"[②]。所谓"战争的指导规律"，就是战争主体的行动规律，它是对战争的客观规律的能动的反映和自觉的运用，它不仅告诉人们"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告诉人们"怎么办"，具有行动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在谈到战争的指挥员如何才能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时强调要掌握指导战争的方法，"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③]后来他又说，战争指导规律不是别的，就是战争指挥员认识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后所制定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的游泳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3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3、178页。

术"[①]。"战争指导规律"这一概念的提出，丰富了辩证唯物论的规律论，突出了它的方法论功能，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有重要的意义。

## （二）战争中的认识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结合战争问题，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的一系列问题，为《实践论》中的一般认识论原理提供了重要的"原型"。

第一，主体和客体。毛泽东在谈到战争中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时指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②] 这就是说，客体就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即我们头脑以外一切客观实际的东西，战争中的认识客体包括敌我两个方面；主体就是研究者的头脑。

第二，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在谈到战争中指挥员为什么会犯错误的时候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③] 又说："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8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81—182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79 页。

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① 这就是说，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也是认识论中的基本问题，认识的任务就是要求得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一致或符合，战争中、工作中是否犯错误，其界限就在这里。而这种符合是相对的、比较而言的。这个思想后来发展为《实践论》中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

第三，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毛泽东指出，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他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的思索。"②这里讲的"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既是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实践。"部署"、"决心"、"判断"都来源于实践。毛泽东强调实践出真知，从战争学习战争。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③

第四，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毛泽东认为，对于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直接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④但同时他又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9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1页。

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① 这就是说，间接经验、书本知识也是重要的，必须认真学习，但间接经验只有以一定的直接经验为基础，才能鉴别和取舍。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还直接批判了“狭隘经验论”。他说：“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②

第五，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结合制定作战计划和执行作战计划的过程，说明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即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阶段。这里有些用语如“十六字诀”等，已同《实践论》一模一样。毛泽东说：“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1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213—214页。

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①

第六，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的辩证关系。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敌强我弱，革命处在极端困难的客观条件之中。因此，如何认识和处理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的关系，就成为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如果只看到客观条件的困难而忽视主观努力，在理论上就会导致机械唯物论，在实践中就会产生悲观情绪和保守主义。相反，如果夸大主观努力的作用而忽视客观条件的决定作用，在理论上就会导致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在实践中就会产生急躁情绪和盲动主义。毛泽东针对这两种倾向，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阐述了战争中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② 这就是说，客观物质条件对于战争的胜负具有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是必须承认的；但客观物质条件不是唯一的，战争的胜负还必须经过敌我双方利用各自的条件去拚搏、去竞赛，即还取决于主观努力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军事家要在既定的客观物质条件提供的舞台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后来的《实践论》、特别是《论持久战》则作了深刻的、详尽的发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9—1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2页。

### （三）战争中的辩证法

战争中的辩证法，除了上面我们已经讲到的研究战争的总的原则“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等等之外，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战略战术中的辩证法。

首先是全局和局部的辩证法。毛泽东指出，所谓全局，就是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① 局部则是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发展阶段。“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②在一定范围内，全局和局部、战略和战术的区别是绝对的，超出这个范围，它们的区别又是相对的。两者的关系是：“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③因此，关照全局是最要紧的；但局部也不能忽视，有的局部对全局影响小些，有的则影响很大，甚至具有决定意义。所以毛泽东指出：“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主要的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④ 这里，毛泽东既讲了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又讲了抓主要矛盾的问题，即既要关注矛盾的总体，又要善于抓住那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即关系全局胜负的主要关节。

其次是战略战术中的对立统一、“相反相成”。毛泽东从中国

---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5页。

④　同上，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出发，正确地规定了一系列战略方针："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权威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① 上述一系列的"反对"和"承认"，揭示了战略战术问题上的诸多对立统一关系，反对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战略战术中"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例如，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术上的速决战是相反相成的。毛泽东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但"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②同样，在集中兵力问题上也体现出"相反相成"来。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③ 此外，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反围剿，封锁中的反封锁，防御中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191—19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233—23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225页。

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等等，都是“相反相成”思想的具体运用。

再其次是在“相反相成”的基础上进一步谈到对立面的转化问题。毛泽东以战争中的得失问题为例，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者以“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产生不良影响”为理由，反对战略退却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① 这里，毛泽东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了“相反相成”、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后来的《矛盾论》则作了进一步的哲学概括和理论升华。

### （四）战争中的历史唯物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仅论述了战争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同时也论述了战争中的历史唯物论，特别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分析战争的起源、实质、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以及消灭战争的途径等问题。毛泽东指出，战争起源于私有制和阶级的划分，它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他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11—212 页。

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① 历史上的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② 他还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最终是要消灭战争的，“但是消灭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③ “人类社会进步到了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③这样，毛泽东就阐明了战争中历史唯物论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

总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党内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产物，在毛泽东哲学体系形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从多方面揭示了毛泽东哲学体系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内容，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前导。

## 第六节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系统化的标志

《实践论》、《矛盾论》（以下并提时简称“两论”）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长期酝酿和思考的结果，是毛泽东哲学系统化、体系化的标志，是毛泽东哲学发展中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即由应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71 页。
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74 页。

用哲学到理论哲学的飞跃，由具有某些哲学思想到建构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的飞跃。“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一）“两论”的成因

“两论”产生的大背景，即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等，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节已经作了简要的说明，这里要补充的是一些具体的情况和直接的原因。

一是进一步从思想路线上彻底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需要。如前所述，1935年1月遵义会议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左”右倾的错误思想却没有来得及批判，路线是非没有完全分清，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还严重地存在着。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国革命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时期。面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斗争，毛泽东不能不着手批判过去的错误指导思想，用正确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来统一全党的认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毛泽东首先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935年12月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阐明了党在新形势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着重从政治路线上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936年12月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则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经验，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光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批判，不可能彻底克服其影响，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进行彻底清算。“两

论”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它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批判了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教育干部和广大党员，以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性。“两论”的题解明确指出：《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也是为了同一目的。

二是抗日战争的实践对“两论”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突出了在复杂变化的社会矛盾面前，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又提供了在实践中如何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实际经验，因之成为“两论”写作的一个重要契机。毛泽东正是在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写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为抗大讲课的。西安事变后，国内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性的大党，必须公开地系统地向全国人民阐明自己的纲领和政策，回答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指明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这一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使自己的革命理论完善化、系统化，要求全党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两论”正是适应革命形势新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①

三是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正反面经验为“两论”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两论”作为中国革命的逻辑（即规律）在哲学理论上的反映，是深

① 转引自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5—36页。

深植根于中国革命的经验之中的。本书上一章和这一章的前几节关于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探索和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问题的论述；抗日战争爆发后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等等，都为“两论”的基本观点提供了大量的例证和“原型”。没有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两论”是不可能产生的。毛泽东回顾当时的情形时指出：从党的成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只有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和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①。“两论”正是有了“充分的经验”之后在哲学理论上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正确反映。

四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哲学活动为“两论”的写作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资料准备。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并特别重视学习和研究哲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恶劣环境使毛泽东不可能接触更多的马列主义著作，王明教条主义者曾讥讽毛泽东为“狭隘经验论”，声称“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到延安后就“发愤读书”。他想方设法搜集已译成中文的马列主义著作，挤出时间，不分昼夜，发愤攻读，努力钻研哲学。对此，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访问陕北时曾作过真实、生动的记载。他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化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

---

①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826页。

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①]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材料看，毛泽东在撰写"两论"时，除了反复地钻研马列哲学原著外，还阅读了许多中外哲学书籍，并且写了大量的批注和读书笔记，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中，同毛泽东写作"两论"的关系较密切的，主要是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提到的苏联30年代的几本哲学教科书，如《西洛可夫教程》、《米丁教程》等。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作过详细的批注，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批评了"中国的主观主义者"、"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延安的形式主义者"，揭露了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本质特征，为"两论"的写作作了资料准备。毛泽东不仅自己钻研哲学，而且在1937年4月至8月间还亲自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等处，向干部和学员讲授哲学，共计100多小时。《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就是他当时为了讲授哲学而撰写的。斯诺对毛泽东写作"两论"的情况进行过采访。他写道："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星期里，毛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②]

### （二）"两论"的写作、流传和发表

关于"两论"写作的时间、修改、发表的情况，国外一些研究者出于各种动机，从60年代到70年代散布了种种迷雾，引起

①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7—68页。
② 《斯诺在中国》第283—284页。

过长时间的争论。他们怀疑“两论”是1937年的作品，甚至断言是1950年和1952年写的。其论据是，在这以前，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文集和党的文件集（如《整风文献》）里都没有收过这两篇文章，中国的理论家们的文章里也没有提到过这两篇文章。这些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如上所述，从1937年4月起，毛泽东应抗大邀请讲授哲学，课程总题为《辩证法唯物论》，共分三章：第一章“唯心论和唯物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下分若干小节，包括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等内容；第三章“唯物辩证法”，分述辩证法的三个法则，即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以及唯物辩证法诸范畴，如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链与环等等。每周二、四上午讲课，课程进展至8月7日讲完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而中断，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未及讲授。三个多月中毛泽东共讲课100多小时。为了讲课，毛泽东编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课程讲授提纲，当时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还派人做过讲课记录，记录稿经整理审阅后连同整个讲授提纲印发给大家学习讨论①。《实践论》为讲课后印发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是7月份讲授的；《矛盾论》为该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对立统一法则”，是8月份讲授的。这两节同其他章节相比，实际上已不完全是提纲性的东西，讲得相当详细、充实。现在搜集到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早的是封面上有“1937年9月印”字样的油印讲义，末尾有一括号：（论矛盾统一律完，1937年8月7日）。这是据以判断“两论”写作时间的最早的书证②。油印本流

① 参见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中国哲学》第1辑。

② 见龚育之：《在历史的转折中》，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91页。

传开来以后，有的刊物就拿去刊登了。1938 年 4 月起在广州发行的半月刊《抗战大学》便将这个提纲在新哲学讲座专栏内分期连载，并署“毛泽东主讲”；上海的《民主》杂志也从 1940 年 3 月第一卷第一期起署名连载。这些杂志都不是党的正式刊物。1940 年，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把这个提纲铅印成书。八路军军政杂志是党的正式刊物，但提纲不是发表在刊物上，仍属非正式出版，也未署作者姓名。1942 年，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翻印了这个提纲，书名《辩证法唯物论》，署“毛泽东著”。不过，中国学者张如心 1942 年 2 月 18 日曾在延安出版的党中央报纸《解放日报》上著文提到“《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八路军杂志社出版）”，“特别是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是毛泽东关于思想方法论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些事实说明，所谓过去党的文件集里从未收过“两论”，中国的理论家们的文章过去从未提到过“两论”的说法，是不确实的。“两论”确实为 1937 年毛泽东所作。至于解放前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文集和整风文献未收这两篇文章，是因为它们未经作者审定正式发表过。

关于“两论”的修改情况，我国有影响的学者经过多方查证，认真研究后指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所有翻印本，都源于 1937 年 9 月的油印本。除了翻印过程中发生的错漏外，都是一样的文本，中间没有修改过。只是在解放后正式发表《实践论》、《矛盾论》时著者才作了修改①。修改的具体情况，有的研究者作过详细的对照，有兴趣的话，可以参阅②，这里不再赘述。总起来说，解放后公开发表的《实践论》与 1937 年的油印本相比，修改不多，主要是增加了一段文字，删去了一段不甚确切的话；此外是个别文字上的增删、变动、修饰。《矛盾论》则作了较多的修

① 见龚育之：《在历史的转折中》第 293 页。

② 参见许兴全、魏世锋主编：《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29 页。

改：一是删去了由于受苏联30年代哲学的影响而把形式逻辑当作形而上学加以批判的第二节；二是增补了一些新内容、新论点，如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等；三是将原来的思想表述得更为准确，例子叙述得更加完整。这种修改既保持了原貌又表现了作者的科学态度和负责精神，毛泽东希望把他的著作用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形式贡献给读者。

### （三）“两论”的理论来源

如前所述，“两论”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同时还借助了其他中介，如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同时对中国哲学遗产作了批判继承。

第一，“两论”与马列哲学原著的关系。从“两论”的基本内容和引文来看，它们与马列哲学原著的联系是很明显的。拿《实践论》来说，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和能动性的唯物主义发挥，以及重要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关于实践标准和认识发展的辩证途径以及真理论的思想。《矛盾论》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关系十分密切。毛泽东讲话、写文章一般很少直接引证马列的原话，而《矛盾论》直接引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原著多达十余处，《矛盾论》继承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并作了独创性的发挥。

第二，“两论”与30年代苏联哲学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一种是讳言“两论”利用了30年代苏联哲学的积极成果，似乎一涉及这个问题就会贬低“两论”的意义；另一种是抓住“两论”吸收了30年代苏联哲学的某些成果，而指责它们是苏联教科书的抄袭。正确的态度是承认“两论”吸收了苏联教科书的一些思想资料，同时阐明它们又是不同于苏联教科书的独立的科学著作，对“两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前所

述，毛泽东在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包括“两论”）时，阅读过苏联《西洛可夫教程》和《米丁教程》，并作过许多批注，吸收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和列举过的事例。这从哲学创作的规律和当时封闭的战争环境来说，都是不足为怪的。“两论”利用了这些思想资料，并以此为中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处处根据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常常是鲜血换来的经验①，去研究、思考、验证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使它们具有深刻的历史内容，注入了新鲜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表现在：一是“两论”的框架体系比苏联教科书缜密严谨；二是“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典范；三是“两论”中的许多提法、分析和论述，比苏联教科书明晰、概括、系统和深刻；四是“两论”在吸取苏联教科书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以“抄袭论”是非常错误的。

第三，“两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应该说，“两论”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同时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遗产、中国文化传统。早在50年代，李达在《〈实践论〉解说》中就指出：“《实践论》是知行关系的唯物辩证法，中国以前的各种知行学说，在《实践论》之中被扬弃了，它们的消极成分已被废弃，它们的积极成分是被保存着，并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实践中发展了。在这个意义上，《实践论》是中国数千年来知行学说的科学总结。”② 毛泽东事先曾审阅过这个《解说》，并未对此提出异议。1951年冯友兰曾写过一篇题为《〈实践论〉——马列主义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的文章，文中说：中国以前大多数哲学家对知行关系的讨论，“都只代表片面的看法，每一

① 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听汇时的插话中说：“毛选”、“两论”，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② 《〈实践论〉解说》，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152页。

派哲学家，只看见知行全程序的一面”，“《实践论》以完全新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发展了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解决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方面说，《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的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① 毛泽东曾对该文大加赞赏。事实正如李达、冯友兰所说的，《实践论》虽然没有征引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但却多次直接使用“知行”这个中国哲学史上习用的哲学范畴，字里行间更明显地看出它批判和继承古代知行学说的痕迹。它一方面继承了从墨子到颜习斋重视“亲知”的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又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唯心观念作了尖锐的批判。《实践论》公开发表时，毛泽东又特意给加上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更清楚地点明了作者着意于解决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问题的深刻含意。毛泽东讲对立统一规律，以《矛盾论》名篇，标题便带有民族特色。从内容上看，更融入了我国古代辩证法的宝贵遗产。《易经》中的两点论，《道德经》中的矛盾同一性和矛盾转化思想，古代史书与兵法中的朴素辩证法，都对《矛盾论》有一定的影响。总之，“两论”既凝结着中国革命斗争的宝贵经验，又融化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丰富遗产，并使这两个方面有机的结合起来了。正因为如此，它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落脚生根，使之中国化，并在实践中发挥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 （四）《实践论》的贡献

《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著作，但毛泽东自己说过，两部著作比较起来，《实践论》比《矛盾论》更重要②。我想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实践论》更根本。因为从理

---

① 见《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
② 参见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论上讲，在毛泽东看来，哲学就是认识论，《实践论》是专讲认识论的，《矛盾论》也可以看作是认识论，因为“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从实践上说，《实践论》与党的思想路线有更直接的联系，它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二是写法上《实践论》更简洁而透避，完整而明晰，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毛泽东自己更为满意。正因为如此，所以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在重读《矛盾论》之后，曾提出它似“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象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①。后经几次修改，《矛盾论》才收入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次印刷时，按时间顺序，改收入第一卷，与《实践论》并列。

《实践论》建构了一个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核心的认识论体系。这个体系是这样构成的：(1) 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是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由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认识的任务就在于不断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使主观符合客观，进而改造客观。所以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毛泽东认识论的核心问题。(2) 要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实现二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必须通过实践，只有在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矛盾运动中才能实现。所以实践是实现主客观统一的基础，实践的观点是毛泽东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3) 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只有通过“两个飞跃”，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的飞跃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的飞跃才能解决，所以“两个飞跃”是毛泽东认识论的主要内容。(4)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是实现主客观统一的重要保证。因为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认识的正确与否，除了实践条件之外，还同认识的主体——人的主观世界的状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改造主观世界即改造主体的认识能力等等，是毛泽东

① 参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91页。

认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5) 真理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现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就是获得真理的过程。所以真理论内在地包含在毛泽东认识过程理论之中。

《实践论》所建构的认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

第一，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关于实践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有所论述，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也有一些好的说明，但在《实践论》问世之前，还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对实践作过专门系统的阐发。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并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的学说，对实践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指出：实践是人们"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①]的活动，用后来他在《论持久战》中的话来说，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②]。接着，他对实践的形式作了全面地说明，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但是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③] 这里，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实践的内涵和外延作了科学的规定，即实践不是主观范围内的观念活动，而是变革现实的活动；不是动物的本能活动，而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④]，因而具有能动性。实践不是个人的孤立的活动，而是社会的人所参加，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因而具有社会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2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2卷第47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28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2卷第477页。

从广义上说，实践的外延是很宽广的，它包括人们的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活动。二是在指出社会实践是多方面的同时，把社会实践主要概括为“物质生产过程”、“阶级斗争过程”、“科学实验过程”①，特别是把科学实验作为三项基本的社会实践之一，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种由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的统一所作出的对实践的科学规定，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同唯心主义把实践看作是观念的活动、个人的道德践履，旧唯物主义把实践看作是人们日常交往中的琐事，实用主义把实践看作是应付环境的盲目行动等错误观点区别开来。

第二，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原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标准、认识的最终目的等方面说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开来看，关于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标准，认识的目的等各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过论述，毛泽东的贡献在于，他把这些问题串连起来，结合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结合革命人民的斗争实际，系统地具体地阐发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原理。理论的系统化会产生出原来零碎的、分散的思想观点所没有的新质，在整体上出现新的效用，把理论本身向前推进。《实践论》正是做了这样的理论系统化的工作。

第三，《实践论》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它完整地阐明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提出了“两个飞跃”，特别是第二个飞跃的原理。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原理，列宁曾经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② 但列宁没有作进一步的展开。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知行关系学说的基础上，吸取了苏联教科书的某些成果，具体地阐述了认识究竟怎样在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践中产生，又怎样回到实践中去的辩证发展过程，他把这个过程表述为：从实践开始，经过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样的三个阶段、两次飞跃。他特别强调第二次飞跃的重要性，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这一个跃。"① 因为只有这后一次飞跃，才能证明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同时也只有通过这一次飞跃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把认识过程概括为"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这样就纠正了传统的认识论仅仅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视为认识过程，而将理性认识以后的过程视为理论的检验和应用，没有任何认识的意义和作用的缺陷。他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说，还只是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这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③。

第四，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露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④ 这对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克服"左"右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29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1卷第295—296页。

倾错误，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只是原则上说明“左”和右的界限，并且主要是从时间上加以划分的（思想落后于客观实际是右，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是“左”），未能从空间范围加以分析，因而难以完全说明现实复杂的情况。1939 年 2 月 20 日他在致张闻天的信中谈到“中庸”问题时，对此作了补充，不但从时间上而且从空间范围加以说明。他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① 这样的说法就更全面了，它帮助我们具体地区分“左”和右的错误。

### （五）《矛盾论》的贡献

《矛盾论》建构了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为精髓的唯物辩证法体系。这个体系的构成是：(1)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因为只有对立统一才能说明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才能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划清界限；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只有用对立统一才能说明。例如，他认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质变是事物运动采取的两种状态——相对静止与显著变动，都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否定之否定是对立面的两次转化，等等。(2)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矛盾的普遍性揭示了事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45—147 页。

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给人们的认识以普遍性指导；矛盾的特殊性则揭示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根据，成为人们认识事物，辨别事物的基础。《矛盾论》的重点是在承认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论述矛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其一是矛盾性质的特殊性——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的特殊性、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特殊性、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其二是矛盾系统中各对矛盾地位的特殊性——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其三是每对矛盾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其四是解决矛盾的形式的特殊性——对抗与非对抗。(3)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推动事物的发展。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矛盾论》所建构的辩证法体系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主要在于：

第一，全面、深刻地阐发了"矛盾"概念。毛泽东的"矛盾"概念，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最基本概念，是这一理论中最关键和最核心的东西，所以他的辩证法理论以《矛盾论》名篇。不了解毛泽东的"矛盾"概念，就不能了解毛泽东的辩证法以至整个毛泽东哲学。"矛盾"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一个多义词：一种含义是指"互相对立"和"逻辑上不相容"，即"二律背反"的意思；一种是"相反相成"，即"既对立又统一"的意思；还有一种含义是互相依赖又互相转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曾经讲到"运动本身就是矛盾"①，即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既同一又不同一的状况就是矛盾；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提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

质"①，并把矛盾定义为对立面之间互相排斥和互相关联，即"对立面的统一"②。毛泽东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利用和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矛盾"概念，赋予它以科学的含义，即对立统一。他指出："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③ 这就是说，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个根本属性。毛泽东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矛盾"这一概念：一是"一物的两重性"，即一个事物中的两种相反的性质。如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动摇性），革命斗争中的困难条件和顺利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等等。二是"两物的相关性"，即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里又有时间上的联系和空间上的联系之分。后者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矛盾，等等；前者如战争与和平、生与死、坏事与好事，等等，这一类矛盾，常常不被人理解，其实这一类矛盾是从时间上的联系说的，即它们是历史过程中纵向地存在着的，而且是先后出现的，中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④，因此构成矛盾。三是主体实践活动中的矛盾，即以主体为参照物而划分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把人群划分为左、中、右或进步、中间、落后，按人们的政治态度区分敌、我、友等等，不仅左和右之间、进步和落后之间、敌和我之间构成矛盾，而且中和右之间、中间和落后之间、友和敌之间也构成矛盾。上述三种意义的"矛盾"范畴，可以说既是实体范畴、关系范畴，也是

①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4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9页。

动态范畴，所以毛泽东才说："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①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阐发是很全面的、深刻的。这个"矛盾"概念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广泛性，即可以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三个不同的领域；二是动态性，即它排除了任何静止的、固定不变的观念而包含了灵活生动的内容，能够抓住经常变化的现实，发现自然和人的关系中的一切复杂性，并解决由这些关系产生的任何问题或困难。正因为毛泽东的"矛盾"概念具有如此的广泛性和灵活性，我们在运用它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客观性和确定性，不能主观地加以解释，不能当作一个公式到处乱套，否则就导致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第二，明确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理论。在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涉及到共性个性的关系问题，但都没有把它们同辩证法或矛盾学说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对个别与一般、普遍与特殊作过许多分析，但也都没有把它们作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来看待。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论述了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以及认识过程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但也没有把它们当作矛盾学说的精髓。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详细地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明确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② 这是因为，任何现实的矛盾，都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要认识矛盾，就要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贯串矛盾学说的各个方面，不了解它，就不了解矛盾学说以至整个辩证法；不了解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就不能找到科学的认识方法，因为人类认识运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0页。

的秩序，就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在矛盾精髓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的概念，“作了现时在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最为完备的探讨”①，建构了一个分析矛盾特殊性的严密的逻辑体系，表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为人们理解矛盾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为在实践中正确分析和处理复杂矛盾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这里不再赘述。总之，毛泽东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科学总结，它概括了矛盾问题最基本、最本质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贡献。矛盾问题精髓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的哲学基础，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相结合。教条主义者不善于区别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否认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或者把特殊性当成普遍性，把绝对性视为脱离相对性的东西，不懂得绝对与相对的区别也是相对的。经验主义则强调特殊性而否认普遍性，把相对性只看成是相对性，否认相对中有绝对。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不懂得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

第三，系统地论述了矛盾转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矛盾的转化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② 列宁说过：辩证法是这样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相互转化而同

① 康福斯：《辩证唯物主义》，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页。

一的[1]。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矛盾转化的思想。首先是强调转化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承认不承认转化，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一个分水岭。他说："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它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去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2] 其次是指出转化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的结果。他在阐发这一思想的过程中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这里要说明的是，1937 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不充分的，它没能完全消除人们的疑问：为什么不能说同一性和斗争性两者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只能说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1939 年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对此作了补充。他指出："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3] 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绝对性的含义。所谓斗争的绝对性是就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而言，而不是讲某一具体事物、某一具体矛盾、某一具体的斗争形态。若就某一具体矛盾而言，其斗争性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也能成为绝对的。因此，他继续写道："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1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30 页。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74 页。

谓占统治地位。”“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这才是列宁‘相对中有绝对’之意”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它说明，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在一定条件之下（例如时间之久暂）是能够互相转化的，而且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都能起主导作用。所以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的关系也是相对的。这也说明，一切对立的事物都能够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再其次是分析了转化的形式。转化的形式有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的转化；双方性质上的转化；矛盾双方的综合、融合；矛盾双方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等等。最后是强调了转化的条件性。他指出“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②

### （六）“两论”的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两论”是毛泽东哲学系统化、理论化的标志，它们不仅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来看，“两论”的产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即哲学理论的飞跃。如果说毛泽东哲学的第一次飞跃是青年毛泽东确认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信仰的飞跃的话，那末第二次飞跃则是由应用哲学到理论哲学的飞跃，由具有某些哲学思想到建构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的飞跃。毛泽东在“两论”以前写的许多论著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党务等问题作具体分析，因而一般属于应用哲学的性质，而“两论”则属于理论哲学，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7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33 页。

它研究的对象是哲学本身，其哲学概括已经从具体到了抽象，从个别到了一般。在此以前的文章，反映的大多是毛泽东某个方面的哲学思想及其某种程度的深化，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两论”则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领域建构起了如我们在前面说到的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这是毛泽东哲学理论的一次巨大的飞跃。

第二，从中国哲学史上看，“两论”的产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革命的变革。“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作，它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遗产的优良传统，使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发展成为现代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两论”一方面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变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有效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文化精神之根衔接起来，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新鲜活泼的民族形式，从而实现了民族思维方式的现代嬗变。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看，“两论”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高扬了主体的能动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列宁之后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著作。但“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主要不在理论方面，而在方法论方面，因为“两论”中的多数论点，是马恩列或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已经提出过的，不能轻易说是毛泽东的创见，但“两论”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最新颖、最有意义的贡献。唯其如此，“两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作用是永久的，不会过时的。

最后，从“两论”对世界思想文化的影响来看，“两论”不仅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思想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论”正式发表以后，很快被译成各种外

国文字，受到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热烈欢迎。苏联《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苏联大百科全书》、《简明哲学辞典》直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都对“两论”给予很高的评价。50年代日本学者认为“两论”彻底打破了对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理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化、民族化，具有国际意义，60年代还连续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思想有深奥的东方哲学作为依据，特别是对后进国家，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美国学者霍勒布尼奇1962年发表文章认为“两论”“不论是从文体还是从哲学内容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多数同样的著作相比，都不见逊色”，“它们都是既短小而又简洁，既丰富而又透辟，更主要的是那样完整和明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只能把它同马克思那篇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来相提并论。”① 这个学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亲华派”或“毛主义者”，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各家作比较研究的学者。他的这种评价虽然不尽恰当，但具有某种客观性，值得我们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把毛泽东的《矛盾论》同列宁的《哲学笔记》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解答”。澳大利亚进步刊物1981年发表文章，赞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认为毛泽东是唯物辩证法的伟大阐述者和实践家之一，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达到了经典水平，属于全面阐述唯物辩证法的最优秀的著作之列，它们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世界上的一些共产党和进步组织至今仍把“两论”作为思想理论教育的基本教材。可见“两论”对世界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如同任何理论和著述都受它的时代的局限一样，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两论”分析概括的材料和经验，主要限于社会斗争和革命战争，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新成果分析概括较少。“两论”中

---

① 见西德《弗·艾伯特基金会报》1962年9月版。

的个别理论观点的分析也有某些不妥或不足之处，如《实践论》中关于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划分问题；《矛盾论》中关于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以及如何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两论”并没有穷尽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真理，任何把它绝对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本人说过：“两论”是几十年前写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发展了，内容更丰富了，应该修改、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①。“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鼓吹“顶峰论”时，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不相信，我的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②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坚持和发展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两论”的基本思想向前推进。

① 参见1964年3月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
② 参见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 第四章　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毛泽东哲学的多方面展开

从 1937 年起，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思想领域的斗争也很激烈。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迫切需要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科学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此，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使毛泽东哲学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形势与哲学战线上的斗争

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对于探讨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 (一)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形势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向我北平附近的卢沟桥驻军发动进攻；8 月 13 日又进攻上海。我国守军在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奋起抗战。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接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

新四军，开赴前线，抗击日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虽然参加了抗战，但幻想依靠英美的援助，迅速取得抗战胜利，于是“速胜论”流行一时，后来随着战场上的不断失败，又由“速胜论”转向“亡国论”，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就是散布“亡国论”的代表。为了驳斥“速胜论”，批判“亡国论”，从理论上阐明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指明抗日战争的趋势和前途，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

由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了广泛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就使得日本侵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前进，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蒋介石则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从1939年起多次发动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战胜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一重要著作，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及时地指出了革命的方向道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于1942年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思想建设问题。

从1944年4月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危机，打通中国大陆的南北交通线，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新的战略性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从河南一直溃退到贵州，说明国民党腐败不堪。这时全国人民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东北，中国抗日战争随即进入全面反攻阶段。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 （二）抗日战争时期哲学战线上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歪曲、利用孙中山哲学思想中的消极因素，编造了所谓“力行哲学”作为官方哲学加以提倡。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一本由反动文人陶希圣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炮制的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政的代表作。这本小册子，从哲学上说，一是鼓吹唯心主义的“唯生论”；一是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力行哲学”。“唯生论”是孙中山民生史观中唯心主义因素的歪曲发展。孙中山认为“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点”，而人类生存的欲望，则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蒋介石把它推向极端。他说：“人类全部历史即人类为生存而活动的记载”，“我们不主张唯心一元论，亦不主张唯物一元论，而主张唯生一元论。宇宙之本体的属性是生，我们可名之曰生元。”生元是什么？是无形体、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性的东西，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客观事物存在的依据。可见，“唯生论”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以唯生论为基础，蒋介石还鼓吹所谓“诚”的哲学，“诚”就是诚心，忠诚于国民党反动派。

蒋介石等还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发展成为反动的“力行哲学”。他们把“行”说成是超时空的绝对，是决定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最后本体。蒋介石说：“古往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所谓行，只是天地间的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而不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而“诚”又是行的“原动力”。所以“力行哲学”，是一种愚民哲学、反动哲学。

以艾思奇、胡绳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蒋介石的反动哲学进行了有力批判。毛泽东的《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也直接间接地抨击了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过鼓吹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天才论和英雄史观、为蒋介石法西斯主义辩护的“战国策派”哲学（因创办《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胡绳、潘梓年等对战国策派的反动观点进行了批判，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得到广泛的传播。

## 第二节 《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

为了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批判在战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以极大的精力研究战争问题，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军事著作，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这些著作既是光辉的军事著作，又是重要的哲学著作，其中《论持久战》更有其特殊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先导，那末，《论持久战》则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续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典范，它以科学预见的高度准确性而著称于世。下面我们以《论持久战》为主，结合其他两部著作来分析其中的哲学思想。

### （一）用客观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考察战争，揭示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发展了自始自终的矛盾分析思想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只有“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

的观点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① 《论持久战》正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对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和发展变化作了自始至终的矛盾分析。

首先是紧紧抓住中日战争双方内在的矛盾，分析揭露其特殊本质。毛泽东在回答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这个问题时，一开头就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② 依据唯物辩证法原理，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任何事物的矛盾运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进行的，一切战争都因其内部矛盾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有性质的不同。毛泽东紧紧抓住中日战争的内部矛盾，剖析了这场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矛盾双方的不同条件，即一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个是处于崩溃前夜的日本帝国主义；这场战争不是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在世界东方的亚洲地区；不是发生在别的时代，而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样的时间、地点、条件就规定了这场战争的特殊本质，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于日本一方来说，是非正义的侵略的反动战争，对中国一方来说，则是正义的反侵略的进步战争。这一内部矛盾不是一般矛盾而是根本矛盾。中日双方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是这一根本矛盾自身的展开，中日战争各个发展阶段及其规律性，是由这一根本矛盾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实践证明，整个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无非是这一根本矛盾自身的运动和展现。

其次是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中日双方的特点，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结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过："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44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447 页。

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①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正是运用了这一理论，先分析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然后综合起来，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结论。具体地说，日本方面的特点是：第一，它是东方军事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相当强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个特点决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本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而这种退步性、野蛮性又决定了日本战争的必然失败。第三，日本是一个小国，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失道寡助，将加速其失败。与此相反，中国方面的特点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显得不如敌人。这一点同样决定了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第二，中国又是一个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中国得道多助，将加速其战争的胜利。经过这样的分析以后，毛泽东又把它们综合起来，指出：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四个基本特点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单说那一个因素都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以我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2页。

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①

这种分析和综合体现了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因为“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② 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产生错误。亡国论和速胜论之所以错误，其根源之一就在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本来，中日双方互相反对的四个特点，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只有从这个总体出发，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然而“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③ 速胜论者“或则根本忘记了弱强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④，这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

再其次，分析研究中日战争矛盾运动的全过程，掌握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每一事物的发展过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2卷第4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2卷第45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2卷第45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2卷第458页。

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由于其内部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都表现为由量变到质变，由质变再到新的量变的发展过程，因而在其发展的长途中便显出若干阶段来。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也不例外。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许多特点，都表现为一定的量和质。战争就是这些特点和力量的竞赛。双方的力量在战争中都不断地变化其原来的形态。战争如何发展，具体进程怎样，完全看敌我力量变化程度才能决定。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用发展的观点考察了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特点的量变质变情形，预见到战争中敌我力量互为消长的总趋势：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再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再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样，抗日战争必然形成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我力量都有两种变化。我方的第一种变化是向下的变化，主要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经过抗战的消耗而减缩。这种向下的因素属于旧的质和量，主要表现在量上，这种量的减少，是暂时的局部的，不足以引起质变。这是矛盾的一个方面。然而还必须看到另一方面，即第二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向上的变化，主要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这种向上的因素属于新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质上，这就是部分质变。这些因素虽然弱小，但却代表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是我们的希望所在。这两个相反的变化，反映了中国自身的矛盾运动，进步势力和积极因素逐步克服落后势力和消极因素，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随之而来的是新质的量的不断扩张。我们所以能够坚持持久战和最后战胜敌人，主要根据也在这里。在第一阶段中，日本方面也有向下和向上两种变化。向下的变化，主要是人员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这方面的趋势将每况愈下。随着这

些向下因素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必然引起质的变化。但敌人也有向上的变化，主要是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这是暂时的局部的因素，在数量上会不断增加，但也不会引起质的变化。这两种变化，反映了日本自身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它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领土是暂时的，而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也必将限制其占领区的扩大。这是日本不能灭亡中国的主要根据。

第二阶段，敌我互相矛盾着的诸因素将继续发生变化。大体上是日本向下和中国向上的因素继续增长，日本向上和中国向下的因素继续减少，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但由于各种因素互相斗争，互相制约，这种变化虽然有部分质变，但主要是处在量变之中，因而进展是相当缓慢的。敌我力量经过长期的对峙、较量，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将大体上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

第三阶段，我方经过第二阶段的艰苦斗争和准备，自己的力量不断壮大，国际援助等有利因素即向上的因素更加增多，到了这一阶段的末尾，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即变为我强敌弱，我开始举行战略反攻，收复失地，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综观中日战争的全过程即三个发展阶段，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即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则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即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是由战争双方矛盾运动引起的，是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因素质量互变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战争的根本性质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在每个阶段中，不但有量的积聚或削减，而且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在部分质变中又有量的扩张，最后，由部分质变到达于根本质变，以中国的胜利和日本的失败而告终。毛泽东把量与质的范畴运用于分析中日战争的矛盾运动，进一步扩

展了质量互变规律的应用范围：不仅一般地分析事物的质和量，而且深入分析了事物矛盾双方的质和量；不仅指出事物的发展有量的向上、向下的变化，而且有旧质和新质的变化，并通过分析矛盾双方量的向上、向下的变化，旧质与新质的变化来说明事物由量到质的转化过程。

### （二）论述了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和自觉能动性问题，发挥了主体能动性的思想

在战争的客观规律和自觉能动性问题上，毛泽东首先指出，战争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的，可以认识的。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这是因为战争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①，仍是有规律的。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要受到经济以及经济所决定的政治因素的制约。尽管战争的流动性大，变化急速，加上人为因素，更具有不确实性，但它仍有质的相对稳定性，仍“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②，人们通过各种侦察手段，通过正确的分析、判断和推理，“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③。用战争这种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和战争的流动性来否认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战争规律的可认识性，就会陷入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不可知论；而否认战争的流动性、不确实性，否认战争计划、方针必须随情况的变化而加以修改，就是战争中的机械论。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既肯定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又着重阐明了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的问题。

首先是阐明了自觉能动性的含义。他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0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5、490页。

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的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一再指出，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有"热烈的政治动员"，必须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战争的指挥员要"勇敢而明智"，要有意志的坚定性，要提倡官兵的"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等等，这些也是讲的发挥自觉能动性的问题。这些论述告诉我们：

（1）自觉能动性是人类有目的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所谓能动性，是指物体既能对于他物的作用作出相应的反应，又能主动作用于他物。这种能动性是一切动物都有的，然而这仅仅是动物的一种本能，是自发的能动性。人的能动性则不同，它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这里所说的自觉是指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并且能够把这种目的、计划变成现实，使"主观见之于客观"；人还能够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作自我调节。这种能动性是人所特有的，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

（2）自觉能动性主要包括认识的能动性和实践的能动性，同时还包括意志的能动性。认识的能动性，就是人们根据一定的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确定自己的目的，然后制定实现目的的计划、方针、办法。实践的能动性就是把目的、计划付诸行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7页。

使之变成现实，即把客观世界改造成有利于人自身。意志的能动性，是指人的精神状态，即毛泽东所说的“热忱”、“勇敢”、“坚定性”、“牺牲精神”等等，它贯串于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之中，并调节和支配这些活动。意志能动性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战争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当然，意志的作用，归根到底要受到认识和实践的制约，在自觉能动性中，实践的能动性是最重要的方面。

（3）自觉能动性的发挥还有正确和错误之分。自觉能动性是正常的人所共有的，任何个人、集团、阶级均无例外。但具有自觉能动性并不等于能正确地发挥自觉能动性。自觉能动性的发挥，还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从实际出发，思想和行动符合客观规律，就是正确地发挥自觉能动性；脱离实际，思想和行动违背客观规律，就是错误地发挥自觉能动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要发扬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和行动，即充分发扬正确的自觉能动性。

其次是正确地估计了自觉能动性的作用。毛泽东在谈到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的作用时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①又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② 他还进一步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8页。

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①]这就是说，自觉能动性的发挥，要以客观条件作基础，受它的限制，这是唯物论；但另一方面，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人们通过主观努力，能够改变某些条件，创造某些条件，促进或延缓事物的发展；在具备了客观可能性的时候，自觉能动性在变可能性为现实性中就具有决定的作用。此外，人们通过主观的努力，利用一定的条件，影响或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可能性，而避免不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也是自觉能动性起决定作用的一种表现。

第三，阐明了战争中自觉能动性的特点和表现。毛泽东指出："自觉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②]。由于战争的认识对象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战争行动具有很强的暴烈性，战争本身就是敌对双方能动性的竞赛，因此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表现得更为紧张、更加强烈。其特点是这种能动性是在一种压迫状态下的高度的自觉，它的发挥在时间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必须迅速、高效；个体能动性发挥的程度、方式和范围要受到整个集团的制约；这种能动性主要表现为意志的作用和指导战争、实行战争的能力即驾驭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具体地说，表现为主动性、计划性、灵活性等等。

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③]。在优势条件下能否保持主动，在劣势条件下能否争取主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7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1页。

关键在于主体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即能否正确地发挥自觉能动性。主观指导正确，劣势可以变为优势，被动可以变为主动；主观指导错误，则优势可以化为劣势，主动可以化为被动。此外，“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① 这些都是为了争取军队行动的自由权，都需要发挥自觉能动性。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和交换战术。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这件事是很不容易做好的，“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②，需要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

计划性，是主动性和灵活性的具体实施。毛泽东十分强调战争计划的重要性，他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③ 战争指挥员应根据战争的相对确实性，制定相对固定的计划，又根据战争的流动性，随时调整或改变计划，这样才能将战争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引导战争向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走去。这也是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表现。

最后是提出了自觉能动性的主体基础问题。自觉能动性的强弱大小，与主体的素质基础紧密相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此作了许多对比。一个勇敢而明智的将军同一个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显然是不同的；战争双方兵员教养程度的高和低也是不同的。自觉能动性的现实发挥，又同一定的工作相关联。这里最为重要的，一是动员，二是组织。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动员，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发挥应有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1、49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5页。

的效力。没有很好的组织和团结，整体的力量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毛泽东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① 组织形式的适当，团结的加强，是发挥自觉能动性的重要条件。在自觉能动性的主体基础方面，领导集团和指挥集团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就一个群体来说，所谓自觉能动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领导者和指挥者的自觉能动性，有了客观条件和群众基础，领导的作用就是决定的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自觉能动性的含义、类型、作用、表现和主体基础等等，作了最为详尽的论述，既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论，又批判了机械唯物论，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他的《实践论》中关于主体能动性的思想，可以说是一部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哲学著作，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 （三）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法，发挥了矛盾转化和"相反相成"的思想

首先是运用矛盾转化原理，提出了军事战略的转变问题。毛泽东一贯重视战略问题的研究，认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问题。他在抗日战争中，除了写有《论持久战》外，还写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不仅解决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战略，而且还运用矛盾转化的原理，依据战争形势的演变，适时地进行军事战略的转变，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方针问题，从根本上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考察了我党领导的军事斗争的历史后指出：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共经历四个战略时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期，主要是游击战；在后期，主要是正规战；在抗日战争的前期，主要是游击战；在后期，主要是正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1页。

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时指出：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游击战将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①。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变化，军事战略发生了转变，作战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同时，游击队经过战争的长期锻炼，逐渐地变成了正规军，因而其作战形式也将逐渐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了正规战。

其次是论述了抗日战争中诸矛盾的辩证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1）战争与政治。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运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阐明了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系，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② 战争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说，战争不就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③ 一句话："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④，这就是战争和政治的辩证关系。

（2）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战争中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但最基本的矛盾是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精辟地阐述了这一原则。毛泽东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战争的本质、目的，是一切军事行动的根据。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关系是对立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9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9、480页。

统一关系。对立表现在战争双方是你死我活的搏斗，矛盾双方各自都想保存自己，置对方于死地，因而形成尖锐的对立。统一表现在两者互相渗透、互相过渡，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只有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毛泽东还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①。当然，这是从战争全局说的，但在战争的某一局部、某一时间，保存自己也可以变成主要的。那末，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毛泽东回答说："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②

（3）防御和进攻。抗日战争时期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具体的方针，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反攻，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这些看来是相反的，其实又恰恰是相成的。拿防御中的进攻来说，由于敌强我弱，在敌之战略进攻中，我必然居于战略防御地位。但战略防御不是消极抵抗，必须在战役和战斗中化被动为主动。这就要利用敌人之弱点，发挥我之优点，积极进行战役战斗中的进攻战，主动地杀减敌人，从战略防御的不利态势中争取战役战斗的有利态势，化全局的劣势为局部的优势。

（4）持久和速决。为了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战争双方无不要求速决，都愿意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然而持久和速决并不是人们随意规定的，而是由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具体情况决定的。拿抗日战争来说，敌因其军事上的优势，企求战略上的闪击、速决，而力避与其小国寡民不适应的持久战。我是大国、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2页。

弱国，在战略上只能以持久战取胜，但持久战需要有战役、战斗中的速决去保障，不有效地消灭敌人，则持久不成。因此，我必须集中兵力，选择有利时机，出其不意，迅速围歼敌人。经过这样许多的速决战，就能不断减杀和挫伤敌人，使敌之战略上的速决变成战略上的持久，而使我之战略上的持久经过战役、战斗中的速决得以实现。

（5）内线和外线。内线和外线同进攻和防御直接相联系。内线是双方交兵在自己的占领地内进行，外线是双方交兵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一般说来防御者处于内线，进攻者处于外线。拿抗日战争来说，在战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敌人从外入侵，对我包抄进击，敌处于外线作战的战略地位，我则处于内线抗击的战略地位。但我可以利用地广兵多的条件，在战争的运动中以几路之兵力对其各路分进之敌，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即在敌之战略包围内实行战役、战斗的反包围，分割外线对我包围之敌，聚而歼之。这样就变敌之战略的外线为战役、战斗中的内线，变我之战略上的内线为战役、战斗中的外线，陷敌人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综上所述，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对立统一的运动中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即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可以发生积极的变化，其中心点是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和消灭敌人。毛泽东指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它们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① 这里，毛泽东既说明了战争中诸矛盾相反相成的道理和矛盾转化的条件，又说明了战争中发挥自觉能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0页。

性的重要和发挥能动性的机理（人工地造成局部的优势和主动），深刻地发挥了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

（四）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阐明了战争中的历史唯物论

首先是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指导战争，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而战争则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因此，人民群众是进行革命战争的主体，对革命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兵民是胜利之本"②。只有实行群众战争，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夺取战争的胜利。

其次是指出人民军队是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对于战争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强调了人民军队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③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因为人民军队担负着主要的作战任务。如果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不能对付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就不能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就不能最后战胜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④。这些思想深刻说明了无产阶级建立自己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再其次是提出了人民战争必须实行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

---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1、509、54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7页。

的实际出发，明确提出了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把各种力量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一座人民战争的钢铁长城。他指出：我们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还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提出的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体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在这个体制中，正规军是主体，地方军和民兵是两翼，三者互相联系、互相配合，虽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是党领导的统一的武装力量整体。这样就可以把亿万人民群众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最充分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 第三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

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革命的前进和后退、胜利和失败，都取决于这三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解决得正确与否。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重视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样，十分重视统一战线问题，写了许多有关著作，如《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其中《论政策》一文最为重要。这些著作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是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斗争的典范。

### （一）把握主要矛盾，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国内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我国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分析了这种矛盾的变化，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矛盾论》关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原理，为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哲学依据。此后，毛泽东一再强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必须牢牢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政策，不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以致发生动摇。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党内有些人认为，这是“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的重演，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将要破裂，因而对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动摇。毛泽东指出，这些人的错误在于忘记了中日民族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矛盾。他说：“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① 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抗战到底，团结到底”。

### （二）运用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制定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

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等人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这两个极端的政策，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有鉴于此，“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② 这里所谓联合，就是为着共同的抗日战争的利益，各抗日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结成统一战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3页。

线；所谓斗争，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同违反共同抗战利益的错误倾向，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作斗争。

统一战线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其实质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①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发展自己的阵地，才能壮大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力量。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②

为了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阐明了坚持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既要统一，又要独立，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③ 另一方面，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也是不能抹杀的，抹杀了或自己抛弃了这种相对的独立性，那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④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毛泽东总括起来说："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⑤ 这里，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0、394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4、52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9页。

中独立性是相对的，统一性是基本的、主要的论述，实际上是对《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的发挥和补充。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认为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但他没有说明这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1939年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作了修正，他指出：就某一具体矛盾而言，其斗争性也可以是相对的，而同一性也可以是绝对的。他说："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①]这就是说，就统一战线这一具体矛盾而言，统一性是绝对的，独立性是相对的，统一性应成为独立性的出发点。团结和斗争的关系也是这样："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②]。那种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三）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制定对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

毛泽东运用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具体地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阶层、党派之间的矛盾和力量对比，把这些政治力量划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③]，即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制定了处理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

所谓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尽可能地发展各种民众运动以及争取知识分子等等。进步势力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只有发展进步势力，才能有效地争取

---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5页。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5页。

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争取时局好转，阻止投降和分裂，为抗战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

所谓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它们是处于进步势力与顽固势力之间的社会力量，其特点是容易动摇，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争取他们抗日。当然，这种争取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1) 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 尊重他们的利益；(3) 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争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①

所谓反对顽固势力，就是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时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抗日派和降日派虽有区别，但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毛泽东指出，对于这种反革命的两面政策，必须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对其尚能抗日和不愿从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加以联合，另一方面对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面进行坚决斗争。只有坚决斗争，限制其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才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才能延长顽固派留在统一战线中间的时间，避免发生内战。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只有发展进步势力，才能更好地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巩固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争取中间势力，才能更好地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扩大和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只有反对顽固势力，才能争取中间势力，更好地发展进步势力，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三者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2卷第748页。

影响的辩证统一关系。

**（四）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法，提出了同顽固派作斗争的策略原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在坚持革命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以及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政策，机动灵活地采用不同的斗争形式，同顽固派进行有效的斗争。他指出：同顽固派作斗争，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① 的策略原则。因为任何斗争，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政治斗争，都必须善于争取力量，建立斗争优势，使敌人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才能取得胜利。为此，毛泽东对国民党、顽固派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作了层层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他指出：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等于顽固派。在国民党中顽固派虽然占支配地位，但数量上只占少数，大多数党员并不一定是顽固派。“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② 在《论政策》一文中，毛泽东对顽固派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作了如同剥笋一样的层层深入分析：对顽固派中的两面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对汉奸亲日派中间的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等加以区别；对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等等，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对帝国主义亦然。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6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50 页。

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1]。这样就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顽固势力中抗日派和降日派的矛盾、顽固派和中间派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争取了多数，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最少数的敌人，最后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毛泽东还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作斗争，还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的原则。即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即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2] 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里，毛泽东又一次发挥和完善了他在《矛盾论》中论述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思想，即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但斗争性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每一具体的斗争也是有条件的，有一定范围和时间限制的。不仅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如此，对于其他斗争也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 第 2 卷第 76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 第 2 卷第 750 页。

##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唯物史观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先后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们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 （一）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揭示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革命论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从洪秀全到孙中山，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问题，作了艰苦的探索，他们的结论是要学习西方，走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梦想都一个一个地破产了。走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在外国行得通，在中国为什么行不通呢？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反近代史上的传统观点，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论证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论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作出这一科学结论，是因为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即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前途等等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①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②。这一历史特点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6、665页。

是怎样产生的呢？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由此决定的主要矛盾。他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毛泽东从历史和现实的状况出发，来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他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一直是封建社会，到了近代即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同时，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也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封建的经济基础并未被完全摧毁，无论是敌占区还是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当时的中国，"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②]。这种社会性质，也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正是这样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③]。而这种社会矛盾，也就决定了中国当时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只能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其次，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来看，毛泽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由于世界革命时代的变化，使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带上了特殊的、新的性质。在此之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此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则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④]。在这样的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3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4、63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7页。

际环境下，中国的无产阶级自“五四”运动之后，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中国的革命不仅得到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援助，而且还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援助。这样就使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由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所造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在何处？“新”就新在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新”就新在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而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新”就新在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特别是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马克思晚年曾经思考过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的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但这种设想未能实现。列宁曾针对苏联初期经济文化落后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弊端，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并把它看作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一个历史阶段。但列宁逝世不久，新经济政策便提前结束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找到了一条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特殊的民主主义道路，发现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五种典型社会形态相区别的新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既与资本主义相区别，又与社会主义相衔接，从而解决了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问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

**（二）论述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毛泽东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

存在的历史辩证法，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①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没有疑义的。为什么毛泽东强调一定的文化也是一定的政治的反映呢？这是因为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它最直接最集中地表现着经济，反映着特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要求。因此，政治不仅直接反映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而且直接制约着一部分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这样，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便既反映经济又反映政治，既在最终意义上受经济的支配，又在一定范围受政治的直接制约，因而使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丰富。

既然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那末有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既然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中占领导地位，那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也必须居于领导地位。不仅如此，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也必然引起文化的变革。毛泽东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②据此，他分析了中国文化变革或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认为"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化的斗争，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是为反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3—6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9页。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服务的。

另一方面，一定的文化又给予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①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认为它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毛泽东在作了这些分析之后，科学地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关于政治纲领。这一纲领的基本要求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具体地说，国体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民主集中制。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

关于经济纲领。其基本要求是铲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关系，主要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并发展合作经济；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发展。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一种过渡的经济形态。

这里要特别说一说毛泽东关于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的问题。他除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因为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计民生的前提下发展外，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还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要提倡它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8页。

的发展。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① 只有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发展的政策，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就是它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所谓科学的，就是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所谓大众的，就是它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但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同它所反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一样，也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

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过程中，毛泽东还运用唯物辩证法于文化工作，提出了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方针。一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新的文化来源于新时代的新政治和新经济，同时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有承前启后的关系，离不开过去时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0页。

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① 尊重历史，不割断历史，就是要对历史上的文化遗产采取批判和继承的科学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毛泽东说：在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时，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②，不是颂古非今，而是古为今用，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二是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它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文化，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但是，它决不排斥一切外国文化。"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③。所以，"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④但同样要把它们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把外国优秀的东西同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使之"洋为中用"，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⑤

### （三）深刻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革命发展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

革命发展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革命问题上的具体运用。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之中。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8、707—708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6、70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

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解决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

第一，论证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互相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革命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1]在中国之所以不能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国际环境来说，首先是帝国主义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就是反对中国独立，就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决不允许中国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允许。中国革命要胜利，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拒绝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一种梦想。依国内环境说，国民党反共的结果，建立的不过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即封建法西斯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现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工人、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要在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的人民，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也是近于做梦而已。

总之，中国革命两个阶段是互相衔接、互为条件的。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时，定不能忘掉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定不能忘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要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为革命转变准备条件，并在条件具备时转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去。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到达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第二，论证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性，不能“毕其功于一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5页。

役”。在中国革命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既批驳了反共顽固派的“资产阶级专政论”，又批评了“左”倾空谈主义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论调。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① 他还认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有社会主义因素，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就其整个社会性质来讲，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指出，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们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消灭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还有一些人并无恶意，但也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指出，这是“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②。这种观点，混淆了革命的步骤，降低了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有害的。认为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第三，阐明了民主革命的行动纲领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的辩证关系。为了阐明这两者的关系，毛泽东首先批驳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以伪三民主义取代共产主义的谬论，分析了三民主义和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2卷第683—6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2卷第685页。

共产主义的相同部分和不同部分，明确指出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上基本相同的是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而不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同，还在于宇宙观不同、革命彻底性不同以及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等等。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之间就有质的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区别方面，要求“收起”共产主义，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只能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决不能收起。接着，毛泽东还进一步论述了民主革命行动纲领的实践和共产主义指导思想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用它观察问题，指导工作，才能深刻地认识现实的斗争，把现在的努力和今后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不失前进方向；也只有用它去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保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并为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因此，在民主革命阶段，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但是，又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当前革命行动纲领的实践等同起来。这里，毛泽东提出要注意两个区别，即“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① 这同样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理想，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只能用来要求共产党员和少数先进分子，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有待于人们长期为之奋斗才能实现，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不具备实行的客观条件。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在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6页。

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上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因此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因此也还不能有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所以，不注意这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在政策上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 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主张革命是分阶段的，不容许混淆不同的革命阶段，反对“一次革命论”；我们又是革命发展论者，不容许在这两个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反对“二次革命论”。这就是毛泽东关于革命阶段论和革命发展论相统一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和社会革命论。

**（四）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科学分析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预见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论述了中国人民争取光明前途的条件。

毛泽东指出：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失败已成定局，它们的末日即将来临，但它们还没有被彻底打败，还在作垂死的挣扎。国内的形势是，一方面，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战略大反攻的前夜，国民党由于其政治上的腐败和消极抗日的态度，在全国人民中陷入空前孤立。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则越战越强，已经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抗日战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1页。

锻炼了中国人民，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而且有了强大的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但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内政，积极扶持国民党反动派用武力统一中国，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则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和解放区。这种情况表明，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反动势力。因此，"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①

在这种国际和国内形势下，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会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毛泽东的这些论断说明：(1) 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过程；(2)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3) 人民群众是实现历史总趋向的决定力量，因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客观要求同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向是一致的。

毛泽东不仅分析了形势，预见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且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估计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和两个前途。他指出：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我们面前摆着"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③，即一个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另一个是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去。在这两种可能性、两个前途中，好的可能性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3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52页。

光明的前途是主要的。我们应当利用有利条件（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全国人民的觉悟、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去反对坏的可能性，争取好的可能性，反对黑暗的前途，争取光明的前途。这里，毛泽东在实际运用中深化了唯物辩证法的可能性范畴。

**（五）指出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分析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即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的客观标准。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① 生产力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真理论的实践标准，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具体化，它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次是指出了解放生产力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核心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明确指出，在中国这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解放生产力主要是解放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广大农民，基本的方式是改革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从封建落后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上层建筑通过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强烈影响。他说："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要想解放生产力，在变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同时，应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该坚决地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反动政治，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

第三，指出解放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的形式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变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但是，也不能在整个社会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能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 （六）通过论述党的三大作风，阐明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论联合政府》一文通篇贯串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通过论述党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开展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阐明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 在这种群众观点之上，毛泽东为我们制定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要求每个干部要"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到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② 为此，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

党的三大作风，就其实质来说，都反映了党同人民群众之间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4—10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5页。

的正确关系。所谓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实际”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联系实际，某种意义上也是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过程，也就是向从事各种社会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作调查，了解群众的要求，倾听群众的呼声的过程。脱离群众，就必然会脱离实际，也就必然会使理论与实际脱节。自我批评的实质，就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①，这也是与人民群众密不可分的。我们身上沾染的政治灰尘，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各种错误缺点，是妨碍人民的利益的，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经常打扫，经常检讨，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我们的思想、意见、办法就会更接近于实际，就会既适合人民群众的需要，也适合于革命的需要。

## 第五节　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为了彻底揭露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端正学风、党风和文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适应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于1941－1943年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实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可以说是一次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宣传辩证法的哲学教育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端正了党的思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1004页。

想路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一）完整地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如前所述，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指出了我们党内存在着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一条是按本本，按“既定办法”行事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1937年毛泽东所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强调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但“两论”中尚未使用“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改造，赋予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含义。他指出：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

由此可见，“实事求是”包括这样几层意思：

1. 从实际出发。首先肯定“实事”、“实际”是人们认识的出发点。这里说的“实事”、“实际”有着比“物质”更为广泛的内容，它包括我们头脑以外的一切客观实际的东西，既可以是物质的东西，也可以是精神的东西，既指客观真实情况，又指人们的行动、实践。“实事”、“实际”是运动变化、联系发展和各具特点的，因此从实际出发，要从运动着的客观事物的特点出发，从客观事实的总和和联系出发。

2. 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指出，求“是”，即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使理论和实际统一起来，指导人们的行动，这是认识的目的和任务。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进一步阐明了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为什么要理论联系实际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所说的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运用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①。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3. 调查研究。指明“求”是的根本方法是调查研究，即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实际，作周密的调查，详细占有材料，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通过分析综合，得出科学的结论。这种“求”是的过程，这种调查研究，不是旧唯物主义那种对事物的消极直观，而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甚至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和《关于农村调查》等著作中，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819页。

进一步说明了这种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过程，就是分析与综合的过程。他说：调查研究，首先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样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分析的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来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这就需要进一步做综合工作，综合就是弄清问题的全貌，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方法①。他又说："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②所以，只有发挥认识的能动作用，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把握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是一个包含着多层含义的总体性范畴：

首先，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中国化表述。它唯物地解决了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坚持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同时肯定了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即人们通过实践可以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并通过实践可以使思维转化为存在。它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而且使它同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获得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839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3－24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了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在实事求是的内涵中，客观存在，不是一般的物质，而是我们周围世界的实际情况，即工作对象、工作条件、群众的实践和需要等等；思维，也不是一般的意识，而是对客观事物内部联系即规律性的认识，是指导我们行动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办法等等，因此，实事求是已不只是一般的哲学命题，而是把人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根本问题——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使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变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

其次，实事求是体现了矛盾问题精髓的思想。如前所述，实事求是中的“实事”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要正确地反映它，就必须把握事物的矛盾运动，同时客观事物及其运动形式又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要正确地反映它，必须把握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实事求是”要求对事物的了解要着眼其发展，着眼其特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找出其固有的规律，这些要求，正是矛盾问题精髓思想的体现。

第三，实事求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从而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所以，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一致的。这一过程，对于领导者来说，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事求是又体现了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总之，实事求是把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论溶为一体，但它首先是唯物论。所以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

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 又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2]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起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 （二）系统地批判了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整风文献中，对主观主义作了系统的批判，深刻地揭露了主观主义的性质、特点、表现形式、社会历史根源，对革命的危害性，并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途径和方法。

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它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不仅唯心主义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也是主观主义，因为形而上学就是用片面的、表面的观点看问题，而片面性、表面性，也就是主观性。

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3]

主观主义对革命事业有极大的危害性，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4]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一定时期内都可以成为主要危险。在

---

①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2、109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0页。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指出："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它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① 但另一方面，教条主义者如果没有经验主义的合作，就不会流毒全党，所以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还必须克服经验主义的障碍。

主观主义在中国的条件下，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它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有相当的数量，即使是工人出身的党员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容易产生主观主义"②。在小资产阶级中，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为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比较容易表现为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那一部分人，虽然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经验主义。当然，主观主义不仅有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还有认识论根源，主观和客观的分裂就是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所以，不能认为只有小资产阶级才会犯主观主义错误，无产阶级也会犯这种错误，区别只在于无产阶级比较少地犯这种错误，一旦犯了，也能够比较快地、自觉地加以纠正。

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加强调查研究，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3页。

要向理论方面学习，都要把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

毛泽东关于主观主义的一系列分析，为我们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 （三）通过论述文艺问题，深化了认识来源的理论和实践标准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的本源问题作了深入的考察，他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①] 这就是说，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同样的道理，认识是客观实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客观实在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这同我们说认识来源于实践是不矛盾的，因为客观实在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这样就坚持了反映论，彻底解决了认识的来源问题。

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毛泽东回答道："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0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①] 这里讲的“源”与“流”的关系，也就是《实践论》讲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相互关系问题。文艺工作者的生活经验包括直接生活经验和间接生活经验，直接经验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条件，但它又是有局限的，因而要有间接经验作补充，然而仅靠间接经验，也不可能创造出好的作品来。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②] 这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主体性的作用是很强烈的，这种反映带有创造性质，所以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强调反映论，并不排斥作家主体能动性的发挥。

毛泽东在论述文艺批评的标准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分析了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动机的客观标准。这里，一是明确主张动机和效果统一论。他说：“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0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1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① 当然，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是对立的统一、辩证的统一，有时动机和效果也会发生矛盾，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是因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有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的原故。而实践则是使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的基础和保证。毛泽东指出：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也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必须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对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使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②。二是强调社会实践标准。毛泽东指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③ 毛泽东在动机和效果关系问题上强调社会实践及其效果的作用，实际上是主张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他公开申明："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④。所以，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是实现动机与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8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3—87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4页。

效果辩证统一的现实的出发点。

（四）通过论述伦理道德问题，发挥了关于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中，通过论述伦理道德问题，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他指出，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意识，学习白求恩、张思德等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改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更好地担当起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任务。因为认识是否正确、主观是否符合客观，除了同是否参加实践、同客观事物的发展和表现程度有关之外，还同人们的主观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主体的立场正确，思想纯洁，精神振奋，知识结构合理，认识能力强，那末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比较正确；反之，认识就会发生错误。因此，要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而改造思想意识，加强道德修养，是改造主观世界的一项重要内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页。

# 第六节　把哲学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相一致的原则，把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工作经验和领导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 （一）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论述了方法论的一般原则

毛泽东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哲学的方法论功能。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注意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 而且他强调指出："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②1937年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从理论上指明，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而且重点在方法论上。《实践论》主要是告诉人们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9、140页。

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统一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矛盾论》则主要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在抗日战争时期，方法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除《论持久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等著作直接涉及方法论问题外，已经有了专门讲方法论的著作，如《〈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特别是后者最为重要，它从世界观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方法上的历史经验，初步建构起工作方法论的体系。

这些著作中涉及的方法论的一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这是对的；但不能理解为两者是等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差别性和矛盾的一面，这种差别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如他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世界观主要说明世界“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则告诉人们“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①。从世界观到方法论到具体方法，从“是什么”到“怎么做”，要经过从一般到特殊到个别这样一个层层推进的过程。这就是说，首先要把一般理论转化为行动的纲领和路线，其次转化为政策、计划、方案；再次转化为实行的具体方法。

正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有这样的区别，正因为方法论如此之重要，所以毛泽东延安整风中强调我党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②。为了教育全党干部学习和研究“思想方法论”，1941年10月30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专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7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题报告；他还提议并负责编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读物①。

2. 方法和规律的关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提出了一个方法论的新概念——“指导规律”。毛泽东说，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但应该要求智勇双全的将军。而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习和掌握的。“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②他又指出，指挥员指挥战争，就象在大海中游泳一样，要懂得游泳术，这个游泳术不是别的，就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的指导规律。他说：“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③这就告诉我们：“战争指导规律”是为主体所掌握并加以自觉运用的行动规律，即人们研究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和战争的主体活动规律之后所采取的作战方法或战略战术。“指导规律”这个概念，不只适用于战争，而且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指导规律”是相对于“客观规律”而言的，它不仅说明“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告诉人们“怎么做”，既反映了客观规律，又体现了主体的目的，具有合规律和合目的相统一的性质，它已不属于“理论观念”，而属于“实践观念”了，这样就为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和方法提供了中介。这也说明，方法不是任意的，虽然可以多种多样，但必须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 方法和实践的关系。这主要是说，方法是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为完成一定的任务而采取的；科学的方法应到群众的实践中去寻找，“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

① 参见石仲泉：《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历史透视》，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7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8页。

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1]此外还要注意指导不同质的实践活动要采取不同质的方法；实践发生了变化，方法也应随之变化。

### （二）制定了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除论述了方法论的一般原则外，还为我们党制定了基本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这主要是：

1．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

>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

这是把认识论应用于党的实际工作，化为领导方法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而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所以对于领导者来说，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来。领导者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经过改造制作，化为集中系统的意见，形成关于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办法的初步设想，并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见之于行动，在群众实践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0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9页。

确。这个过程，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个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样，毛泽东就把“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和“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统一起来了，把历史观和认识论统一起来了。群众路线既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又是根本的认识路线，党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2.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主要是要充分发挥领导和群众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领导等。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主要是说领导者在工作中要把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毛泽东说：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②

“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00页。

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①

这一领导方法，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它符合人类认识运动的正常秩序，符合认识的辩证法。就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人们总是先接触和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然后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总是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能进行概括，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当人们认识了这种共同本质之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向着尚未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② 毛泽东在这里论述的人类认识运动秩序，即“个别——一般——个别”，正是“个别指导——一般号召——个别指导”的领导方法的基础，同时又从辩证法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过程的理论。

3. 抓住中心工作，统筹工作秩序

毛泽东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又说：“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0页。

导艺术。”[1] 这一方法是《矛盾论》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的创造性运用。这里要注意的是：第一，不能在一个地区，同时出现许多“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第二，不能抓了中心工作而丢掉了其他工作，要统筹全局，抓住重点，兼顾其他，有秩序、有节奏地开展工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毛泽东所倡导的这些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后来又有了新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的《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都是抗日战争时期领导方法的直接继续，也为建国以后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把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概括为十二条准则。从哲学上讲，它说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正确解决党委会工作的各种矛盾，如民主与集中、集体与个人、团结与批评等矛盾的指导原则；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是解决中心工作和一般工作，统筹兼顾的关键；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质和量及其相互关系，是制定政策，做好工作的基本依据。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901页。

# 第五章 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与毛泽东哲学的进一步展开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人民奋起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或者是革命人民被打败，建立一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毛泽东以革命的胆略和高度的斗争艺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军事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第一节 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面临的复杂形势，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两种可能性，并相应地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为党和人民指明了光明的前途和斗争方向。

### （一）及时地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

科学地分析革命形势的变化，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是制定正确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基础。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他

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立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① 这就是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当时集中地表现为建立什么国的斗争。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则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企图，要求保卫胜利果实，主张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这将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它将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国民党蒋介石之所以要篡夺胜利果实，要打内战，要建他的"国"，这是他老早就定了的，也是由他的反动本质决定的。毛泽东说："国民党怎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② 从过去的历史看，国民党蒋介石过去打了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抗日战争时期，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曾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他躲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③。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抗战胜利后，他就赶紧下山，扩展自己的势力，抢夺胜利果实，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3—112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4页。

介石方针的基本点。”①

毛泽东还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针。他指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附属国。“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②还在抗日战争进行之中，美帝国主义就利用援助中国抗战的名义，积极扩展其侵略势力，企图在战后取代日本在华的地位；日本投降后，它积极帮助蒋介石运兵，以便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美军还直接在中国主要港口登陆，替国民党抢占交通要道和战略要点，美国政府又给蒋介石大量的贷款和物资援助。这一切也是由它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在深入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毛泽东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基本方针，并相应地提出了革命人民的斗争策略。他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③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④

### （二）分析了抗战胜利后战争与和平的两种可能性，制定了我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正确方针

如上所述，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是老早就定了的，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也是老早就定了的。照这样说，抗战胜利后就只有一种可能性：马上爆发全面内战。毛泽东指出，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2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6、1133页。

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① 蒋介石要打内战，“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得不讲现实主义”②，要求和平谈判。所以，暂时的和平也是一种可能性。对此，毛泽东指出：“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③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上应该是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能否实现和平是矛盾双方的事情，而不是由我方一厢情愿决定的。就我方来说，我们是愿意和平的；但蒋介石一方却并非如此。毛泽东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④

根据对和平与内战两种可能性的分析，毛泽东为我们党制定了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正确方针，即一方面要尽一切努力去争取国内和平和国家的民主进步，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另一方面提高警惕，准备以正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建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7、115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0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5—1126页。

立新中国。在斗争策略上要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指出："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①。我们要针锋相对，即以武装斗争反对敌人的军事进攻，以政治斗争揭露敌人的"和平"阴谋，在坚持革命的两手中，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上。他说："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②还说："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以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③在和平谈判问题上，毛泽东从维护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深刻地论述了坚持原则和作出必要让步的关系，提出了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在如何对待和平协议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并论述了既要信守谈判中已经达成的协议，又要同时保持高度警惕的指导思想。

### （三）揭示了"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的历史发展趋势

如前所述，抗战胜利后，有人担心国内可能爆发全面内战，国际上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害怕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因而对形势产生悲观的看法，对前途缺乏信心。毛泽东指出，这是不能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看问题的原故。他说："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④ 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看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⑤因为战后苏联更强盛了，欧洲的面貌改观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全世界的进步势力更团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6、1159页。
④⑤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4、1162页。

结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怎么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对原子弹也不要把它看得神乎其神，主要地还是取决于人民的斗争。“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①

同时，毛泽东又指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不可忽视。“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已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②

毛泽东对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分析以及据此提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使我们在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激烈、复杂的斗争中，沉着、主动，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 第二节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哲学意义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不能打败蒋介石，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当时一些好心的国内外朋友，对处于劣势的人民解放军能否战胜国民党反动派也抱有怀疑和忧虑；在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一些人，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迷惑，表现软弱，不敢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战争。为了回答上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63页。

述问题，廓清人们思想上的种种疑虑，增强革命人民的胜利信念，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指出蒋介石和美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样子看起来可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当然它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中国人民将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①。

### （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形成发展过程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对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它告诉我们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论断有一个形成发展过程。早在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就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② 后来，毛泽东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透彻地分析了腐朽力量和新生力量的不同发展前途，作出了星火燎原的科学预见。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批评了“唯武器论”，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1942年10月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中，分析了希特勒法西斯势力外强中干的实质，提醒革命人民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1946年8月在同美国记者的谈话中才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1947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解放战争十八个月的经验时指出：当着以蒋介石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5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2页。

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那时，我们说，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十八个月战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论断。”①

解放后，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1955 年 1 月，他在同外国驻中国的大使谈话时说：美国的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②。1957 年 11 月 18 日，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上指出：现在的国际形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是没落的势力，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世界历史不能用钢铁数量的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他又重申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并且赋予这一论断以方法论的意义。他说：“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245－1246 页。

② 参见《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955 年 1 月 28 日）。

要重视它。"[①] 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不在具体问题上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1958 年 12 月毛泽东在武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期间，为了回答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疑问，写了一篇《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文章，从哲学上全面地阐述和发挥了这一科学论断。他说：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

①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57 年 1 月 18 日）。

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上万！成千上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①

### （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哲学意义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剖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外强中干的本质，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为我们制定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提供了理论依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第一，深化了矛盾论的思想。毛泽东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即都包含着矛盾，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这种两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历史地看，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的上升时期，曾经是革命者、先进者，是真老虎，后来由于它们的对立面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它们才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另一方面，现实地看，反动的、落后的阶级，尽管它们已经衰落、腐朽，但它们还有一定的力量，还要作垂死的挣扎，还要同它们的对立面作斗争，还要吃人，还有真老虎的一面。这样的分析就把事物两重性、事物包含着自始至终的矛盾的思想贯彻到底并作了具体的发挥。

第二，深化了过程论的思想。毛泽东在阐述这一科学论断时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页。

指出，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的，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我们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意思是说，它既是真的，又是纸的，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不用过程的观点、转化的观点看问题，是无法理解毛泽东这一科学论断的。

第三，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在阐述这一论断时，一再强调，“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这一论断告诉我们：看事物，既要看现象，又要看本质，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既要看到事物的现状，又要看到事物的发展，要有长远的观点；在人和物（武器）的关系上，既要见物，又要见人，要反对见物不见人的“唯武器论”。从这种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在战略上即整体上，我们要藐视敌人、藐视困难；在战术上即具体问题上，要重视敌人，重视困难。目的是促进事物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贫弱向富强转化。革命和建设工作，就是做这种转化工作。

有一种观点认为，“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论断有逻辑矛盾，是一种“悖论”。我以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这一论断是科学的，它包含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两个判断合在一起说的：一个判断是“帝国主义从战术上看是真老虎”，一个判断是“帝国主义从战略上看不是真老虎”。这两个判断各自都没有逻辑矛盾，彼此也没有逻辑矛盾。

## 第三节　十大军事原则对军事辩证法的新发展

如前所述，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就为我军制

定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解放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及时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先后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的总结》，《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等党内文件，特别是1947年12月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 （一）十大军事原则的主要内容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中主要内容如下：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后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①。

这些原则的提出，使我军的战略战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我们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正如1958年6月毛泽东自己所指出："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②

## （二）十大军事原则中的辩证法

十大军事原则，系统地阐明了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方法、作战形式、战斗作风等一系列原则，充满着唯物辩证法。

第一，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矛盾辩证法。例如，在选择作战对象上，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在作战方向上，先取中、小城市和乡村，后取大城市；在攻城问题上，根据敌守备强弱情况，分别采取"坚决夺取"、"相机夺取"和"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的方针等等，体现了区分强弱、大小、难易、先后的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的辩证法思想。

第二，体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十大军事原则特别是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4卷第1247—1248页。
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4卷第1261页注释 [4]。

其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对量变质变规律的生动的具体运用。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尽量避免打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①这就是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通过每个战役、战斗的胜利，不断积小胜为大胜，经过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一系列过程，达到在全体上由劣势转变为优势，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三，体现了战争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法。十大军事原则中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就是要求每战要有充分准备，有胜利的把握。所谓有准备，就是要求指挥员明察敌情，拟定计划，部署兵力，组织协同，进行政治动员等等；所谓有把握，就是指具备了战胜敌人的条件，诸如作战对象是好打之敌，群众条件、地形条件有利，自己集中了优势兵力，等等。要做到有准备、有把握，归根到底，是要求指挥员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十大军事原则要求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更是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极端重要性。

此外，十大军事原则要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作战形式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变化，由运动战发展到阵地战，等等，又体现了辩证法的发展变化观点；关于休整问题，体现了劳和逸、张和弛的辩证关系；关于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的问题，体现了辩证逻辑中关于客观上（不是概念上）的综合的辩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七章中专门论述。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7页。

## 第四节 《论人民民主专政》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如前所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即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中国人民在推翻帝、官、封的统治以后，究竟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各个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怎样？这个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如何？这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是什么？这些问题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成为全国人民都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迫切要求作出明确的回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为了澄清一些人的糊涂观点，驳斥内外反动派的诬蔑和攻击，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时候，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完整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一）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特点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他说："一切民族都将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②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要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又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相区别。其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在《论联合政府》中又重申，我们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要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它的政权组织，应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则把这些思想系统化，完整地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①] 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就其本质而言，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这一政权的领导而言，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它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其特点，一是在政权的阶级构成上具有广泛性，除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外，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发展经济，必须利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二是在概念的表述上，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了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内容以及它的职能的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中既有"专政"，又有"民主"，并采用了内容广泛、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0页。

丰富的“人民”一词。它既科学，又易为群众掌握，有利于在实际工作中防止误解和产生片面性。三是人民民主专政肩负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阶段的历史任务，是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具。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人民民主专政虽然带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因素，但总体上说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担负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只是从1953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人民民主专政才担负起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① 同年11月接管平津前，毛泽东同薄一波谈话，指出“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搞无产阶级专政。”② 毛泽东和党中央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提上日程，视人民民主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后的事。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创造了一种政治形式。

### （二）阐明了人民政权中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指出，国家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种暴力机关，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这是一切国家的共同本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与以往剥削阶级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广大的被剥削阶级对少数反动的剥削阶级所施行的专政。这种专政是非常必要的。他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习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9页。
②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页。

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① 反动派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是“独裁”、“极权主义”等等，毛泽东回答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②

在此基础之上，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的辩证关系。他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③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对于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群众有权选举自己的政府，组成自己的国家，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对于反动派则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人民民主专政由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另一方面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强大的阶级统治力量，对反动派实行强有力的专政；也只有对反动派实行强有力的专政，粉碎他们的反抗和破坏，人民内部的民主权利才能得到保障。这就是民主和专政的辩证法。

### （三）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8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5页。

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①具体地说，人民民主专政有三方面的任务：第一，强化国家机器，对内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强迫反动分子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对外防御国外敌人的侵略和颠覆。第二，保护人民的利益，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并用民主的方法教育全体人民，改造从旧社会带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第三，组织经济建设，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农业社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问题②。毛泽东号召我们的干部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学经济工作③。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的这些规定，应该说是全面的、正确的。

### （四）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论述了阶级专政同阶级、政党、国家消亡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指出：“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渐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他还说：“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④ 在这里，毛泽东指明了阶级是要消灭的，政党和国家是要逐步消亡的，这是人类社会的远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是共产主义者，才是辩证唯物论者。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阶级的消灭，政党和国家的消亡是一个过程，要有时间和条件。时间，就是过渡到了共产主义；条件，就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要想消灭它，必须先加强它。不承认这一点，也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6页。
②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7、148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8页。

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论者。在对待国家的问题上，毛泽东批判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宣扬的国家“永恒存在”论；一种是形而上学的“立即消灭”论。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都不懂得事物生存和发展的规律，都不懂得辩证法。宣扬这些观点的目的，前者是不愿意资产阶级国家被人们推翻；后者是企图阻挠人民政权的诞生，反对它的成长壮大。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我国长期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它为我国的政权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第五节　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府被推翻，标志着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彻底破产。因此，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其焦点是究竟采用哪一种反革命的方式能够制止中国革命，以避免和挽救他们彻底失败的命运。美国的当权派为了替自己的失败作辩护，发表了一份“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由美国国务院于 1949 年 8 月 5 日炮制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一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发表该书于同年 7 月 30 日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这两部分内容所构成。白皮书正文分为八章，另附有中美关系大事年表和有关对华政策文件一百多种。书中主要叙述从 1844 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 1949 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其中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 1949 年的五年中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白皮书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美蒋反动派的失败的叙述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说教，而这些观点在中国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

中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为了批驳美帝国主义散布的种种谬论，为了利用白皮书这部极好的反面教材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那些对美帝国主义还存在幻想的知识分子，争取他们丢掉幻想，站到人民方面来，毛泽东抓住时机，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美国白皮书的文章，深刻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的糊涂思想，对他们的唯心史观进行了一次大扫除，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 （一）指明了阶级斗争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在五评白皮书中，毛泽东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阐述了人民和敌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逻辑。他指出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不会停止捣乱，放弃侵略，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他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① 这一论断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阐明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的行动规律和历史命运，要求我们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认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保持革命警惕。毛泽东还总结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人民的逻辑，即革命斗争的发展规律。他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②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人民的革命斗争是进步的、正义的事业，是必然要取得胜利的，但是斗争的道路是曲折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6、1487页。

的，必然会有艰难困苦和挫折，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才能实现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在论述了这两种不同的逻辑的基础上，总结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 这一论断说明阶级斗争观点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地位，它强调的是，在阶级社会里，只有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社会历史，才能正确认识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抓住它的本质，掌握社会发展规律。这一论断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类的全部历史（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③] 可见，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但并没有排斥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作为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标准。他在五评白皮书中分析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时，恰恰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依据的（下面我们将要说明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与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标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对立起来或等同起来，而应如实地把它看作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至于这一论断的文字表述是否有不妥之处，我觉得是可以研究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87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37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87 页。

### （二）从分析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中，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社会革命论

白皮书叙述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时，讲了很多神话，如什么“人口太多”呀，“西方的影响”呀，等等。对此，毛泽东在对白皮书的评论中，逐一加以驳斥，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分子胡诌的种种神话，批判他们散布的唯心史观，论述了唯物史观的社会革命论。

第一，关于革命发生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之所以发生，不是什么人口过剩，而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和革命。中国革命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具体表现为帝、官、封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从本质上说，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是新的生产力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

第二，社会革命发生的条件。帝国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发生的第二个原因是“西方的影响”。毛泽东批驳了这种观点。他指出，“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在唯物史观看来，主要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而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即进行侵略扩张。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修铁路，办工作，这些工厂、铁路、枪炮等等，就为中国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社会的内部平衡，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产生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另一方面产生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由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①。所有这些就成了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力量。至于说到西方思想的影

---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3页。

响，起作用的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而是一样新的东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①，并且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成了进行社会革命的精神力量。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提高了中国人的觉悟，迫使他们发扬革命精神，从斗争中团结起来，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内在精神条件②。

第三，关于社会革命的目的。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复兴文化③。

### （三）通过分析理论发挥作用的环节，说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时，分析了理论发挥作用的三个环节：

第一，实践的客观需要。毛泽东在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时，认为基本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那末理论就不可能实现对实践的指导。

第二，同实际发生联系。毛泽东在说明理论的指导作用时，明确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那末，“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是不起作用的。

第三，被人民群众所掌握。这是实现理论指导作用的物质保证，是精神变物质的最重要一环。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6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4页。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6页。

在中国之所以发生重大作用，就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掌握了”。理论“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①

毛泽东关于理论发挥作用的三个环节的分析，体现了彻底唯物论和彻底辩证法的精神，进一步发挥了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马克思曾经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又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③毛泽东的分析既肯定了理论，特别是代表先进阶级的科学理论的巨大作用，又强调了理论发挥作用的条件，说明社会意识归根到底要受社会存在的制约，离开社会存在，离开实践和群众，抽象地谈论思想理论的作用，是违反历史唯物论的历史唯心论。

### （四）通过揭露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新阴谋，说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

毛泽东在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中指出：美帝国主义在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直接进行武装干涉失败之后，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要继续捣乱，办法是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充当他们的代理人，从内部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对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得很明白：“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初提出。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洞察力，最先揭露了这种“和平演变”战略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指出这种阴谋活动的主要手法是以武力为后盾，通过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宣传工具，“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特别是用所谓“民主”、“自由”、“援助”、“友谊”来欺骗、拉拢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希望他们“再显身手”，从内部改变我们的政权性质。因此，“民主个人主义者”是艾奇逊们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社会基础”。防止“和平演变”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争取“民主个人主义者”。接着，毛泽东对“民主个人主义者”进行了正确的分析，指出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是指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集体主义、民主集中制、国际主义等不赞成，甚至抱有反感，但还有爱国心的人们。他们觉得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见得好，要看一看再说，他们认为美国有科学，有技术，有民主政治，有很多钱，会给人民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做捣乱工作了，他们容易被帝国主义的甜言蜜语所欺骗，头脑中还有许多反人民的思想，“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①，是人民内部问题，是争取团结的对象。先进的人们，应该“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②

毛泽东通过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新阴谋的揭露和关于如何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进一步说明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种长期性在于，国际上帝国主义还存在，它们一天也不会停止捣乱，这是它们的阶级本性和行动“逻辑”所决定的；国内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并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5页，着重点系作者所加。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8页。

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①，因而阶级斗争“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②。这种复杂性在于，帝国主义还会同时或交替地使用军事威胁、武装颠覆、“精神侵略”、封锁禁运等各种手段进行捣乱，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互相交错；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还会有所反映，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现象就是一种表现；因此，阶级斗争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可以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就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建国以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6、1486页。

# 第六章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毛泽东哲学的继续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毛泽东在领导我国人民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的实践中，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运用和发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这个学说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历史局限性，必须加以认真地分析。

##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就是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探索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途径。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分析了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形势与任务，阐述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的基本思想，绘制了新中国建设的蓝图。

### （一）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谈到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统制政策时，分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①这里讲的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主要矛盾。这一论断是从分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情况中得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内部有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中，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因而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和资本家的反限制，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与经济结构相联系，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着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由于工人阶级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因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在政治上必然存在着复杂激烈的矛盾和斗争。

根据这种对主要矛盾的分析，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向城市，由革命转向建设。他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② 又说：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6—1427页。

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一切其他工作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①，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恢复和发展，并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② 虽然这是就城市工作而言的，但毕竟开始提出了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③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毛泽东还提出了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问题。

毛泽东关于建国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考虑到他加上了“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的限制，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在社会主要矛盾将要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候，抓住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这个新因素，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根据新的形势，进行新的斗争。但是这个提法是有缺陷的。它的缺陷有两点：第一，没有明确指出这一主要矛盾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把建国初期大量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完全反映出来。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改、剿匪反霸、恢复经济、抗美援朝，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把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并列起来，笼统地强调和他们作斗争，也是不科学的。第二，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二元化。一方面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事业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7、142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7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为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同时又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样就出现了主要矛盾不决定主要任务的理论漏洞。这种理论上的二元化，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复杂特点，也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的矛盾。从中国经济的异常落后而言，应当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从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而言，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他的这种认识又与对于革命转变的起点不明确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认为是"立即转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疑是主要矛盾；如果是建设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后再进行转变，那末这个矛盾就不应当视为主要矛盾。刘少奇曾对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上述提法提出过不同的意见。1949年7月，他在党内所作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在原稿上还有一句，'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正式稿删去了——引者注）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火力点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是或开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①] 但1952年以后，他又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上述观点。

### （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分析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阐明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

① 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论的思想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革命转变论的思想。其基本点包括：

一是分析了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基本目标。主要矛盾问题已如上述。关于基本目标，他指出，要“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他明确告诉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②，“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③

二是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④ 这就是说，中国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三是据此制定了我们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方针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7、1438、143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页。

和政策，以保证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在经济方面，首先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因为它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忽视或轻视这一点，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其次要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在革命胜利后，还必须尽可能利用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城市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又必须采取限制的政策。如果放任资本主义经济无限制发展，这是错误的；反过来，如果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多太死，或者认为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主义，这也是错误的。再次是对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最后是必须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这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能最后解决。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警惕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和颠覆活动，注意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以便孤立反革命势力。

在外交方面，不承认旧中国的一切卖国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宣传机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对于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它们不改变敌视态度，就决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地位；既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等等。

这些理论、方针和政策，探索了中国革命转变的主要途径，为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指明了发展方向。但

是后来毛泽东改变了这个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认为中国不存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了，转而按照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

## 第二节 在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的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

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面临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的艰巨复杂的任务：对内要继续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要镇压反革命，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实行土地改革；对外要抗美援朝，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锁。要完成这些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有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毛泽东为我们党制定了这样一套战略策略，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 （一）抓住主要矛盾，不要四面出击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得到了解放，绝大多数人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但是问题很多。毛泽东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指出："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① 另一方面，在人民内部，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5页。

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①

面对这种情况，应当采取什么方针呢？毛泽东认为应该抓住主要矛盾，不要四面出击。

关于什么是当时的主要矛盾，我们在上一节中谈到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的看法，那时他还没有明确说明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只是说，“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1950 年 4 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回答了这个问题。发言记录稿在谈到“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时，毛泽东认为不对，他批写道：“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② 这就说明，当时的主要矛盾还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的矛盾。根据这种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攻击目标，“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③ 具体地说，对外，就是要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对内，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为了解决主要矛盾，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我们就不能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695 页。

② 转引自龚育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4—95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695 页。

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①

为了贯彻这一战略策略，要做多方面的工作，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② 例如，通过土地改革，消除农民的意见，使工农联盟巩固起来；通过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对小手工者，要给他们找出路；对知识分子，要安排使用，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全党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

按照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③ 并且明确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④

实践证明，"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毛泽东在 1955 年 10 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回顾和总结这一段历史时说："1950 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⑤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697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695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696 页。
④ 《为争取国家财经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 年 6 月 6 日)。
⑤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 年 10 月 11 日)。

“不要四面出击”，作为一种战略策略思想，不仅适用于建国初期的工作，而且具有一般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其精神实质就是强调看问题，做工作，都要分清主次，必须集中力量，抓住主要矛盾，不可平均使用力量。

## （二）政治斗争和发展生产有机结合

建国初期，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任务十分繁重。大体上说，有两个方面：一是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二是开展一系列政治斗争，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等。

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是中心工作。因为只有恢复和发展生产，才能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也只有恢复和发展生产，才能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只有恢复和发展生产，才能渡过建国初期的难关，为其他一切工作打下基础。

毛泽东在坚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工作的同时，又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和抗美援朝“五大运动”，使政治斗争同恢复和发展生产二者互相结合、互相促进，辩证地统一起来。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开展各种政治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通过各种政治斗争，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方面，政治斗争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束缚，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政治斗争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可靠的政治保证。这样就坚持了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法，这是建国初期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 第三节 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批判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唯心主义

建国初期，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干部队伍中反对主观主义，端正思想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批判唯心主义，以推动建设事业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毛泽东领导了这两方面工作的开展。在这个过程中他宣传和阐发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思想，同时，后来在思想文化问题上的一些“左”的做法和提法已初露端倪。

### （一）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了使干部的思想适应建国以后的新形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必须反对干部中因为革命胜利了而滋长起来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此，毛泽东在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以及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再谈到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问题，主要思想包括：

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主观主义的新特点问题。他说：“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

和建设就不会成功。”①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急躁冒进或保守，就是主观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表现形式。如果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是在处理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主观主义，那么，急躁冒进，则主要是在处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主观主义。在客观规律面前，消极悲观，无所作为，这是保守的主观主义；无视客观规律，超越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勉强去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是急躁冒进的主观主义。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他重点是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他说：“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② 他拿1953年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现在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③他还把冒进、保守直接与“左”右联系起来，认为“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④

二是揭示了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两种对立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毛泽东指出：“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⑤“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的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⑥ 与此相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认识和实践相统一。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

①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
②③④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1月)。
⑤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⑥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① 这里，毛泽东已经提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点，并提到要把实践检验真理作为思想路线的内容之一的问题。

三是提出了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的办法。首先是要学习理论。他说："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② 毛泽东提倡学习的理论中，特别强调的是学习哲学。他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方法，"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③。他提出，我们要在广大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队伍中提倡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要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④。其次是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⑤ 因此，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下情。这样才能生产出好的产品来。大区和省市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同样要调查研究，才能生产出上等品出来。

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一系列论述，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把思想方法、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笼统地直接地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或右，会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带来严重

①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②③④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⑤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

的后果，这一点他当时是没有注意到的。例如，1953 年他把薄一波在修正税制工作中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不够，具体条文修改不适当这种工作方法上的偏差，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多次批评检讨，显然是不恰当的；又如，1955 年把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正确意见，说成是“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站在资产阶级、富农立场上替少数人打主意”，等等，显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 （二）批判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唯心论，宣传历史唯物论

建国初期，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在知识分子和学术文化领域中有广泛的影响，它妨碍学术文化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积极领导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这种斗争，当时主要是对电影《武训传》中的唯心史观的批判和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电影《武训传》是建国后拍的一部传记性的历史故事片。片中描写清朝末年一个叫武训的人，毕生行乞，甘受屈辱，兴办“义学”，幻想“念书能救穷人”，影片对武训这种行为，给予歌颂。1951 年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放映后，很多人写文章赞扬，也有少数人提出批评，于是引起了一场社会争论。毛泽东十分关注这场争论。1951 年 5 月 20 日，他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他在社论中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所谓根本的性质，意即世界观和政治立场问题。他明确指出，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历史的发展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不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历史进步的动力是革命阶级对反动阶级的斗争，是新的阶级力量推翻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实行社会变革。但是《武训传》所颂扬的武训则是在统治阶级面前奴颜婢膝，为了求得办学的地位而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宣传

封建文化”。这种丑恶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该歌颂的吗？他还认为，影片为了歌颂这种丑恶行为，“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他还尖锐地批评道：一些号称已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历史思想，就丧失了批判能力，而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

毛泽东的这些议论，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它提醒人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历史，审视和指导文艺创作和其他学术活动，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革命和改良的界限。社论发表不久，毛泽东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①] 但是，他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过于激烈了，如说这部影片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而称赞这部影片的人则是“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等等，把问题提到了吓人的高度。这样就使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批判运动。5月20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还发表评论说：“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接着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有江青参加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写了题为《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调查报告，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连载于《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至28日）。报告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

① 《转引自《中国“左”祸》，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在这样的结论面前，那些对武训和《武训传》表示过赞扬的人就在劫难逃了。这就在文化思想战线开了一个进行错误批判的先例。时过30多年，意识形态战线的主要领导人胡乔木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部影片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影片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①

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毛泽东又在1954年至1955年间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巨著。它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败，歌颂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高度的艺术价值。《红楼梦》问世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人对它从各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专门的“红学”。本世纪20年代，胡适、俞平伯等批评“旧红学”，建立“新红学”。他们除了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考证外，还对它的思想和艺术进行评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那就是研究中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唯心主义思想，在“红学”研究中长期占统治地位。

俞平伯是我国著名的红学家，他在《红楼梦》的研究上是有

① 见1985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成绩的，但从总体上讲，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所坚持的，仍然是胡适派的唯心主义思想。1952 年 9 月，俞平伯把他 1923 年出版的《红楼梦辨》重新编订，收入新作，改名《红楼梦研究》出版。1954 年 3 月又发表了《〈红楼梦〉简论》等文章。这些论著，虽较 20 年代的观点有明显的进步，但仍夹杂着许多错误和牵强附会的烦琐考证。1954 年 9 月，山东大学毕业不久的两位青年李希凡、蓝翎，首先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俞平伯把《红楼梦》看成是作者的"自传"、情场的"写生"，这就抹煞了它的现实意义；把"色"、"空"看作是《红楼梦》的主要观念，这就否定了它反封建倾向；俞平伯用烦琐的考证代替科学的分析，这就不仅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还会引导青年走入迷途。

毛泽东读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后，于 1954 年 10 月 16 日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肯定了李、蓝的文章，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批评了某些"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现象，号召开展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在毛泽东的倡导与支持下，一场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开展。这次批判运动，比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规模更大，参加的人数更多。从 1954 年 10 月到 1955 年 6 月，有关的批判文章达百余万字。但除少数文章是说理性的论文之外，大多数是用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分析，事实上形成了对俞平伯的围攻。从 1954 年 12 月开始，这种批判扩大为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斗争，涉及到哲学、史学、法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一批成果。

这次批判是有积极作用的。一方面，通过这次批判，打破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红学派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垄断地位，使《红楼梦》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于清除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影响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

这场批判中，理论工作者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全面清理，对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真理观、发展观、方法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对于清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阵地，起了积极作用。但这次批判，也是采取政治运动的形式，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为一谈，方法简单粗暴；对胡适其人和他的学术思想，也缺乏全面的分析，给后来的学术评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还是过了30多年，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说道："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指俞平伯）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和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1954年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从此以后，学术界对于胡适其人及其学术思想的评价也出现了较为客观、全面的意见。

## 第四节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发挥

1952年，我国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主要任务——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已迅速恢复，毛泽东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努力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但同时也出现了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反作用的某种倾向。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如前所述，毛泽东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出发，从《新民主主义论》到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都曾设

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大约在15、20年之后才开始。但是，到了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说法开始变了，提出了新的构想。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①在这以后，毛泽东不断宣传从现在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并批评"将来突然转变论"。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②经过反复酝酿和多次修改，毛泽东于1953年12月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的错误。"③

毛泽东为什么将新民主主义社会改为过渡时期进而提出"一化三改"的总路线？现在来探讨其中的原因，我想一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二是当时认识和实践水平的限制。建国后经过三年的奋斗，实行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民主改革和政治斗争，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政治基础；国家已经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营经济已占主导地位，这就为实现国家工业化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13页。
②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4页。

和进行社会改造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统一财经、稳定市场的过程中，国家已通过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等办法加强了管理和监督，并对部分私营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农村部分地区已发展了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手工业的生产也在向互助合作方向发展。这就使毛泽东感到，客观形势的发展已为我们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步骤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有利时机。另一方面通过“五反”之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破坏作用估计过重，忽视了它对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和长期存在的历史价值，因而提出了对之尽快改造、消灭的政策；加之抗美援朝后，战争威胁并未消失，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国际形势，也要求加快工业化建设，实行三大改造，增强经济实力，巩固国防。由于实践条件的限制，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只能以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而苏联当时的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又主要是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的思想和斯大林的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的，因而不能不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根据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条总路线似乎提得过早了一些，但其基本内容还是正确的，它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把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和技术方面的革命，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结合起来。毛泽东在谈到这两方面的关系时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①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 年 7 月 31 日)。

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不可分割。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拿农业来说，只有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原料、市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则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所以毛泽东说："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① 这两种改革要同时进行，但完成的时间可能有先有后，毛泽东当时已估计到了这一点。他说："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②

总路线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而且强调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必须先有社会主义改造，然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他的"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机器"③的著名论断，便是这一思想的集中反映。对于这一论断，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去评价：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它发挥了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的原理，强调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从实践上说，它表明，在我国的条件下，即使没有大批农业机械，只要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因为协作也可以形成一定的生产力，所以农业合作化不应该等到机械化了再进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一论断也是有毛病的。因为没有比较强大的工业的支援，单靠手工劳动的简单协作，其优越性毕竟是有限的。完全离开机械化去谈集体化，实际上就是认为农业合作化可以脱离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

①②③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 年 7 月 31 日）。

发展水平去进行，这不能不说是对农业合作化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的一种表现，从理论上说就有可能导致离开社会生产力来谈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危险。对于这种错误倾向也是需要警惕的。

（二）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体现了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生产关系形式的原理

根据“积极领导，稳定发展”的方针，毛泽东确定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是：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互助组是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形式。它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它既不触动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又可以彼此换工，互相帮助。互助组比起个体农民的单干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农下中农在生产上的某些劳力、耕畜和农具等方面的困难，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培养了农民集体劳动的习惯，提高了农业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但它存在着私有制、个体经营同集体劳动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推动着它向初级社发展。

初级社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级形式。这种形式比互助组有更大的优越性。土地、牲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虽然所有权仍属社员个人所有，但使用权已归集体，由合作社统一经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互助组时存在的集体劳动和个体经营之间的矛盾；能够比互助组更合理和有计划地使用劳动力和土地，有利于分工协作，发挥个人专长，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开展多种经营，使农业和副业结合起来；能够进行一些在个体经营条件下无法做到的基本建设，如兴修水利和开垦荒地等等。

高级社是农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高级形式。它和初级社比较，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它克服了初级社时还没能克服的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的矛盾；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合

理地利用土地，发挥土地的潜力；便于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有系统的技术改造；有利于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生产。

这几种形式中，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形式比较适合于土改后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而且主要是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有着中国的特色，尤其是初级社，它既照顾了农民千百年来小私有的历史特点，又有利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即它具有发挥两个积极性——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合作经济的积极性的特点；而高级社则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苏联集体化模式的影响。如果说农业合作化后期有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简单划一的偏差，主要是指急于从初级社转变为高级社。由此得出一条经验教训：衡量一种生产关系的组织形式是否先进，不能抽象地看公有化程度，而要看它是否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 （三）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一大贡献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就提出过的设想。马、恩曾经指出，假如我们能够用赎买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①]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曾提出对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文明资本家”实行赎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平赎买的设想在俄国没有能够实现。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思想，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最后把赎买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5页。

首先是分析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可能性。中国民族资本的两重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中国能够实行和平改造的主要依据。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以往有着长期的统一战线关系，建国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人又参加了新中国的经济恢复的国家建设，这也是我们实行和平赎买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巩固了工农联盟，割断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系，填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没收了官僚资本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国家掌握了重要的经济命脉；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对资本家的教育等等，构成了中国能够实行和平赎买政策的特殊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采取暴力剥夺的方法，而是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

其次是创造了和平改造的具体形式和赎买的具体方法，解决了如何把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经之路”①。改造的步骤是：第一步变私营企业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把国营企业租让给资本家去经营，而是通过各种形式逐步把资本家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具体形式有三种：（1）初级形式——国家收购大部分产品；（2）中级形式——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3）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个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就是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毛泽东还提出了各种赎买的具体形式。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并没有支付单独的补偿基金，而是在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工人阶级在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时候，

①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9月7日）。

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作为向他们赎买的代价。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资本家所得可占企业全部盈余的25%，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发给他们固定的定息，一般是年息5%。“定息把企业生产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质点：此时的企业，严格说已不是公私合营企业，而是实际上的国营企业了。在这些企业里，资本家不只是退出了生产领域，它所能够得到的以定息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也同原来的企业断绝了联系，它的生产资料从此失去了作为职能资本的作用，于是，原来的企业一变而成为没有资本家的企业了。”①

最后是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使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② 又说：“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③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要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改造之外，还包括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对企业的改造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辩证统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是资产阶级及其意识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及其意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存在的条件。只有在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的实践中才能改造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资本家的思想又能为企业改造减少阻力，创造条件。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中国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是社会各阶级中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多的一个阶级，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懂技术，有业务经验，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企业的干部，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好处。正因为我们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把资本

---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26页。
②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
③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

家及其代理人置于企业的变革中，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实际教育，同时使用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当1956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资本家在企业中的地位，已由原来的支配者、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资本家阶级已不复存在。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消灭阶级的理论的一大贡献。

当然，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偏差，主要表现是时间过于急促；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不很适当；大批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卷入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总的来说是对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必要性考虑不够，过早地提出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口号。

## 第五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与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的前后，毛泽东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矛盾问题和辩证法理论作了初步的探讨，这些探讨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之中。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一开头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

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 有鉴于此，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主要之点是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方针的新思路，即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注意生产和需要、积累和消费之间的适当比例；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把自力更生和向外国学习结合起来。同时，他还对斯大林的错误，从哲学方面进行思考，指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是斯大林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为了避免重犯斯大林的错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他提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② 因此他对辩证法理论作了解释和发挥。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矛盾及诸方面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强调要用“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防止片面性。对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都要看到这些对立面之间相反相成的方面，都要兼顾矛盾的两头。这里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这些矛盾着的两个侧面要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只强调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二是有时为了更好地突出和发展矛盾的一方，反而要向它的对立面用力。这也就是《论十大关系》中反复提出的“真想”还是“假想”这样一个问题。关于发展重工业，毛泽东说：“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21页。

②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① 关于国防建设、关于原子弹，毛泽东说：“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②总之，要想突出和发展矛盾的一方，而且是“真想”、“想得厉害一点”、“十分想”，就必须十分注意解决矛盾另一方的问题，在它的对立面上使劲。三是这一类矛盾的解决方法，不是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战胜一方，而是利用矛盾的同一性，使双方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不是对抗性的，这些矛盾的解决，就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而是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 （三）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中央和地方，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诸关系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法

毛泽东在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③他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经验教训后说：“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④。在谈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他又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

①②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2、725、729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1页。

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①

这里，毛泽东主要是讲经济领域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问题，但已涉及政治生活等其他领域。事实上，无论是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也无论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存在统一性和独立性问题。例如，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战略上的关照全局，战役、战斗中的机动灵活；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都是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问题。这一切说明，统一性和独立性是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一对范畴。统一性主要是指一个复杂事物中的各个部分、个体的同一、一致、协调、配合等等，而独立性则主要指各个部分、个体的特殊性、自主性、主动性、积极性等等。毛泽东提出这对范畴，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既重视整体、又重视个体，既坚持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统一性，又重视个体的独立性、能动性，阐明了社会有机体发展的规律性，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建设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四）自力更生和向外国学习的辩证法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精辟地论证了自力更生和向外国学习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认真学习外国人的好经验，也要研究外国人的坏经验，这就是我们的方针。这一方针的主要哲学依据，一是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二是长处和短处的两点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已经阐明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根据内因和外因相互关系的辩证法，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7页。

要应当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应当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必须注意向外国学习，借鉴别国的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中，着重讲了长处和短处的两点论，强调向外国学习和如何向外国学习的问题。

毛泽东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看问题，肯定每个民族、国家、制度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但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① 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②我们中国，也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这是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它可以激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斗志。因为别国有长处，我们有短处，所以要向人家学习，不能骄傲；因为别国有短处，我们有长处，所以不能盲目地学，不能崇洋媚外，妄自菲薄。那种在外国面前“感觉事事不如人”，“伸不直腰”，一付奴才相，是完全错误的。这样，毛泽东就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思想，指出：“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③据此，他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怎样向外国学习的正确方针：“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40 页。
② 同上书第 730 页。
③ 同上书第 740 页。

然不要学。”① 这里包括这样几层意思：一是要向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学习，不但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② 二是多方面地向外国学习。不仅是学习经济、科学、技术方面的好东西，而且对政治上、思想文化方面有用的东西，也应当学习和研究。三是要有分析地向外国学习。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是这样，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也是这样。“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③ 四是把学习外国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学习和创造结合起来。就是说，在学习外国的经验时，要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要照搬。“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④ 在同年 8 月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又说：“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⑤

### （五）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转化的辩证法

《论十大关系》通篇“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⑥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坚持矛盾转化原理，不仅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且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避免积极因素向消极因素转化。十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40 页。
②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1 月)。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42 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 751 页。
⑥ 同上书第 720 页。

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①。处理得当，就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处理不好，就会使积极因素转化为消极因素。毛泽东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敌我矛盾转化的基本趋势，阐述了对待党内外人们犯错误的正确态度，要求我们自觉地掌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转化的辩证法，努力创造条件，促使矛盾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 （六）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解释和发挥

毛泽东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具体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对对立统一规律作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论点，丰富和发展了《矛盾论》的思想。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根据这个思想，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作了如下的解释和发挥。

1. 从哲学中的“两个对子”看辩证法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看作是根本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在这次讲话中，又明确指出：“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的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② 毛泽东提出哲学中的“两个对子”问题，其意义在于，它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坚持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44 页。

②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1 月)。

物质，还是精神？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根据对它的不同回答而区分唯物论和唯心论。但是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除了要回答世界“是什么”外，还应回答世界“怎么样”的问题，即世界是不是运动变化的？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构成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认为世界既是物质的，又是运动变化的。在这两个对子中，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子是根本的，它规定和制约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子，但另一方面，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子，又影响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子，因为只有从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出发，如实地反映世界的本来面目，才能唯物地辩证地解决世界的本原问题。所以，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对于坚持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人类思想认识发展的过程，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统一，互相斗争而发展的过程。

2. 全面理解对立统一规律

针对斯大林形而上学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对于对立统一规律，不能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他指出：“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① 他批评了斯大林否认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有同一性，否认它们能够互相转化的错误观点。他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② 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后来他自己却重复了斯大林的形而上学错误，他提倡的“斗争哲学”就是明显的表现。毛泽东还指出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② 同上。

对立面有主次之分。他说："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①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是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最后是区分不同性质的对立统一，即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但对立统一的性质不一样，必须加以区别。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②，并进而分析了这两种对立统一产生的原因，初步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3. 用对立统一规律说明辩证法的其他范畴

首先是用对立统一说明"联系"范畴。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观点时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但联系，不是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面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③ 一个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如此，一事物与他事物的联系也是如此，总是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形成矛盾才有联系。这和他在《矛盾论》中讲辩证法的同一性是指现实的、具体的同一性的思想是一致的。

其次是用对立统一说明进与退、动与静、平衡与不平衡等范畴。他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辩证法时指出：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发展总是前后、进退的对立统一。说客观事物总是静，不对；说总是动，也不对；而是静动的对立统一。他说："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② 同上。
③ 同上。

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①] 事物的静动统一过程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又平衡，又不平衡”，这种统一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平衡和绝对的、无条件的不平衡的辩证统一。事物的发展，“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前进。”[②]他还进一步把这种事物的波浪式运动和对立统一联系起来，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③] 这就又一次说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最后是用对立统一说明真理和错误、成功和失败的辩证关系。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用对立统一观点看真理与谬误这一对认识论范畴，指出：“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④]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更加明确指出，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他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⑤]。因为真理是在同谬误的对立中获得规定，谬误在同真理比较中显现其荒谬。同谬误作斗争，可以帮助人们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吸取经验教训，迅速提高认识能力；错误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从反面教育人，使人惊醒，成为正确

---

①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的先导；同错误作斗争，好比种牛痘，可以增强免疫力。从认识发展过程和真理发展规律来看，错误是难免的。毛泽东说："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①因为人们的认识常常受着许多条件的限制，真理不可能一次完成，因此要求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求不故意犯错误，不重犯错误，不犯严重的、一贯的原则上的错误，或者少犯错误，犯了错误则要求迅速改正。所以在如何对待错误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是错误难免和可免的统一论者。从实践上说，认识正确，就获得成功，认识错误，就会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了如果骄傲自满，又可能导致失败。所以成功和失败也是对立统一的。毛泽东总结道："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② 对成绩和错误应该有辩证的观点。

## 第六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伟大贡献与历史局限

继《论十大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之后，毛泽东进一步系统地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伟大贡献。但也应当承认，这部著作还存

---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1 月)。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

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完善和发展。

### （一）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光辉著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是毛泽东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经整理并作了若干修改与补充，于同年 6 月 19 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著作是在国际、国内矛盾迭起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产生的。

在国际上，1956 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2 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国内长期被掩盖的矛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6 月，发生了波兰事件，当局处置不当，造成流血冲突。10 月，又发生匈牙利事件，内因外因同时发生作用，人民内部问题和敌我问题错综复杂，给人们极大的教训。国际共运内部围绕着这些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斯大林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怎样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说明了什么问题，应当吸取哪些教训？为此，1956 年 4 月和 12 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毛泽东修改审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两篇文章提出了如下一些基本观点：第一，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要明确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斯大林的错误是工作中的错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他。第二，必须对斯大林作全面的科学的评价，对他的功过应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来总结。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从理论上说，是和他在某些问题上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相联系的，特别是和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关。第三，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执

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善于处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不要忘记帝国主义的渗透和颠覆活动。从理论的发展过程看，“一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观点，批判了否认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再论”则进一步提出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初步分析，为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奠定了基础，不过这两篇文章所谈的两类矛盾主要是就国际问题而言的。

从国内情况来看，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各种矛盾，如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分配方面的矛盾、学生的民主要求与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等等突出出来，而我们的一些干部又不敢公开承认这些矛盾，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或者习惯于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致激化矛盾。

国际国内的情况说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毛泽东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正是为解决这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而提出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①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到6月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一共修改了十五稿，主要修改之处是：增加了对国内基本形势和根本任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0页。

务的论述；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增加了关于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论述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删去了对“左”的错误思想的批评和对于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人的批评等。这些修改，一方面使这一著作在理论上更加系统、严密，理论色彩更浓；另一方面由于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这一著作的某些理论观点和锋芒所向，前后有明显的变化，即从主要纠“左”到主要反右。

尽管有如此变化，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仍然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光辉著作，它第一次把两类矛盾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作为一门科学进行全面的研究，创作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学说的新篇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

###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科学价值

1. 批判了“无矛盾论”，阐明了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矛盾？这个问题，在毛泽东以前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工农、城乡、脑体劳动的三大差别，存在按劳分配，因而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差别、不平等也就是矛盾。列宁更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差别和矛盾，并且从理论上区分了“对抗”和“矛盾”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① 但他没有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出全面明确的回答。斯大林在1936年以前对苏联社会的矛盾曾作过一些分析，使用过“内部矛盾”（指工农之间的矛盾）和“外部矛盾”（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

① 《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

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这样的概念。但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斯大林在理论发生了混乱。他只看到对抗正在消失而否认矛盾存在，只看到一致而否认冲突，认为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性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并声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完全适合”，没有矛盾。直到1951年才有所纠正，但仍吞吞吐吐，很不彻底。

毛泽东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矛盾问题，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指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① 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天真的想法”②。“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③这就是说，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一致、团结是重要的，但一致、团结只能在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达到。这样就坚持了辩证法，反对了形而上学。毛泽东的论述，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 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阐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基础上，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结了我们党从1927年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以来处理党

---

①②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6、757、766页。

内外、军内外各种关系的历史经验，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不同情况，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首先是明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个概念。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在于：“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① 之所以有这种性质的不同，是因为这两类社会矛盾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产生的：敌我矛盾是由于根本的利害冲突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局部利益不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键在于分清什么是人民和敌人。他指出：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是历史的范畴，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②

其次是分析了两类矛盾的各种表现及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敌我矛盾主要指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境外敌对势力派遣的特务、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如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工农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第二类是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三类是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58 页。
② 同上书第 757－758 页。

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① 第四类是不同党派之间的矛盾，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群众之间的矛盾。例如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沿海与内地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此外，还有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而产生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也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毛泽东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② 又说："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③

再次是揭示了两类矛盾存在的社会根源。两类矛盾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的根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虽然基本适合，但仍然存在着矛盾。毛泽东认为，代表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反革命分子还存在，以及国际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对我们进行渗透和颠覆，是敌我矛盾还存在的根源。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根源；生产关系某些环节的缺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以及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的缺陷，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还从总体上提出了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他说："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8页。
② 同上书第764页。
③ 同上书第759页。

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①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剥夺敌人的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让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国家的法律。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② 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并且大都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当然，为着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者也要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毛泽东还专门谈到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来解决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矛盾。此外，他还提到了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来处理经济生活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可惜的是对于这个重要问题，并没有具体展开说明。

在作了上述分析之后，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指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转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向自然界开战，敌我矛盾降到了次要的地位，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它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事业服务。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65 页。

② 同上书第 763 页。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这些矛盾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成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矛盾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3.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

毛泽东在探讨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时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新概念，并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原理的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并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作过深入的研究，指出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①。但他们当时只是把"基本矛盾"这个概念的含义限定在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时也是在马恩所规定的含义上使用"基本矛盾"这一概念的，但列宁在分析社会有机体时已经有了要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矛盾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结合起来的初步思想，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骨胳有血有肉"②。斯大林晚年虽然专门论述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但他并没有把这一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2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

矛盾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马恩列斯的思想，并依据他对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的一贯看法，总结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是将马恩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使用过的“基本矛盾”的提法，从特殊表现形态上升为一般形态，具有了普遍意义；二是正确地估计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揭示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三层结构和社会有机体的全貌，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普遍的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整体，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基本的，它决定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后者又反过来制约、影响前者，从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矛盾运动：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要求又导致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新的上层建筑的建立，保证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而新的生产关系则使生产力从旧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人类社会就在这样一个川流不息的辩证运动中前进。所以“社会基本矛盾”概念的提出有着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①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比较，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

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①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是矛盾性质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二是表现形式不同，它不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不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表现为根本利益一致、局部利益不一致的人民内部矛盾；三是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它不是通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来解决，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即有领导有步骤的改革和大力发展生产力来解决。

此外，毛泽东在论述真理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矛盾，繁荣社会主义科学和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这个问题上一节我们已经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历史局限

任何一种理论、学说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如此。

这里我们先来分析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是两类矛盾划界的模糊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划分人民和敌人的标准，原则上讲是正确的，但不具体，难于操作。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他又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并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② 这些本来是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言论行动的是非标准，即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标准。但毛泽东在一些场合又把它们直接当成了区分敌我的标准。例如，在反右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

② 同上书第789页。

派斗争中，毛泽东说："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因为他们"不符合六条标准嘛！"① 把"六条标准"直接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是有问题的。一是六条标准涉及的内容广泛，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外，还包括民族团结、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国际团结等等。是违反其中一条还是违反全部，就定为敌我矛盾呢？二是违反六条标准也有一个程度问题，是否不分轻重，只要违反了就是敌我矛盾呢？三是毒草和敌我不能简单等同。有的人某一篇文章、某一件作品或某个言论被断定为毒草，是否这个人就成了敌人呢？毒草是对抗性矛盾，但对抗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可以说是对抗性矛盾，但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敌我矛盾。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不能不与这个理论的缺陷有关，右派分子划分的标准本身就不精确，再加上下达指标，层层加码，还能不出错误吗？严格地说，划分敌我，应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总原则，依据法律条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断定才是准确的。

其次一个很大的缺陷是没有说清楚两类矛盾与当前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按其内在逻辑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基本矛盾；第二个层次是主要矛盾；第三个层次是包括两类矛盾在内的其他社会矛盾。在这个矛盾体系中，社会基本矛盾是基础，是贯串社会主义社会全过程的矛盾；主要矛盾则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但它有阶段性、变动性；两类矛盾和其他矛盾从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中派生出来，它们的解决，又反过来影响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基本矛盾确定之后，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谈得上进一步解决包括两类矛盾在内的其他各种矛盾。如果把主要矛盾弄错了，或者在主要矛盾问题上含糊不清，那就必然会影响到其他矛盾的解决。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两类矛盾中的敌我矛盾。能

①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 年 10 月 9 日）。

够认清敌我矛盾，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掌握了主要矛盾。但在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矛盾一般不再是敌我矛盾，但也不能笼统地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还必须进一步指明是什么样的人民内部矛盾才是主要矛盾，否则仍然不能解决问题。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① 为什么在此之后毛泽东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主要矛盾问题却只字不提呢？据了解，“八大”时，毛泽东是基本上同意这个决议的，但认为表述上“有语病”，特别是对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不妥当”，可能由此得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的错误结论。他认为，社会主要矛盾不应仅从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即经济方面去寻找，更主要地是要从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政治方面去寻找。因此，他不满意“八大”的提法，但一时又找不出别的提法来代替。所以他说，“八大”的提法说得不够完善，但没有害处，其用意是要发展生产力。现在不必改，以后怎样改，请大家想想办法②。可见，对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当时毛泽东还在犹豫、思考之中。所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尽管有关于国内基本形势与根本任务的论述，但对主要矛盾问题是没有明确表述的。正因为毛泽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 页。

② 参见《党的文献》1991 年第 2 期第 66 页。

东主张从社会关系、政治方面寻找主要矛盾，所以反右派斗争发生后，他就很快改变了“八大”的提法，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才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服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往往把人民内部非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误认为是阶级斗争，进而又把人民内部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误认为是敌我矛盾。所以在主要矛盾问题上一旦发生失误，不管你主观愿望上如何强调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实践上却往往事与愿违。1957 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每一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升级，都是与对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一再强调同步发展的。另一个问题是出现了主要任务与主要矛盾的二重化现象：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当然这种二重化是不能持久的，后来便以“阶级斗争为纲”消除了这个矛盾。

再其次是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视角和处理方法上的缺陷。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较多地侧重于政治思想方面，如何从经济方面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显得不足。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概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分清是非的问题，因此，解决的方法主要是“团结——批评——团结”。尽管他也提到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处理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方面的关系等等，但并没有具体展开。相反，他反复强调工厂、农村、商店、学校、机关、团体都要普遍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后来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他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② 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很

① 参见《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 年 10 月 9 日)。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18 页。

大程度上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经济矛盾，忽视这一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有落空的危险。因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上的差别比起是非问题，是更为深刻的原因，利益关系上的调整比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更为重要的方法。对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必须具体分析，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办法综合治理。再就是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缺乏体制方面的保障，没有程序化、法律化，很难避免以领导人的意志和情绪为转移，而且某些处理方法有时互相矛盾，其作用互相抵消。例如，毛泽东一方面指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提倡“和风细雨”，但另一方面他又赞成和欣赏破坏团结、急风暴雨式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其结果违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初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时间过去了 30 多年，回过头来看，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比毛泽东当年提出这个问题时，错综复杂得多。处理得好，可以促进我们事业兴旺发达；处理不好，使矛盾激化，小事会变成大事，甚至酿成乱子。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许多经济关系、利益关系需要调整，会产生不少新的矛盾。我们应当十分重视和认真研究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坚持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思想，克服其历史局限性，探讨新的处理方法，依据有关政策和法律规定，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争取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特别要防止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侵犯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虽然指出了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两对矛盾表现的具体形态，没有真正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办法——发展生

产力，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邓小平说：关于基本矛盾，还是按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①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

# 第七章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与毛泽东哲学的曲折发展

1957年至1966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又犯了“大跃进”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作为这一过程在理论上的反映的毛泽东哲学，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说明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但也存在一些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有的则是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辨析。

## 第一节 经济建设上的主观主义错误与毛泽东的初步反思

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虽然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但在工作安排上仍然强调要搞经济建设，搞技术革命，因而开展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更由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从中央到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急躁情绪，因而在实践中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毛泽东首先觉察了这些错误，强调要总结经验教训，并作了初步纠正。

### （一）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的主观主义错误

第一，反复批判“反冒进”，轻率发动“大跃进”。

毛泽东的急躁冒进思想，始于 1955 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高潮，1957 年以后的批判“反冒进”，促成了这一思想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955 年 7 月毛泽东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所谓“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人为地加速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这使毛泽东极为兴奋。他在同年 12 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根据三大改造的进展情况，应该改掉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大约”、“基本上”、“十五年左右”等不定语气，加快速度，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①。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他又说：“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②

在反对“右倾保守”的巨大压力下和加快发展一切事业的号召的驱动下，1956 年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现象，表现为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社员负担过重，国家财政紧张，市场供应不足，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质储备。根据周恩来、陈云的建议，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同时由《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按照这个精神，各地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使工农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

但是“反冒进”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957 年 10 月他在

① 参见《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1955 年 12 月 6 日）。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1955 年 12 月 27 日）。

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这是指导方针上的错误。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又把"反冒进"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他说：不要提"反冒进"了，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气就不得了，那还有什么群众路线？并且警告说："反冒进"，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①。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把冒进和反冒进，当作两条路线问题。他说，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条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那条路线？我看应该采取"冒进"的路线。会上他重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部分按语给大家看，并特意写了一个说明，其中有一段话："我们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可见他是把"反冒进"与国际上的苏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同等看待的，并认为它们都给右派进攻以可乘之机，问题提得相当之高。

在反复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思想，实际上是"大跃进"的思想，是批评"反冒进"的直接产物，它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它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加上宣传上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高速度，因而在实践上产生了许多错误，闹出了许多乱子。总路线提出后，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的发动，也受到苏联赶超理论的影响。1957年11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出席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

---

①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2日)。

的两个代表会议。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苏联要在“今后十五年内赶上并超过美国”的目标，毛泽东受到启发和鼓舞。11月18日，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中国可以赶上和超过英国①。1958年2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来一个全面的大跃进。5月八大二次会议时又改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6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则说：超过英国三年就差不多了，再有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的把握②。这样赶超时间是提前再提前，调子是一个比一个高。强调发展速度，希望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赶超发达国家，这种良好愿望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是否把速度放在科学的基础上。如果不顾国情国力，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度，结果只能是冒进和空想。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1957年冬和1958年春，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代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自带口粮、工具，打破社界、乡界，乃至省界，无偿地到外地兴修水利，以及开展养猪积肥，改良土壤，掀起农业生产高潮，从而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接着是大放小麦、水稻、花生的高产“卫星”，刮起严重的浮夸风。继之而起的全民大炼钢铁，要求1958年生产钢1070万吨，比上年的产量翻一番，于是全国九千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炼钢，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并严重妨碍了农业、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58年冬

① 参见《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

② 参见《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6月21日)。

到1959年春，一些地方因严重缺粮而出现人员浮肿和不正常死亡的问题，“大跃进”陷入失败的境地。

第二，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过渡。

追求所有制的公有化是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一个基本思想。长期以来，毛泽东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一直把重点放在所有制问题上。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看法，即社会主义就是不断地提高公有化程度，只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使生产力不断发展，就能在中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农业合作化以后，高级社的脚跟尚未站稳，他就认为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寻找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组织形式了。对此，他称之为“不断革命”、“趁热打铁”。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958年初，他就提出了关于公社的构想，设想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公社；8月初，当河南、山东在小社并大社，准备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接着召开了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议。于是，人民公社便一哄而起，短短几个月之内，全国农村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一大就是一乡一社，几乡一社甚至一县一社。二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实行高度集中的集体所有制，并且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二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穷富拉平，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的财产、劳力，搞“供给制”，实行“吃饭不要钱”。三是取消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把按劳分配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破除。四是组织上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搞自给自足的封闭形式。可见，这是一种离开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带有空想成分的社会主义模式。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反过来又是便于搞“大跃进”的组织形式，不仅如此，在毛泽东看来，它还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他在赞扬人民公社时曾反复强调“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有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

制的成分”，“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第三，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犯了唯意志论的错误。

由于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反冒进”，从1958年开始，经济工作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蔓延开来，表现为过高估计人的主观力量，勉强去做那些不具备客观条件，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这种唯心主义不仅表现在实际工作中，而且表现在理论宣传上。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群众的劲头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的民族好比原子弹，原子核一打破，热能释放出来，过去做不到的事情，现在能够做到了。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做得到的。同年4月，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又说，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国家，不需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原因“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①。这种单纯从群众的热情出发论证短期内赶超英美资本主义大国的可能性是不科学的，是夸大了精神、意志的作用的表现。这种对精神作用的片面推崇，直接导致了在宣传部门和群众中形成“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极端化的唯意志论倾向。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在报导农业生产大放“卫星”时，强调“这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8月27日《人民日报》竟用通栏标题宣传这一口号。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不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人民群众是否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群

① 《红旗》杂志1958年第1期。

众说得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条件论可以休矣！”据悉，当时毛泽东是支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一口号的。他认为，这个口号可以提，因为它有两重性，就是说，有对的一面，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此，李达曾同毛泽东发生当面争论。李达认为这个口号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没有什么两重性，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①。可见，毛泽东当时在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混乱，陷入了唯心主义。

以上错误，从政治倾向上说是“左”倾错误，从思想根源上说是主观主义错误。

### （二）初步纠“左”的努力与理论上的反思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较快通过调查研究觉察运动中出现尖锐问题的领导者。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就着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某些“左”倾错误，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反思。1958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至12月又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会上毛泽东讲话，指出不要急于提向共产主义过渡。人民公社要整顿，高指标要压低，不要弄虚作假，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也当作迷信破除了。苏联已经41年了，现在还说要12年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急于要过渡。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决议》针对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它不

---

① 见胡乔木1990年12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李达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是全民所有制，更不是共产主义。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两个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针对那种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

但是八届六中全会只解决了人民公社两个外部界限问题，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没有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即仍然实行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仍然认为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因素，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许多人对此并没有认识，加上当时为了完成由高估产而来的高征购任务，又在农村中开展反对“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弄得党和政府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毛泽东从视察中了解到这种情况，1959年二三月间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予以纠正。他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目前我们跟农民关系紧张的原因，不是下面的本位主义，而是上面的平均主义、冒险主义，主要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远了一点，不了解公社的所有制也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公社一成立，就取消了生产队所有制，实行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这样就产生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偿上调；银行把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这种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的思想。这是对农民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是不能允许的。为了纠正这两种倾向，毛泽东提出要调整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方针。他当时讲的“队为基础”，还是生产大队，不是生产小队。这个问题直到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才得到较好的解决。至于

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如何处理，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把原来考虑的旧账一般不算，改为旧账一般要算。他强调指出：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否则，群众不能解怨气，干部也会被毁掉①。

在初步纠“左”的过程中，对“大跃进”指标和生产计划安排，也作了适当的调整。但由于毛泽东当时对错误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完全肯定，这种纠“左”的努力是在保持“左”倾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进行的，因而“大跃进”的指标仍然居高不下，急于过渡的问题仍然得不到彻底解决。

为了从理论上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还发出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要求广大干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实际去研究这些著作，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于我们的经济工作。毛泽东身体力行，除在会上带头宣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外，他还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反思，探讨了一些理论问题。除了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等问题外，还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其基本思想，一是要区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的概念；二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不发达的”与“比较发达的”两个不同的阶段。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新概念，

① 参见《对〈陶鲁茄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报告〉的批示》（1959年3月30日）。

他说："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应当利用商品来团结几亿农民"。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再一次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一系列的阶段，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这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几个阶段。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产品都极为丰富和人们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这个设想，是对1958年出现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反思的结果。他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创见，可以说是我们党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为了从思想路线上纠"左"，毛泽东还提倡实事求是，反对讲假话，要讲真话，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头脑要冷又要热，这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要跌斤斗，这些人应该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①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瞎指挥等不良作风，向各级干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9页。

一定不可讲。"[①] 1960年底，毛泽东又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 第二节 在总结经验教训中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若干问题，作了新的阐发，其中有许多精辟的思想，但有的正确的命题中又隐藏着某些不正确的因素，留下了某种"左"的痕迹，需要我们作科学的辨析。

### （一）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范畴

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一再提到自由与必然的问题。1959年4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曾给各级领导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我们要逐步认识办农业、办工业的客观必然性，争取多一点的自由。1960年6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十年总结》的讲话，又说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逐渐地认识它。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中心思想就是说明，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1964年12月他在修改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又增写了关于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的一段话。1965年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又一次提到自由与必然的范畴。概括起来说，上述思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了马克思主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2页。

义哲学关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原理。

第一，对自由的含义作了科学的规定。

毛泽东认为，自由首先是对必然的认识。他说："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①] 人们在认识客观必然性之前，只能是必然性的奴隶；认识了必然性，利用对于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己，就获得了自由。所以自由是建立在对必然性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离开对必然的认识，就没有自由可言。但是这还不够，自由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因为必然性作为客观事物的规律，只有通过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才能被认识；这种认识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可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不可分的，丢掉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全面理解自由。所以毛泽东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②] 这个对自由含义的规定，强调了改造世界的实践在获得自由中的意义和作用，继承和深化了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关系的思想。

第二，论述了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教训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中的作用。

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和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33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33 页。

些的人了。"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才有了自由。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没有充分的经验，就不可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也要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它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自由。1965 年，毛泽东在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一个批注中说："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② 所有这些都说明，失败、错误在获得自由的过程中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第三，由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毛泽东指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整个人类的认识来说，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③ 这就是说，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36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6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5 页。

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① 必然向自由转化的无限性，要求我们坚持自由和必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每一代人只能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认识必然，改造世界，争取一定限度的自由，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的自由。另一方面，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一个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的连续发展的过程。任何一个人、一代人取得的自由都是整个人类自由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既是前人自由的直接继承和必然发展，又是后人将要取得的自由的必要准备和新的起点。因此，人类要不断地获得和保持自由，就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 （二）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问题

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所写的前言中写了一段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文字，这就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对建国以来，特别是 1958 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哲学概括，也是对当时理论界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讨论的科学总结，其中心思想是讲在实践的基础上物质怎样变精神，精神怎样变物质。它发展了《实践论》中有关思想。

第一，对认识路线问题作了积极探索。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刻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毛泽东进一步概括哲学上的认识路线提供了依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一开头就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6 页。

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①] 这里，主张人的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主张人的思想"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主张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认识路线问题的精辟概括，为我们判定认识论上的哲学派别提供了正确的标准，深化了列宁提出的"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认识路线的思想。

这里，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他重申这个论断是以《前十条》的制定过程为例的。他在这个文件的前言中说，这个文件是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文件，而这个文件是经过建国以来十三年的实践，特别是近三年的实践，即从 1960 年 11 月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整社工作十二条）起，中间经过 1961 年 3 月提出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1962 年 2 月《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9 月《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公布《六十条》修正草案，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毛泽东自认为《前十条》是"正确思想"，其实里面包含着许多"左"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第二，进一步阐明了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重要的实践。关于实践的形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已有所论述，那里，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说得比较具体，对于科学实验只是一般提及。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并列为三大革命实践，认为它们是正确认识的来源，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39 页。

大革命运动”[1]。应当指出，阶级斗争只是阶级社会的基本实践活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继续把它作为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不合适的；但把科学实验作为基本实践之一，则是有远见的和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重视科学实验，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杨振宁教授认为，毛泽东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基本实践，看得很远，不仅看到现在，而且看到社会的将来[2]。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把“科学实验”引入“实践”之中，这不仅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认识方法放在辩证法唯物论中的一个正确的位置上，而且把科学家的活动放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把科学家的活动提高到与变革现实同等的位置上。特别是后一点，在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各国中，具有给科学家的作用、地位以明确保证的意义[3]。

第三，对认识过程作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新概括。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作过较多的阐述。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他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经验，并总结了我国哲学界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把认识发展过程概括为“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并且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这样就把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思想用通俗而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了，进一步突出和发挥了认识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思想。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在承认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的

---

① 毛泽东在写《前十条》的同时，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的批语。

② 参看1978年9月10日《光明日报》文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

③ 参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译文：《实践和“实验”》。

前提下，着重阐明认识过程中物质和精神的相互转化问题，即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可以转化为人的主观认识的内容，人们在认识了客观规律之后又可以能动地改造世界，而这种转化是以实践为基础，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实现的。这也就是说，思维和存在是有同一性的。说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到达存在的彼岸，那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毛泽东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当时很多人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怪问题：物质变精神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不好理解，难道精神可以变成石头吗？1964 年 8 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回答道：第一个《十条》前面的序言是我写的，意思是说，认识事物是不容易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客观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来可不容易啦，要经过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有人说难道精神可以变石头吗？其实，精神是可以变石头的。譬如，大理石有许多种，有自然的大理石，有人造的大理石。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很多不是山里的，是人造的。人为什么能造大理石？因为理解了大理石的化学构成。什么叫大理石？就是石灰石，即碳酸钙，认识了这个化学构成，人就可以造石灰石，精神就可以变石头①。同样的道理和例子恩格斯举过不少。所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没有什么奇怪的。

在阐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认识的反复性。《实践论》虽然也讲到人们不可能一次完成对一个事物的认识，只有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但它的侧重点是讲整个人类的认识运动是无穷的，要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前进。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则特别强调，即使是对一个事物的正确认识，也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这样多次的

① 参见 1964 年 8 月 20 日同李雪峰等同志的谈话。

反复才能够完成。这样就揭示了认识的辩证性和历史性，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同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区分开来。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对认识过程的一种通俗、形象的说法，不懂哲学的人常常对它产生误解：以为“物质变精神”，就是物质精神化了，物质本身不存在了；“精神变物质”，就是想什么有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对实际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应当把实际应用上的错误和理论本身是否正确区分开来。

第四，进一步发挥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思想。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他又指出，检验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①。这样就使实践标准的思想更加鲜明、准确。

毛泽东在论述实践标准的过程中，还提出了在社会斗争中有时出现暂时的失败并不能证明思想不正确的新论点。他指出，看一个认识是否正确，要看根据这种认识去实践能否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② 这一论断，发挥了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原理。一方面，它指出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及其某些社会原因，告诉我们，先进势力在

---

① 与此同时，即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时，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实践中某些暂时的失败，不能立即证明它的思想不正确，所以要坚持实践标准的辩证法，不要简单化。另一方面，它又告诉我们，不要因为实践标准具有相对性而怀疑它的绝对性。正确思想终究要为实践所证实，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这对于在正确思想指导下进行革命实践的先进势力，特别是在力量对比上暂时不如反动势力的先进势力，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但是，我以为，这一论断也有些不够完备、不够精确之处，弄得不好，可以拿来为错误作辩护。因为它没有准确说明这里所说的先进阶级的思想究竟是指什么？是普遍性的认识，还是行动方案？是总的指导原则，还是具体细节？这些问题不明确就容易发生误解，以为实践中失败了也不能证明主观认识上有任何错误。事实上，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在社会斗争中的挫折和失败，固然往往受力量对比的影响，但任何挫折和失败，总是可以从主观认识上找出某些错误来的。普遍性的认识，总的指导原则没有错，但行动方案、细节问题认识错了，也会导致失败。所以，要对失败的原因作具体分析，搞清楚普遍性认识、总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案、具体细节的区别和联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最后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是对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农村工作中“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有所觉察，并努力纠正，但在全局上仍坚持“左”的指导思想，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错误有所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写的。因此他认为《前十条》是经过建国十三年，特别是近三年的实践所获得的“正确思想”。他在《前十条》中提出要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继续解决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抓阶级斗争，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弄得不好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要改变颜色。他提出要重新组织革命的

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两方面的认识，他都认为是“正确思想”。这显然是非常矛盾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种矛盾状况的产物。从抽象的哲学理论来说，它是对的，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从它的历史背景和所概括的事实来看，又是不正确的，带有“左”的印记。我们考察和评价这篇文章时应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

### （三）关于认识主体和认识工具问题

关于认识主体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中都曾有过论述。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又一次明确地、具体地谈到这个问题。于光远问：哲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而在人类社会中，认识的主体往往是集体，这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对？毛泽东回答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还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有了认识，了解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党也是一个认识主体。毛泽东关于认识主体不仅指个人，更主要地是指集体的思想，对于我们划清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同旧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界限，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过程、认识方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原因之一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出新的认识手段、认识工具，从而推动认识的发展。1964年他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谈到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的认识作用时，于光远问：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具”这个概念？毛泽东回答说：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在“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

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人手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毛泽东的话告诉我们，要想变革环境，改造世界，不能不使用工具，而改造世界的工具就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认识工具的改造和创造，大大地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地扩展着人们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工具是人类认识水平的尺度，它凝结着人类的集体智慧，是认识的社会性的集中表现。毛泽东提出认识工具的问题，对于认识论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只有认真研究认识工具的问题，才能更好地说明人类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能动性和社会性，才能说明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有力地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和直观的反映论。把认识工具问题引入认识论，将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开创新的局面。

### （四）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问题

本世纪以来，随着高能物理学的发展，物质结构理论有了重大突破。人们首先发现原子由电子和原子核组成，接着又发现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同时还发现了作为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的光子。这样就揭露了物质结构的一个新层次，即电子、质子、中子等粒子，它们被看作是组成各种物质的基本单位，因此称为“基本”粒子。这样，自然科学的发展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基本”粒子是不是永远不变的、不能再分了的“物质始原”？人类是不是已经穷尽了对物质结构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把“基本”粒子的研究和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发展的规划会议。会上，毛泽东问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钱三强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新的认识，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还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毛泽

东听后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实，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半年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子"，一年以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证实了毛泽东的正确预见。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又说："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①

1964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谈话，特别谈到《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日本学者坂田昌一写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文章，赞赏坂田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他说：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以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

① 《党内团结的辩证法》(1957年11月18日)。

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①

8 月 24 日，在北京，毛泽东又找于光远、周培源到中南海他的卧室谈坂田的文章，反复阐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思想，认为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下去。宇宙从大的方面讲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讲也是无限的。

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这一思想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把对立统一的观点贯彻到底，它从物质结构的内部矛盾性出发，着重说明微观物质结构的内部矛盾性，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从实践上说，它给高能物理学的研究以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我国物理学家在"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指导下，于 1955—1966 年间提出了关于物质结构的"层子模型"理论，认为"基本"粒子是由物质更深一个层次的"层子"所组成。"层子模型"理论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在这前后，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夸克"大致相当于"层子"。从那时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毛泽东逝世后，1977 年在夏威夷开了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美国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在追述了物理学家如同剥葱一样逐层深入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之后，说了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② 这不只是对基本粒子命名的一个具体建议，而且表明哲

① 转引自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102—103 页。

② 参看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106 页。

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表明毛泽东哲学的深远影响。

对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的评价，有两点是要特别注意的：一是对这一思想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理解；二是哲学上的一分为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对物质结构的具体研究。物质无限可分的涵义是说物质的层次结构的不可穷尽性，辩证的理解是，可分是绝对的；而分的内容、形式则是相对的、多样的，绝不能把物质可分性等同于物质量的分割。用“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举例说明，容易引起误解。“一尺之棰”如果用机械的方法“日取其半”，分割到一定限度，其性质就起变化了，就不再是“棰”了。因此，对物质无限可分的问题，不能仅仅从量的方面去理解，还要看到其质的变化，在物质分割的每一个新的关节点上，要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去探究未知的“分”的新性质、新形式、新规律，不能把某种已知的刻板的公式强加于客观事物。哲学上的“一分为二”，只是提供一种方法论，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实验，物质结构的具体形式问题，应该由自然科学的实践去解决。

### （五）关于部分质变问题

关于部分质变的思想，本世纪30年代苏联和中国学者已经提出，但都未展开论述，此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虽然没有直接讲部分质变问题，但他关于事物发展阶段性的论述，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结合国内国际的革命实践又多次提出并论述了这一问题。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首次提出“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概念。他说：“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① 1959年12月至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5页。

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证了部分质变的原理。但其出发点是不同意教科书中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提法，认为那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凝固化的观点。他说：

“‘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呢？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

接着他举了许多例子加以论证。在自然界方面，他举蚕为例，认为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过程可看作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新的质，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它的整个发展过程显然不只是量变，而且有部分质变。拿人本身来说，毛泽东认为，人从生到死，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在死之前，是一个量变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人死是最后的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不断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毛泽东还举合作化为例，认为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毛泽东在分析了这些例子后指出：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中有量变，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如果没有部分质变，没有大量的量变，最后的质变是不能到来的。”

这就是说，毛泽东是从量变和质变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上，从量变和质变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上去说明部分质变原理的普遍性的。

毛泽东在论证部分质变原理的普遍性时，实际上也探讨了部分质变的形式问题。概括起来说，部分质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局部性的部分质变，一种是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指的是事物的全局性质未变，而组成全局的局部发生了性质的变化。他举例说，打垮蒋介石军队，建立全国政权，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和部分质变来完成的。例如，要三年半的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间就包含着部分质变。一部分一部分地推翻反动政权，一块一块地建立革命根据地政权，这对全国来说，是量变过程，但从一个局部来说，则是部分质变。正是通过这种部分质变的积累，最后实现全国政权的质变。部分质变的另一种形式是阶段性部分质变。它指的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变，而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举例说，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他还说，集体所有制一定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一定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要死亡，共产主义社会也可能要经过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这里也有质变或部分质变。

毛泽东关于部分质变论的这些阐述，把早在30年代中已经提出但未引起哲学界普遍重视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并用自然界、人类社会的一些常见的、通俗的例子说明了它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论证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从而丰富和深化了质量互变规律，并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理提供了哲学上的根据。

但是，毛泽东关于部分质变这一理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它的普遍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二是对部分质变和根本质变的

界限和区别没有说得很清楚，容易发生混淆；三是毛泽东重申这一理论时，其批判锋芒不是指向“急于过渡”的思想，而是反对“彻底巩固”。他在批评了苏联教科书所谓“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之后，一再反问：难道我们能让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远地“彻底巩固”下去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的么？这种批评和反问是有片面性的，它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对立起来了。“彻底巩固论”固然不对，但不能由此而否认一定时期内事物质的相对稳定性。当时中国的问题就是要相对稳定高级社，发挥它的优越性，而不是急于搞所有制的变革，提高公有化的程度，更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取消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但毛泽东的想法不是这样，他的侧重点是强调“不断革命”，强调通过不断的“部分质变”来实现社会的根本质变，因而这一理论仍然带有“左”的思想痕迹，这是我们在评价这一理论时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问题。

### （六）关于辩证法的核心规律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哲学上讲辩证法，完全按斯大林的说法，只讲“四大特征”，把辩证法的规律、范畴平列起来，忽视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上一章我们已经提到，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对立统一学说是辩证法的核心，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加以解释和发挥。同年 2 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重申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要求人们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1963 年 12 月，他在一个文件中说：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思想、辩证分析方法①。

1965年，毛泽东在李达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写的一个批语对上述思想作了概括和提升，提出了辩证法规律一元化的思想。他写道：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②

在毛泽东看来，唯物辩证法的三个规律是不能并列的，对立统一规律是核心规律，其他规律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和展开。理由是：

首先，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理解联系和发展的钥匙。毛泽东认为，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就是说事物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只有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形成矛盾才有联系。一事物的内部联系如此，一事物与他事物的联系也是如此。发展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的结果。离开对立统一规律，就不能说明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过程和方向，即事物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

---

①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3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5—507页。

其次，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和展开。毛泽东认为，质和量是对立的统一；量变和质变也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他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即相对地静止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状态，相对静止状态就是量变，显著变动状态就是质变，而量变和质变都是事物内部包含着的两个矛盾的因素的相互斗争引起的。因此，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量变和质变的根据，离开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就得不到说明和解释。

对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毛泽东虽然多次用过“否定之否定”这个概念，但他最后还是倾向于用“肯定否定”来取代它，以便使这一规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同时更能体现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不是60年代突然提出来的，而是他在延安时期就逐渐形成了。1939年5月他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说：“每一过程对下一过程言是肯定，对上一过程言是否定，对再上一过程言是否定之否定。说一过程内部有质变三阶段是不对的。”① 他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其内容就是事物内部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及其互相转化。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相继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60年代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又重申这一观点，他说：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②。由于肯定和否定两个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使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由肯定转化为否定，这就是事物的新陈代谢，即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可见，对立统一规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3—384页。

② 参见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

律在这里起了支配的作用。

最后，唯物辩证法其他一系列成对范畴，如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必然和自由、可能性和现实性等等，毛泽东认为，也应"以事物的矛盾即对立统一去说明"。他举例说，什么叫本质？本质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决定的。因为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组成事物的各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与该事物固有的特殊矛盾有关。简单的事物的本质，由主要的矛盾方面决定；复杂的事物的本质，由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决定。其他范畴也应用对立统一去说明。

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规律，不同意把辩证法三个规律平行并列的观点，这是对斯大林形而上学思想的批评，对马克思和列宁辩证法思想的恢复，同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这对于掌握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于改造哲学体系，对于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都有重要意义。

但毛泽东在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时，有贬低或否定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倾向。上述批注，把这两个规律同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范畴同等看待，就是证明。60年代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多次说过：恩格斯讲辩证法有三个范畴：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我就不相信后两个范畴。三个范畴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只有肯定否定。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①。这些尽管是即席谈话，不象文字表达那么准确、完整，但仍然由此可看出他的基本思路。我以为，这里关于"三元论"的批评，是不尽恰当的。因为承认三大规律，仍然可以对它们作出统一的解释。说辩证法只有一个规律，这是把辩证法简单化了，抹煞了辩证法活生生的、

① 参见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

多方面的内容。辩证法应该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因而这种规律就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正是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趋势和环节。它们虽然不能并列，但也不能互相代替、互相排斥，而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强调其中的一个而否定其他的做法，我以为是偏颇的。这样做，只能使活生生的、内容丰富的辩证法变成干瘪的僵死的形而上学。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如只讲“跃进”、“过渡”，不讲相对稳定、量的积累；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只讲破，不讲立；把螺旋式发展看成是“复旧”、“倒退”；如此等等，这与在辩证法理论上只讲对立统一，不讲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的偏颇，不能不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教训我们应当记取。

### （七）关于分析与综合问题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观点来看分析与综合。1964 年 8 月 18 日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说，分析与综合问题，许多哲学家讲不清楚。分析讲得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几句话；而且现在只讲概念的分析与综合，不讲客观实际的分析与综合。1965 年 12 月 21 日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又谈到分析与综合的问题。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生活实际对这两个范畴作了通俗的生动的说明。

他说，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与综合呢？分析就是分析国共两党的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优劣、利弊、长处和短处，然后加以综合上升为战略战术的东西，指导革命人民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实际上的综合，就是革命力量打败反革命力量，共产党吃掉国民党。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说法就是扬弃。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

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来。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它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两个对立物统一，有一个主导方面，一个被吃掉，这就是综合。综合是质变，不是调和，是新的对立统一代替旧的对立统一。他就是这样来说明分析与综合的，并一再声明：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 （八）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新概括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1958年1月，毛泽东对多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进行新的总结，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为了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他认为要解决工作方法问题（没有认识到路线有错误）。1959年4月，他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又专门讲了工作方法问题，提出了工作方法十六条。这些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都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运用和发挥。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切经过试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切工作都要经过试验或试点，通过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以便少走弯路，避免或减少大的损失。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大胆探索思想的具体运用。

抓两头带中间。毛泽东说，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可以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两个对立面。

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谋的目的是为了善断。不能多谋寡断、有谋无断，也不能少谋武断。现在我们有些人就是少谋武断，根本不同人家商量，不听不同意见。譬

如订经济计划时，不同别人交谈，不去多谋。实践结果行不通，还可能造成虚假现象。

要当机立断。毛泽东说，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公社这个问题很明显，究竟是几级管理，去年没搞清楚。经过一个过程，搞了一些调查研究，才发觉队的所有制。这次会议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留有余地。毛泽东说，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我们有些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

波浪式前进。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不能天天搞高潮，要按照实际情况，可以高些，也可以低些。但不能公开在群众中"反冒进"，反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可见他的工作方法是服务于总路线的。

要善于观察形势。毛泽东说，脑子不能僵化，要注意观察形势，观察动态，了解情况。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势、嗅一嗅经济形势。所谓了解政治形势，就是观察各阶级的思想，观察他们的立场变化。北戴河会议时，指标订得很高，我注意观察和思考。后来我走到河北、山东，感到不行。六中全会决定把指标降低，上海会议又压了一下，一步步落实。

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毛泽东说，多数的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有时候又是少数人胜过多数人。就是说，有时候真理不在多数人这边，而在少数人或个别人这边。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马克思一个人手里。你们看过联共党史，有一次会议，大家都举手了，就是列宁一个人不举手。列宁未举手是真理，其他人都不对。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

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和个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敢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有点痛苦，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有些同志不把自己的话讲出来，中庸之道太多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有些同志深怕对自己不利，这就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领导干部对极少数人的意见，不要顶回去，要看看里边有没有真理。

要解放思想。毛泽东说，不要怕鬼，不要扭扭捏捏，要有骨有肉。有些同志中间空气不健康，前怕狼，后怕虎，思想没解放，怕挨整。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不要怕穿小鞋，怕失掉选票。就是杀头也好么，你是为了国家，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嘛。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与人通气，解除封锁，历史地观察问题，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等等。

## 第三节 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左”倾错误的发展与毛泽东历史观上的失误

经济领域的纠“左”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很不彻底，未能从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而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还有发展。这些错误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历史观上的思想演化和失误。

### （一）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左”倾错误的发展

1957 年在共产党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开展反右派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个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

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展到党内。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开始的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的运动又增加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 （二）毛泽东历史观上的失误

#### 1. 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

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是一步一步升级的。历史地考察，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提出所谓“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

在反右派期间，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他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

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什么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呢？毛泽东认为，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对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彻底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不只是一次，而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对中间派说的，就是要他们在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自己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这个中间派，除一部分知识分子外，还包括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农村中的富裕中农，他们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改造，也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毛泽东说："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说，采取"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他说：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即"四大"的形式。这种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①

由此可见，所谓"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从其对象、内容，还是形式来说，都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因为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是被严重扩大化了的，它不构成一个阶级力量；至于把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同工商业者相提并论，都看成中间派，都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是错误的；用"四大"的方法来解决一切问题，势

①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必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实践上只会造成混乱。把两条道路斗争作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并规定为“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这里包含了双重的错误：一是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后已基本上解决了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又重新提了出来。二是人为地延长了“过渡时期”。按照列宁和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最先是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作为过渡时期的，过渡时期的任务是“一化三改”。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三大改造提前于1956年完成，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国家工业化尚未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宣布过渡时期结束，而把继续完成国家工业化转列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任务。但毛泽东不是这样看。他认为，阶级斗争还存在，并且很尖锐；国家工业化任务又没有实现，因此还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去解决谁战胜谁和工业化的问题，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走完过渡时期。后来，他干脆把过渡时期说成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①，甚至“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②。既然现在是过渡时期，那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就顺理成章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里的错误，是用阶级斗争的有无去规定过渡时期的长短；反过来，又用过渡时期的起止去规定阶级斗争的有无，只要存在阶级斗争，过渡时期就没有结束。

第二个步骤是重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本改变八大的决议。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多次论及，这里不再重复。

第三个步骤是提出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新论点。

这个新论点是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在4月

①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见1962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②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6月14日）。

汉口会议上加以论述，而为八大二次会议所接受的。1958 年 3 月 26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即地、富、反、坏、右。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同年 4 月 6 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又说，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形势怎样？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成都会议说过，我国有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30 万右派分子也包括进去。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农村富裕中农也包括在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是剥削者，与前一个剥削阶级不同，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第一个剥削阶级。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一定要估计到反复，估计到是否还有什么大问题①。5 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接受了毛泽东的论点。

“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包含着极其严重的理论错误和不良后果。

首先，所谓“第一个剥削阶级”，是把建国之初已经消灭了的官僚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说成还存在，把残余分子“还原”为一个剥削阶级，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右派分子”不占有生产资料，根本不是一个阶级，更谈不上剥削，把他们列入第一个剥削阶级，并认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也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何况右派分子中绝大部分是被错划的，即使后来经复查不予改变的个别人，也要承认他们过去同中国共产党有过合作，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历史，不

① 参见 1958 年 4 月 6 日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能一概抹杀，不能把他们说成是蒋介石的代理人。把帝、官、封残余与右派合在一起，人为地组成一个剥削阶级，也是不正确的。

其次，所谓“第二个剥削阶级”也是不能成立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三大改造之后已基本消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虽然在一定时间内他们还拿定息，但由于交出了企业，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失去了剥削工人的手段和奴役工人的条件，作为完整的阶级已不复存在了。把广大知识分子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根本错误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分决定，其本人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式决定。当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时，如当教员、编辑、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工程技术人员时，他们是脑力劳动者；私人企业中的资方代理人则不属于这个范围。所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内涵，只包括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本人和一部分资本家代理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本来就是脑力劳动者。1956 年 1 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①反右派以后，毛泽东说，我们给知识分子戴了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②。现在又进一步把他们说成是“第二个剥削阶级”的组成部分，完全是一种倒退，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把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也看成是资产阶级，是第二个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同样是错误的。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一般是指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他们同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富裕中农是劳动者，只有轻微剥削，把它视为资产阶级，视为农村中“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62 页。

② 参见毛泽东 1958 年 4 月 6 日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主要力量，这也是错误的。对富裕中农的这种错误认识，对于后来长时间里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四个步骤是提出所谓“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新概念。

毛泽东之所以把右派当作剥削阶级，把知识分子归入资产阶级范畴，从理论上说，就是他违反了列宁的阶级定义，主张用政治思想标准来划分阶级。1958 年 11 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消灭阶级的问题时说：“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中才发现的。”[①] 这实际上是提出一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新标准。

有了这个新标准，“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就不难解释了：地主买办阶级虽然早在建国初期就被推翻了，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妄想复辟；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交出了工厂、企业，但还靠定息过着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政党民主党派还在代表他们；上层小资产阶级虽然生产资料不多，但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他们的世界观还是旧的；富裕中农虽然是农民的一部分，但他们发财之心不死，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所依附的旧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但他们还没有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从他们的出身，他们过去受的教育来看，从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上看，他们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严重地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的定义和以经济关系特别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阶级归结为政治思想范畴，这样就使阶级划分标准失去了客观性，变成主观地任意的使用的东西，通过这一误区，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

① 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 21 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第五个步骤是作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反映”的论断。

这一论断是上述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1959 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期间，毛泽东除了多次讲话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批示。8 月 16 日他在《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写道：

>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
>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①

8 月 11 日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长篇讲话中，谈到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时说，犯错误的同志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还是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资格参加党的，是党的同路人。8 月 16 日的讲话中又说：彭德怀等人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参

① 《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 年 8 月 16 日)。

加党的，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消灭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相当一部分人受不了，富裕阶层、城市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内外的）、资产阶级都受不了，不愿革自己的命。合作化、公社化也有人不高兴，过不了社会主义关。

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又进一步升级了，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认为阶级斗争必定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内不存在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因而不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党内虽然有时也有阶级斗争的反映，但属于这种性质的矛盾在党内只是一小部分，党内经常出现的大量的矛盾是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的矛盾，党内斗争并不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的发言和意见是党内正常的批评建议，又基本上是正确的，把它说成是“反党”，是阶级斗争，甚至是两大对抗阶级生存搏斗的继续，这就犯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共产党内和它的领导层中来的错误。

其次，用矛盾和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来论证阶级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因而使这种错误具有理论色彩和“哲学根据”。然而矛盾和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不等于阶级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阶级斗争产生、存在是有条件的，用矛盾和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来论证阶级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是犯了主观地、抽象地运用辩证法，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公式到处乱套的错误。只讲斗争，不讲统一，是形而上学而不是辩证法，把共产党的哲学归结为“斗争哲学”，是片面的。

再次，这里还提出了共产党内有“资产阶级革命派”、“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的新论点，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斗争的矛头将越来越指向党内领导层。这就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从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以及“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开了先河，影响至

深且巨。

最后一个步骤是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把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推向极端。

1963年至1965年间我国农村和少数城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社教运动中写了一系列批示。1964年12月12日，他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和农机部关于社教工作的报告上的批示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他说：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况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①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②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发表了会议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

① 1964年12月12日关于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
② 1964年12月12日关于农机部关于社教工作报告的批示。

“左”的观点。会上毛泽东讲话，强调要整“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通不过。不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的当权派。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找到了问题，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①。《纪要》还特别解释了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把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工作作风问题、企业管理问题同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混为一谈，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之所以发生这种错误，一是夸大了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夸大了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确实是一个值得严重警惕的问题。但它在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不是主流，而毛泽东却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官僚主义者已经形成了一个“阶级”。再就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存在片面看法，把管理者建立起来的管理权威混同于官僚主义，把厂长、经理的发号施令，视为对工人的“管、卡、压”，甚至认为他们与工人是“尖锐对立的阶级”，他们是“吸工人的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革命对象”、“斗争对象”，这显然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再者，即使存在一些“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领导人”，那也只是个别的、少数的，不能称作什么“派”，更不能等同于阶级，认为“走资派”下面有，上面也有，中央各部门都有，这就势必要搞“夺权斗争”，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打倒“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便呼之

---

① 参见1964年12月20日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

即出了。

2.“反修防修”的迷误

中苏矛盾的激化和国际“反修”的迷误，是促使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步步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苏分歧起自苏共二十大。60年代中苏发生激烈争论。苏共提出“三和两全”① 路线，毛泽东认为这表明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走上了“和平演变”的道路，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同时苏联又继续搞大国沙文主义，企图控制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发动了国际上的“反修”斗争。这一斗争对中国国内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用“反修”的观点看国内形势，认为1962年前后，国内出现了“黑暗风”（即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翻案风”、“单干风”，中国也出现了“修正主义”，中国的修正主义有它的国际国内纲领，国际纲领就是“三和一少”②，国内纲领就是“三自一包”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62年八九月，毛泽东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反修防修”的战略方针，即国际上要公开批判“赫

---

① 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

② 1962年2月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向中央提出书面建议：为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党应该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和缓的方针；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我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后被康生别有用心地概括为“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对民族解放运动援助要少。

③ 指允许自留地、自由市场存在，企业自负盈亏；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

鲁晓夫修正主义”；国内要搞“四清”、“五反”、“挖修根”，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防止和平演变。1963 年 9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得很清楚：“我们搞《十条》，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也是给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等都要抓。”

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战略，从其出发点和主观愿望等来说是好的，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但理论上和实践上有许多迷误：

其一是在什么是修正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混乱。50 年代，毛泽东曾经对什么是修正主义的问题作过界定。他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①“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② 这个界定，已经有了某些漏洞，例如，把“右倾机会主义”简单地等同于“修正主义”就有不妥之处，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6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将“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叫做修正主义，甚至把针对某些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及对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所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88 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3 月 12 日)。

进行的反思和改革也当作修正主义，一些本来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如生产力论、按劳分配原则等等，也被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样必然造成极大的混乱。

根据这一扩大化了的“修正主义”概念来观察国际国内问题，就必然产生迷误。赫鲁晓夫提出“三和两全”的路线，是错误的，特别是“全民国家”、“全民党”，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表现出修正主义观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不能忽视国际范围内两种制度、两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已成为客观趋势，这正是当代世界国际阶级斗争的新特点。不研究怎样在“共处”和“竞赛”中既利用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又向它作斗争，而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简单说成是“修正主义”，这也是不对的。“和平过渡”虽然只是一种可能，但也不应把它排除，在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应当允许探索。当时苏联国内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和由此而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也不好断言就是“搞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至于苏联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要中国党跟着它的指挥棒转，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那是理所当然要遭到我们的批判和反对的。事过20年以后，邓小平在总结我们处理兄弟党关系的经验教训时强调要区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个党的国内方针、路线问题；二是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他指出：“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是本国的同志。但是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① 一个党的理论观点是对还是错，也不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 第278—279页。

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用一个固定的公式、含糊不清的“修正主义”概念去硬套，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用他关于“修正主义”的定义看国内问题，首先是把一部分知识分子看作是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接着是把有“右倾”思想的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把彭德怀说成是“中国的修正主义者”。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恐怕以改个名字为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并认为王稼祥的所谓“三和一少”、邓子恢“三自一包”是“中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四清”开始时，他担心下边、基层“出修正主义”，后来则转而认为上边、“中央出修正主义”，出“中国的赫鲁晓夫”，于是把所谓“防修”的视线转向了他的接班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身上。“修正主义”的内容则由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扩展为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方法、不同意见，实践中的改革探索等等，都被看成修正主义。这一失误又是同毛泽东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解分不开的。因为他把“右倾机会主义”等同于“修正主义”，而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作了完全泛化的理解。他曾经说过，“反冒进”是右倾机会主义，“慢”是右倾机会主义，“怕麻烦”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样一来，“修正主义”就成了无所不包的东西了。

其二是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夸大了意识形态问题在防止“和平演变”中的作用。早在50年代后期，毛泽东就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60年代认为反修防变就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笼统地看成是阶级斗争问题，统统扣上“封、资、修”的帽子，进行过火的、错误的批判。他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认为

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① 他甚至认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② 这些估计是不切实际的。文艺领域当时确实存在某些不健康的现象，指出这方面的问题，通过正常的批评和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来解决，是必要的，但毛泽东夸大了这些问题，认为是"封、资、修"泛滥，于是发动了文艺问题上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批判。接着这种批判又扩大到学术界，从经济学到哲学、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都有一批代表人物和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又受到猛烈的批判。他还进一步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这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所作的不切实际的唯心的估量，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依据。同时他又自觉地利用意识形态问题，如文艺、史学问题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经他支持和亲自修改后，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就是最好的说明。《海瑞罢官》是历史剧，是历史、文艺问题，但硬要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关锋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6年2月8日毛泽东在听汇报时又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196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姚文远的文

① 1963年12月14日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

② 1964年5月8日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

章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他说：

>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指北京）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①

于是，毛泽东便决定从北京市委开刀，搞“五·一六”通知，制定《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便发生了。

抓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抵制帝国主义的精神侵略和文化渗透，批判确实存在的修正主义思潮，对于防止和平演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能搞“意识形态决定论”，最重要的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样才能坚定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才能有效地抵御和平演变。

其三是培养接班人问题上的失误。毛泽东是最早识破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的革命家，他首先提出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必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的要求。他关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从字面上看也是好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左”的痕迹。他挑选和确定接班人，特别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接班人的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教训非常深刻。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

① 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

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①

3. 个人崇拜问题上的错误

对于个人崇拜，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有一个演变过程。

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是比较注意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盲目迷信权威的。早在进城前夕，即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内做了六条规定，即不做寿、不送礼、不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1953 年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他又重提这六条规定，提醒全党要谦虚。1954 年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他删去了草案中一些颂扬他的条文。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注意这一问题。1956 年 4 月政治局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认为斯大林晚年的严重错误，是由于他“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造成的，并对个人崇拜的性质与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了深刻的分析。在党的八大，邓小平从唯物史观高度阐明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反对个人神化、个人崇拜。

不幸的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接二连三的胜利，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在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思想倒退。转折点是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他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要区分两种个人崇拜，主张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的错误观点。他说：

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 第 305—306 页。

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好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另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①。

毛泽东的这番话，当时是针对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来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发的，尽管他对个人崇拜问题试图作某种区分，但这一观点从总体上看是错误的。因为它把崇拜真理，对英雄人物的崇敬、爱戴与具有特定涵义的“个人崇拜”混淆起来了。“个人崇拜”这一概念，指的是对个人的神化和盲从，它是小生产经济和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是一种腐朽的、落后的观念，是一种非理性的宗教情绪的表征。崇拜真理，尊敬、爱戴英雄人物，本质上是对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是建筑在理性基础上的情感。毛泽东把人们对马克思等杰出人物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崇敬，也说成是“个人崇拜”，完全是混淆了这两种不同概念的确定内涵及其界限。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不能完全否认个人崇拜。这同他以前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即使是群众对领袖发自内心的崇敬与爱戴之情，他是非常注意的，不让它发展成为对领袖的歌功颂德和个人崇拜；现在，即使是个人崇拜，也没有关系，只要是正确的，也应该提倡，不提倡不得了。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说法，实际上是为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难怪当时华东协作区负责人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公开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1959 年庐山会议上个人崇拜进一步发展。7 月 23 日毛泽东在

① 见 1958 年 3 月 10 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的上书言事伤害了毛泽东。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也这样说：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对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的现象，大家却安之若素①。庐山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这实际上是对党，对革命事业的一种破坏力。接着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地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过去我搞这个事情，今后还要搞。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②。这样，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已经蔓延开来，并且得到了合法化。“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而刘少奇恰恰成了个人崇拜的受害者。

① 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73 页。
② 参见上书第 360 页。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重大失误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是他晚年的重要实践。“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其哲学根源是历史唯心论，特别是对“阶级”、“社会革命”作了唯心的理解。除此之外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失误还表现在未能正确处理物质和精神、政治和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个人和群众等一系列问题以及抽象地运用辩证法上。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与过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方面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左”倾错误长期积累并急剧发展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发动到1976年10月结束，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时间，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 （一）“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如前所述，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步步升级和“反修防修”的迷误愈陷愈深的情况下，毛泽东对我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作出了唯心的估量：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篡夺了相当一部分的领导权，一大批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更危险的是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并且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如农村的“四清”，城市的“五反”，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但都不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起来“造反”，“炮打司令部”，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196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博、巴卢库时说：1961 年七千人大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和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公开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了一些问题。过去我们只抓了个别问题、个别人物。此外，还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①。

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 1957 年以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左”倾错误以及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错误长期积累并急剧发展的产物。这三个错误又是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②，即没有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而产生的。1958 年以后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他要建设的是一个“一大二公三纯”的理想的社会主义，方法就是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当党内多数人，特别是领导层不同意他的主张的时候，他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

① 参见 196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

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03 页。

义”，为了扫除这个“障碍”，他便毅然凭借多年来造成的个人崇拜和军队的力量，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①。所以，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时，我们不能不追溯到1961年至1962年，甚至1957年至1959年的历史。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从1957年起主要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②，他又说，“虽然1962年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但思想没有解决问题，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③。国外的研究者如美国的斯图尔特·施拉姆也说：“1966年的事件是毛五年来努力想再次证明其大跃进的政策正确的高潮。”“为什么决定要发动这次运动呢？相当明显，这是为了对付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以利于执行激进的政策。”④

### （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体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事件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毛泽东制定“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支持红卫兵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一月革命”，号召“全面夺权”；反对“二月逆流”；打倒刘少奇；实行“三支两军”，“实现全国一片红”等等。但中心内容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夺权斗争，特点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

---

① 林彪1967年8月9日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军的力量。”

②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

③ 1987年11月11日邓小平和朝鲜总理李根模的谈话。

④ 《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295页。

第二阶段是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的“十大”。这一阶段主要是搞所谓“斗、批、改”，即斗争“走资派”，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教育革命”，等等。毛泽东的意图是希望通过“斗、批、改”来达到所谓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但“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表现，通过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这一阶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林彪事件的发生（九届二中全会上妄图抢班夺权和随后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九·一三”林彪阴谋败露，仓皇出逃，摔死温多尔汗，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1973年8月召开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没有正确总结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第三阶段是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这一阶段里，肯定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篡权和反篡权的斗争尖锐复杂。突出的事件是“批林批孔”，邓小平复出进行全面整顿，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

从以上关于“文化大革命”过程的简略分析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它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发动这场所谓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因而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不是任何

意义的社会进步，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 第二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实质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 1957 年以后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推向极端的结果，其主要论点体现在《五·一六通知》和“九大”政治报告等文件中。这个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还要继续夺权。

###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和它的主要内容

这个理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长期以来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积累的结果，直接的起因则是 1976 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经验总结”，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夺权斗争”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夺权的理论而提出来的。1967 年 1 月上海“造反派”先夺了《文汇报》的权，接着夺了上海市委的权。1 月 9 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给予高度评价，说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①。1 月 23 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取。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

① 参见 1967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

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1967年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五·一六通知》的公开发表撰写编辑部文章。文章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文件，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问题，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等问题。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正式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概念，并将这个理论的内容概括为六个要点：

（1）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划分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这种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

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注意识破他们，批判他们，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5)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这篇文章是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并经他们反复修改过的。在公开发表之前，他们曾报送毛泽东审阅，并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了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充分引用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批改。”毛泽东审阅后批道：“内件已阅，修改得很好，可用。”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概念，虽然不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但毕竟是他认可了的；关于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虽然不是毛泽东自己的概括，但确实是他论述过的思想，是经他看过、同意过的。因此，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表述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思想，应该说是合适的、恰当的。

###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实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因而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即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种观点既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

剩下的只是阶级的残余，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可能激化。无产阶级政党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但是必须看到，这种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的情况有根本的不同，它不同于以前那种完整的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阶级斗争的残余形态，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并且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可以运用政权和法律的力量去解决，没有理由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发生错误，理论上的原因是对“阶级”、“革命”的概念作了主观的任意的理解和使用。“阶级”问题我们已在上一章中作过论述，这里只对“革命”的含义作一些分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它的原义，一是它的转义，必须把这两种含义明确地区分开来，才能澄清围绕“革命”问题而发生的思想混乱。什么是革命的原义呢？革命的原义就是政治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说过：“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① 列宁指出：“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② 毛泽东自己也说过：“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③ 这就是说，革命的原义，就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的前提是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的对抗，目的是夺取政权，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页。

的激进的暴烈行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已不存在这种政治革命的前提，不需要这种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和继续夺权。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强调要进行这样的政治革命，这就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剥削阶级专政的社会历史条件混为一谈。所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而“革命”又在它的原义上使用，这本身在理论上、逻辑上就是荒谬的，在实践上造成了自己乱了自己的灾难。

当然，“革命”还有它的转义、引申的意义。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重大的社会差别等等，都是革命，但这是革命的转义、引申的含义，不能与它的原义混淆使用。我们坚决纠正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但这绝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继续进行上述各方面的革命斗争了。然而这种革命斗争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它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完成，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无论在革命的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与过去根本不同。不注意这种区别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第二，党内斗争并不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大多数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有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不都是所谓“路线斗争”。党内确实存在某些阴暗面，存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和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也可能有个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但不构成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不存在什么“党内资产阶级”。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

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

第三，所谓“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提法，也完全是错误的，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据说“全面的专政”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陈伯达、姚文元加上去的。我们就不说“全面专政”，而说“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吧，这也是说不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专政”是一种强制手段，通常指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在政治斗争中为解决敌我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极端手段。列宁说：“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① 谁对谁实行专政，这只能是政治领域里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把专政手段移用到思想文化领域，那就大错特错了。思想文化领域中，不存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只能用批判的武器，不能用“武器的批判”；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力压人。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② 正因为有所谓“在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提法，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某种观点、某部作品、某一出戏、某部影片，一旦被认为有问题，就往往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或这些作品的作者都当作敌人，当作革命的对象，而对他们实行专政。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

第四，把“斗私、批修”作为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也是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左”倾错误的表现。意识形态领域有敌对阶级的思想体系，但大量的是不带阶级斗争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情况比较复杂。把“百家”归结为“两

---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83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91 页。

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一家是"公"字，一家是"私"字，一家姓"马"，一家姓"修"，其结果必然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犯简单化的错误。特别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对于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什么是正当的个人利益，什么是平均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等等，都分不清楚，搞起"斗私、批修"来，只能是否定一切，只能是一场混战。再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总不能把对共产党员、先进分子的要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等等）拿来要求广大群众。

至于六个要点中的其他问题，如"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 第三节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哲学根源

这里讲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指"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也包括"大跃进"的错误，其哲学根源前面已有所涉及，这里作一综合性的分析、总结。

### （一）否认客观规律性、夸大精神作用的唯意志论

毛泽东本来是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主张实事求是的。但50年代后半期以后，由于接二连三的胜利，开始头脑发热，骄傲起来，逐渐离开了唯物论，走向了唯意志论，表现在物质和精神、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经济和政治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片面性，夸大了精神、意志、政治等主观因素的作用。"大跃进"中片面强调"冲天干劲"，赞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错误，前面已有所分析，这里不再重复。问题是"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一度头脑有所清醒，承认违反客观规律会碰得头破血流，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但后来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1960年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四个第

一"①的口号，并且说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对这种藐视辩证法，而实际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万能论"，毛泽东却大加赞扬。1963年12月他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后来他又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②。1965年他又大讲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统帅军事、统帅经济的"，否认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这个唯物主义观点，批判所谓不相信"突出政治"的"折中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更是有所发展。他相信凭借他个人的意志、威望可以发动这场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当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公开批判"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诬蔑这种说法"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时，他居然默认首肯③。1970年10月"批陈整风"时虽然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的"天才论"，指出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但又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论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种把思想政治路线提到"决定一切"的高度，而把客观条件、物质基础、经济因素、组织程度等等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是违反唯物论基本原则的。至于"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和不顾一切、一意孤行，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① 所谓"四个第一"即在处理武器和人的关系时，人的因素第一；在处理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时，政治工作第一；在处理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关系时，思想工作第一；在处理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时，活的思想第一。

② 1965年2月22日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人员时的指示。

③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经过毛泽东的审阅、修改。

底"的决心，都明显地表现出他的唯意志论倾向来。

（二）提倡"斗争哲学"，抽象地运用辩证法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探讨辩证法的规律的时候，根据列宁的思想，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规律，对辩证法作了说明和发挥，这是应当肯定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又表现出简单化、绝对化的片面性。他只讲对立统一规律，不承认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样就限制了辩证法"活生生的、多方面的"内容，否认了对事物发展的状态和道路、趋势和环节的具体说明，影响到实际工作中，只讲"过渡"、"跃进"，不讲相对稳定，只讲批判，不讲继承等等现象的时常发生。

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上，毛泽东曾尖锐地批判过斯大林只讲斗争，不讲同一的形而上学，但后来他自己却犯了同样的错误。从50年代末起，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神圣化，否认矛盾同一性的作用，否定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的调和和合作的可能，并把这种观点同阶级斗争问题联系起来。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公开宣称：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所以"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调和的矛盾呢？1964年批判杨献珍的时候，只准讲"一分为二"，不准讲"合二而一"，认为"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并把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对立面一方消灭一方，一方"吃掉"一方普遍化。1965年则作出结论："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①。"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造反有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甚至发出不加任何论证的空泛之论："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口，不斗行么？"……这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5—506页。

种“斗争哲学”是完全违反辩证法的。恩格斯早就说过：在自然界里只看到和谐和只看到斗争，“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但是那里确实存在着某种“和谐和合作”的情况，“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社会历史领域也是这样，“想把历史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①

在破和立、治和乱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是带有极大的片面性。他在“五·一六”通知中强调“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1966年7月6日他在武汉致江青的信中，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这种不断斗争，“天下大乱”的哲学，使得整个社会经常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一刻也不能安宁。

在辩证法的运用上，毛泽东晚年也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特别是不加分析地把矛盾的普遍性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普遍性等同起来，从“斗争哲学”出发，演绎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例如，1962年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从一分为二是个普遍现象，推论出我们党也是一分为二的，分为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1964年他在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中，从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完全的纯是没有的，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推论出我们党也是不纯的，历史上没有哪一年纯过，现在也会不纯，也可能冒出修正主义来。1965年他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中央会出修正主义吗？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966年就断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他去世前的1975年至1976年的多次谈话中还说：矛盾是永远地普遍地存在，政治斗争和革命就一定会有的，不可能没有。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2页。

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是还要革命的。总有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可见，主观地抽象地运用辩证法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根源，所以难怪陈伯达、姚文元把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和六个要点之一了。

### （三）狭隘的经验主义倾向和实用的教条主义倾向

毛泽东本来是坚持实践和认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辩证统一，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可是到了晚年却背离了这些正确的观点，表现出狭隘的经验主义倾向和实用的教条主义倾向。

狭隘经验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在把自己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绝对化，搬用到社会主义时期和经济建设上来。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他把战争年代的经验套用于和平建设。1958 年他在抨击“反冒进”，发动“大跃进”时讲过这样的话：“难道搞经济比打仗还难？”“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于是提出“以钢为纲”，“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口号，搞“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等等，结果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在经济生活中，他对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过的军事共产主义十分留恋。在人民公社化初期，他多次谈到，我们党是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一直到解放初，大体上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他曾多次表示，要逐渐取消薪金制，实行供给制。他还企图把各种社会组织都变成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高度集中的准军事组织，认为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1958 年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根据“五七指示”建立的“五七干校”、“五七农场”、“五七工厂”等等，就是

一种尝试。

毛泽东的狭隘经验主义倾向，最突出的表现是从一般地强调“亲知”发展到对书本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鄙夷漠视，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晚年他曾三番五次地列举史例论证读书多的人没有出息，历史上有出息的人物反而是一些“老粗”。1958年他一再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就是用这些材料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鼓舞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专家、名家往往是最落后的、最无创造性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1964年春节谈话中又说：书不要读很多，马列主义的书，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要走向反面，成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1965年在杭州会议上他又说：现在的大学教育，我很怀疑。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更是否定知识，否定文化，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统统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稍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都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来打倒。“四人帮”则把这种思想发展成“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文化大革命”成了“革文化的命”。

毛泽东晚年实用的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把马恩列斯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拿来为自己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一系列“左”倾政策论证。例如，他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的话，理解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前都是过渡时期，从而为他的阶级斗争政策和城乡经济政策作论证。他把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理解为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得出他所需要的结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商品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些“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温床，因此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

制。他还把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针对俄国情况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话，套用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我国，从而证明阶级斗争、“趁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的必要性。毛泽东从实用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话，但却认为自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直到临终前，他还要求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一个曾经同“左”倾教条主义作过长期坚决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的革命领袖，晚年也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给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这不能不是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这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认真记取。

### （四）忽视生产力，夸大个人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

毛泽东晚年在历史观上最主要的错误是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夸大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他在《矛盾论》中曾经明确指出：生产力、经济基础是起主要决定作用的；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又有反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反过来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这个提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意思是好的，它要求我们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坚持辩证唯物论，避免机械唯物论。但应该看到这里所说的前后两个“主要的决定作用”，其含义毕竟是不同的，后者只能在“反作用”的意义上使用，否则就会发生错误，容易陷入历史唯心论。后来，特别是晚年，毛泽东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错误，他片面地过分地夸大了变更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把改变生产关系放在比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地位。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他就提出“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口号，后来在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断变更生产关系，不断搞“穷过渡”。毛泽东自己说过：你们爱研究生产力，我则专门研究如何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62 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这是他的一个缺点：“我注意得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

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1]但是这种情况后来并没有多大改变。相反地，他越来越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主要不是靠生产力的增长，而是靠"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所以"文革"中他提出要批判"唯生产力论"，坚持所谓"抓革命，促生产"。"文革"后期，当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即要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出我们的工作要以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以经济建设为纲时，毛泽东大为不满，严厉批评道："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再也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所作所为了，于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与上述思想相联系，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物质利益的根本排斥，同样表现出历史唯心论的倾向。在毛泽东看来，唯有精神鼓励和思想觉悟，才是调动人民群众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的驱动力，而如果以为可以通过对劳动者进行物质鼓励来增加生产，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2]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倒是与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观念有某种相通之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物质刺激、利润、奖金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商品经济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的客观基础。1969年4月他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厂长、党委书记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的，无非是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
② 转引自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76页。

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①]。直到他临终前还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②]。拒斥物质利益，讨厌和限制商品经济，把“政治挂帅”、“思想觉悟”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动力，当作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的根本保障，归根到底是“意识形态决定论”，即历史唯心论倾向的一种表现。

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毛泽东晚年表现出十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高呼“人民万岁”，大讲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批判“天才论”，批判英雄史观，强调“奴隶们创造历史”，强调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又欣赏和鼓励个人崇拜，主张“正确的个人崇拜”，并把个人崇拜当作他进行阶级斗争，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的手段之一，发动“大跃进”靠它，发动“文化大革命”靠它。难怪林彪大搞造神运动，毛泽东却能心安理得。1967 年 7 月 8 日他在致江青的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1970 年 12 月他对斯诺说，文化大革命前期有必要搞一点个人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现在没有必要了，应该降温了。“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统统去掉，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这一方面说明他还没有完全陷入个人崇拜的深渊，尚有某些自知之明；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执着的追求，即中国古代圣人希冀达到的“君师合一”、“内圣外王”的目标。联系到他对“群众运动”的看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名曰直接依靠群众，让群众当家作主，实际上是脱离群众，“运动”群众，是“为民作主”。这也反映了儒家民本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而这种民本思想

① 参见《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4 期。

② 参见 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 结 束 语

通过以上各章的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哲学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但重点在方法论上，其表现主要是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体现在对中国革命、建设重大实际问题的解决之中。

毛泽东哲学本身有一个孕育、萌芽、产生、发展和演化的过程。它是在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前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继续得到发展，1957 年以后逐渐发生错误，一个时期内虽有所觉察和纠正，但很不彻底，由于它本身的某些弱点和局限性，以及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错误越来越严重，直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时期我国 20 年的“左”的错误，同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失误是分不开的。

但是就毛泽东一生来看，他在哲学上的贡献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提出的以实事求是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唯物论等等，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把上述基本原理化为党的思

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哲学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是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毛泽东哲学不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且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它已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沃土，渗透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品格之中，对于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对于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失误，也是不能回避的，需要纠正的，并且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哲学加以发展。值得高兴的是，邓小平在领导我国人民拨乱反正，倡导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包括哲学上的失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中的正确思想。他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论述；关于"两手抓"，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的论述；关于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论述；关于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论述；关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关系的论述；关于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论述；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的论述等等，都从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哲学的研究和探讨，对于毛泽东哲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应当继续努力，把研究和宣传、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为哲学工作者的一项义不容辞的崇高任务。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
作者＝
页数＝３３６
ＳＳ号＝
ＤＸ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
第一节　中国革命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第三节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第二章　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和毛泽东哲学的萌芽
第一节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的萌芽
第三章　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探索和毛泽东哲学的形成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与党在理论战线上的任务
第二节　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探索与矛盾特殊性思想
第三节　《反对本本主义》与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雏形
第四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主要矛盾转化原理的提出
第五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军事哲学
第六节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系统化的标志
第四章　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毛泽东哲学的多方面展开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形势与哲学战线上的斗争
第二节　《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
第三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唯物史观
第五节　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第六节　把哲学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五章　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与毛泽东哲学的进一步展开
第一节　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第二节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哲学意义
第三节　十大军事原则对军事辩证法的新发展
第四节　《论人民民主专政》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第五节　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
第六章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毛泽东哲学的继续发展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第二节　在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的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
第三节　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批判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唯心主义
第四节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发挥
第五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与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
第六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伟大贡献与历史局限
第七章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与毛泽东哲学的曲折发展

第一节　　经济建设上的主观主义错误与毛泽东的初步反思
第二节　　在总结经验教训中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第三节　　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左”倾错误的发展与毛泽东历史观上的失误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重大失误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与过程
第二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实质
第三节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哲学根源
结束语
附录页